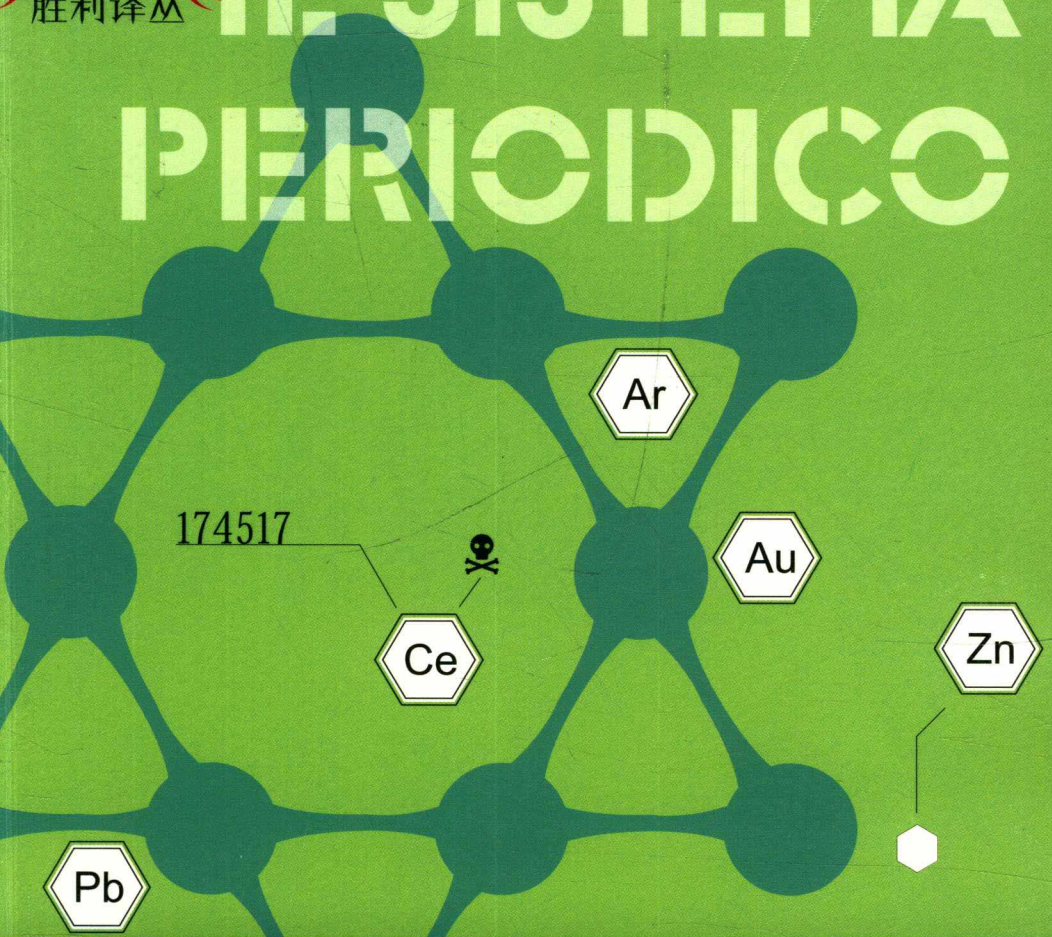




IL SISTEMA PERIODICO



元素周期表

奥斯维辛化学家的二战回忆

〔意〕普里莫·莱维 著 牟中原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IL SISTEMA PERIODICO

元素周期表

奥斯维辛化学家的二战回忆

(意) 普里莫·莱维 著 牟中原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素周期表 /（意）莱维著；牟中原译．—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6

（胜利译丛）

ISBN 978-7-5500-1417-6

I. ①元… II. ①莱… ②牟…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3419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4-2015-0180

Copyright ©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1975

All rights reserved.

元素周期表

〔意〕普里莫·莱维 著

牟中原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丰林

特约策划 彭 伦 索马里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6.75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417-6

定 价 3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2015-25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二十一个恬静、梦幻、感慨、悲痛、奇趣的化学元素故事，
从氢到碳，都有着诗意的人生象征。

在莱维文学的世界里，
科学与文学不再是割裂的两个境界。

幸存者的声音——导读

王浩威

一九九七年初夏，到意大利水上之都参观威尼斯双年展。

结束了比安那列举办的颁奖观礼后，离开这个过度拥挤的第一展览会场，一群朋友走到由旧日造船厂改建的第二会场。

一八九三年开始的威尼斯双年展，曾经是未来派的大本营，希特勒痛斥为堕落艺术的讨伐对象；到了二战后，原本秉持世界一同的良意，双年展旧别馆再加上新设计的建筑，都拥有了自己的国名，仿如联合国般充斥着另一种国家主义。由旧造船厂改成的第二会场，以大会主动邀约的艺术家为主，国家的旗帜终于消失。

我们一群人先出了第二会场，沿水道旁的巷子漫步，而后随意找了一家平常小馆，简单进食。一位同行的意大利艺术家聊起了文学和艺术的关系，他说其实意大利一直都很重视文学。他本身是位化学家，经营了一家化学工厂，却长期支持前卫艺术，包括搜购和写评论。

一起走了好长一段路，我终于有机会认识他，不禁问：“你的情形，跨界搞文艺的化学家，不就像普里莫·莱维一样吗？”

他感到惊讶，问道：“在你们那里，有他的作品翻译出版吗？”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说莱维是多么棒的作家，他的敏锐心思，他真诚的文学态度，当然，也谈到了他的自杀带来的遗憾。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的晚上，普里莫·莱维去世近五年左右，罗马的街头出现了长长的火炬队伍，上千点火光在黑夜中前进。他们聚集

是为了反对意大利境内逐年崛起的种族主义和新纳粹风气，特别是近年横行的光头族。在小巷口，一幅长长拉开的抗议布条只简单写着几个数字：174517。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二十万人聚集在米兰庆祝意大利脱离法西斯政权四十九周年，其中一幅抢眼的旗帜写着：“勿忘 174517。”

174517，一串乍看毫无意义的数字，在二战尚未结束的一九四四年二月，赤裸裸地烙在普里莫·莱维的肌肤上。当时他刚从一列囚禁的火车上走下月台。这是前后一年来载送几千人的许多列车中的一列。五百个人从意大利弗索里监狱被送到日后恶名昭彰的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车上有二十九名妇女和九十五名男子被挑中，依序烙印，编号从 174471 到 174565，而 174517 只是其中一号。剩下的四百人，老幼妇孺等等，人数很庞大，处理却很简单，直接送入瓦斯室处死。

人类历史上最悲痛记忆的所在地奥斯维辛集中营，于一九四三年底设立。当时纳粹德国的年轻劳力投入了战场，工厂迫切需要人手，于是一个彻底利用劳力的集中营出现了。二战期间，意大利境内有八千名犹太人被送出境，六千名被送到奥斯维辛，只有三百五十六名在战后生还回到故乡。莱维，这位被编号为 174517 的囚犯，日后在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的访谈里表示，他的幸存是一大堆因素赐予的，主要包括他的迟迟被捕，他适合这个强迫劳役制度的要求，当然，最重要的是，纯属幸运而已。

奥斯维辛的大门就刻着这样的字句：Arbeit Macht Frei，劳动创造自由。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生的莱维，抵达奥斯维辛时是二十五岁。他被挑出来的原因，最先是因为年轻力壮，后来是因为他化学家的专长；最后，当德国开始战败，健康囚犯都被强制撤离和谋杀时，他却正因猩红热侵袭奄奄一息，被丢弃在营中营而幸存。

这许多幸运的偶然，这样微小的生存概率，在和死神不断擦身而

过的过程中，幸存的人，包括莱维，也就成为永远无法相信生命的困惑者，却又势必扮演这一切灾难的目击证人。

和读者所熟悉的卡尔维诺一样，莱维从出生以来，一直都生活在都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家，文坛精神领袖帕韦塞，将卡尔维诺引进文坛，介绍到最重要的文化出版社埃伊瑙迪工作和出书。相反，同样是都灵人，同样在二战后写作，只比卡尔维诺大四岁的莱维，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一方面，战后回到都灵的他，就像《元素周期表》里写的，在这个近乎废墟的城郊找到了一份工厂化学家的工作，也就少与都灵文人圈来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他作品中的绝望和愤怒。

在奥斯维辛的绝望处境里支持他活下去的，就是盼望扮演这场悲剧见证人的决心。他将观察和感受陆续写在纸上，然后一一销毁，只留在脑海而免遭发现。

回到都灵，他和另一位同是幸存者的医师列奥那多·德·贝纳德提揭露集中营如何虐待和摧毁人体的科学报告，刊在医学期刊上。一九四七年，他开始在《人民之友》周刊发表有关集中营的文章。完整手稿分别给了埃伊瑙迪、帕韦塞和金兹伯格夫人^①，反响极佳，可是出版社却大多没兴趣，最后是一家小出版社草草发行，第一版滞销，在佛罗伦萨的地下仓库里的库存，某年水灾全遭淹渍。

二战后，乃至今天，人们一直不愿去回想大屠杀这类的记忆，这一切历史事件证明了人性可能的残酷，既不仅仅属于少数几个民族，也不是人类的文明演化可以消除的，而是永远、永远地存在像你我这样的所谓平凡或善良老百姓的潜意识深处。莱维喊出来了，大家的痛处却被触及了，即使是良心知识分子，也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而不是积极欢迎它

①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1916—1991），意大利作家、哲学家，一生致力于对法西斯以及二战的反思。

的出版。

《如果这就是人类》在被拒十年后，一九五八年才由埃伊瑙迪出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二战的灾难还距离不远，经历过法西斯、战争、死亡和集中营的一代，发觉部分新一代欧洲青年开始投入当年的思考模式，新法西斯和新纳粹风潮蠢蠢欲动。学校的教科书还停留在过去，课本里的历史只记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样的发展，原先指望以遗忘作为原谅的文化界开始恐慌起来，许多二战期间的资料，包括《安妮日记》在内，终于得以发行。初版仅有两千册的《如果这就是人类》，到一九八七年为止，共售出七十五万册。

在《如果这就是人类》里，集中营的主题一直持续着，声音是愤怒和见证的；到了《终战》，分贝开始下降，思考更加复杂。他的反省不再是只有少数的“坏人”，而是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集体的道德责任，耻辱和罪疚成为一再盘旋的主题。

《终战》的《耻辱》一章最先完成于一九四七年，关于“所谓正直的人在他人果真做下错事以前，早已隐约感到耻辱”的主题，在四十年后他在死前发表的最后一本重要作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进一步发展成对幸存者更深远的分析，特别是他们的罪疚和耻辱。罪疚是指在某些场合中，尽管主动选择的可能性是渺小的，但还是有可能时，幸存者对自己没有抵抗或没有救助他人（虽然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可能）而永远承受自责。耻辱既是个人也是集体的。幸存者必须个别地承受别人质疑的眼神：为什么别人都死了而你还活着？同时也承受着集体的耻辱：我居然也是属于这般禽兽的人类的一分子。

在这样复杂的思考和分析后，莱维开始肯定为何有些人在承受囚禁和侮辱时，可以勇敢活下来，在自由之后反而自行结束生命。他说：“自杀的行径是人性的而不是动物的，它是缜密思考的举止，不是冲动

或不自然的选择。”奥地利籍哲学家汉斯·迈耶^①在一九七八年自杀，生前写了一篇《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警告下一代一定要抗拒冷漠和不在乎。莱维在书中，也用了一整个章节来讨论这个问题，结论都是悲观而不确定的。

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一九八六年六月，奥地利前纳粹分子瓦尔德海姆当选为该国总理，引起欧洲知识分子的一片愤怒和辩论；当然，意大利也不例外。莱维在他的《圣经》背后写了一首诗：

如果没有多少的改变也不要怯懦了。
 我们需要你，虽然你只是较不疲累罢了。
 ……再想想我们所犯的错吧：
 在我们之间有一些人，
 他们的追寻还是瞎眼地出发，
 像是蒙上眼布的人凭依摸索。
 还有些人海盗般出航；
 有些人努力继续坚持好心肠。
 ……千万别惊骇了，在这废墟和垃圾的恶臭里：
 我曾经赤手清除这一切，
 就在和你们一样的年纪时。
 维持这样的步伐，盼望你可以做到。
 我们曾经梳开彗星的发丛，
 解读出天才的秘密，
 踏上月球的沙地，

① 汉斯·迈耶（Hans Mayer，1912—1978），别名 Jean Améry，奥地利哲学家，奥斯维辛幸存者。

建立奥斯维辛和摧毁广岛。

瞧，我们并不是啥都不动的。

扛上这负担吧，继续现在的困惑。

千万啊，千万不要称我们为导师。

这一年的年底，莱维再次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一九八七年年初，在最后一次访问里，他说：“过去和现在的每一刻，我总觉得要将一切都说出来……我走过迢迢的混乱，也许是和集中营经验有关。我面对困难的情形，惨透了。而这些都是没写出来的……我不是勇敢强壮的。一点也不是！”

三月，他连续两次接受前列腺手术，身体的恶化让抑郁症更沉重。四月八日清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新闻宣称，普里莫·莱维从他家的三楼坠落身亡。

普里莫·莱维不仅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也不止是在书写对集中营的回忆和反思。

一九九五年九月，旅行途中路过伦敦，遇见了在英国游修科学史的朋友。他说，最近才因为课堂老师的介绍，读完一本棒极了的书《元素周期表》。从萨尔茨堡搭车到苏黎世，再搭机到伦敦的途中，我也买了这一本《元素周期表》。

莱维从没失去他出身的化学本行。只是，在人的问题和化学的科学之间，身为科学家的他不再是看不见的观察者，所有所谓客观的科学都开始有了主观的故事和历史。莱维用人文的眼神凝视科学，颠覆了几百年来在科学与人文的争执中，永远只有科学在打量着人文的处境。

他曾经写诗、写评论，也写过完全符合严格西方定义的长篇小说《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何时？》。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公认《元素周期表》是他最成功的文学创作。这本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小说”，在浓厚的自

传色彩中将化学元素化为个人的隐喻，仿佛是在宣告他的记忆开始努力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回到一切还没发生的原点。

第一章的氩开始追溯祖先的脉络，从古老犹太传统到都灵的定居，而莱维是最后登场的一个角色。从氢到镍，莱维度过了他的青春期到拥有第一份差事。这是《元素周期表》的第一部分，也是最愉快的人生，他发现了自己拥有倾听的能力，而别人也有告诉一切的意愿。

第二阶段是从磷到铈，从他失去自由到集中营中的囚禁。第三阶段则是从铬到钷，谈及战后的一切，在他重新适应原来城市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昔日用浪漫眼光看待化学的悠哉了。他必须面对现实的需要，重新架构自己的价值观和视野。

碳出现在最后的阶段，一种“时间不再存在”的元素，是一种“永恒的现在”。特别是，莱维指出，这样的平衡状态将导致死亡。碳和人类的肉体是不同的，它拥有永恒的质性，莱维选择它暗喻自己化学生涯的结束和作家身份的重生，却也不知不觉地预言了在面对创伤记忆的漫长奋斗后，度过了四十年的煎熬，最后还是选择了一种永远平静下去的结束。

目 录

幸存者的声音——导读 王浩威	1
氩 <i>Argon</i>	1
氢 <i>Hydrogen</i>	15
锌 <i>Zinc</i>	23
铁 <i>Iron</i>	31
钾 <i>Potassium</i>	41
镍 <i>Nickel</i>	51
铅 <i>Lead</i>	65
汞 <i>Mercury</i>	77
磷 <i>Phosphorus</i>	87
金 <i>Gold</i>	101
铈 <i>Cerium</i>	111
铬 <i>Chromium</i>	119
硫 <i>Sulfur</i>	129

钛 <i>Titanium</i>	135
砷 <i>Arsenic</i>	141
氮 <i>Nitrogen</i>	147
锡 <i>Tin</i>	155
铀 <i>Uranium</i>	163
银 <i>Silver</i>	171
钒 <i>Vanadium</i>	181
碳 <i>Carbon</i>	193
翻译莱维 牟中原	201

Argon

氩

我所知道的祖先和这些气体有点像。

并不是他们身体怠惰，

但他们的精神无疑属惰性，

倾向玄想和巧辩。

他们事迹虽然多，

但都有静态的共同特点，

一种不介入的态度，

自动（或接受）

被纳入生命长河的边缘支流。

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有所谓惰性气体。它们有奇怪的希腊名字，博学的字源，意指“新”、“隐”、“怠惰”、“奇异”。它们真的是很迟钝，对现状极为满意。它们不参加任何化学反应，不和任何元素结合，因此几世纪都没被发现。直到一九六二年，一个努力的化学家，绞尽脑汁，成功地迫使“奇异”（氙气）和最强悍的氟结合。由于这功夫非常独特了不起，他因而得了诺贝尔奖^①。它们也称为贵族气体——这里有讨论的余地，不知是否所有贵族气体都为惰性，或所有惰性气体都高贵。最后，它们也叫稀有气体，即使其中之一的“氩”（怠惰），多到占空气的百分之一，是地球上的生命不可或缺的二氧化碳的二三十倍。

我所知道的祖先和这些气体有点像。我不是说他们身体怠惰，他们没有能耐如此。他们反而必须相当努力来赚钱养家，以前还有“不做没得吃”的道德信条。但他们的精神无疑属惰性，倾向玄想和巧辩。他们事迹虽然多，但都有静态的共同特点，一种不介入的态度，自动（或接受）被纳入生命长河的边缘支流。这些并非偶然。无论贵重、惰性或稀有，和意大利、欧洲其他犹太族比起来，他们的经历贫乏得多。他们似乎在一五〇〇年左右从西班牙经法国南部来到皮埃蒙特^②，这可以从他们以地名来命名的姓氏看得出来。例如 Bedarida-Bédarrides，

① 内尔·巴特莱（Neil Bartlett, 1932—2008），得此发现，成就非凡，但未因此得诺贝尔奖，此处为原作者之误。

② 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Momigliano-Montmélian, Segre (这是流过西班牙东北部的一条支流名), Fòa-Foix, Cavaglion-Cavaillon, Migliau-Millau; 位于法国的蒙彼利埃和尼姆间隆河口的伦内镇 (Lunel) 翻译成希伯来文成了 yareakh (意大利文 luna 指月亮), 由此衍生了皮埃蒙特犹太人的姓氏 Jarach。

在都灵^①, 虽遭到排斥或冷淡接纳, 他们还是在南皮埃蒙特各处农村安顿下来, 并引进造丝技术。即使最兴盛时, 他们还是极少数。他们既非受欢迎, 也不讨人厌; 并没有受欺压的故事流传下来。但与其余民众之间, 有一层无形墙把他们隔开; 是那疑心、嘲弄、带敌意之墙。即使在一八四八年革命解放而得以移居都市后也是如此。父亲说起在贝内瓦吉恩纳的童年时, 学校里, 同伴会不带敌意地取笑他, 拿衣角卷在拳头里成驴耳朵, 唱道: “猪耳朵, 驴耳朵, 送给犹太佬多多。” 耳朵没什么特别含义, 手势则是亵渎地模仿虔诚犹太教徒在会堂应召上台念教律的彼此祈福动作——互相展示祈祷披肩折边, 其流苏的数目、长度、形状都有神秘的宗教意义。但那些孩子早就遗忘了这些动作的来源。顺便提一下, 对祈祷披肩的亵渎和反犹太主义一样古老, 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被没收披肩后, 黑衫队便拿来做内裤。

排斥总是相互的。犹太人对基督徒也竖起对立的高墙 (goyim, narelim 指“异教徒”, “没行割礼的”), 在平静的乡下小地方, 重演《圣经》选民的史诗。这从根的错序, 使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到今天都还自称“以色列子民”。

这里要赶快对读者声明“叔叔”、“阿姨”这些称呼要从宽解释。我们的习俗管任何年长亲戚都叫叔、姨, 即使关系很远。日子久了, 几乎所有社区里的大人都有亲戚关系, 所以叔叔很多。叔叔是那些抽烟草的长老, 阿姨是掌管全家的皇后, 他们聪明有智慧。而对很老很老的叔

① 皮埃蒙特地区最大的城市。

姨（我们从诺亚以后就都长寿），“巴伯”（barba，指“叔叔”）、“玛娜”（magna，指“阿姨”）这些字头就连到他们的名字上了。因为希伯来文和皮埃蒙特方言的一些发音巧合及一些奇妙字尾安排，造就了一些奇怪的名字，而这些妙语就同他们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于是有了巴伯伊托（伊利亚叔）、巴伯撒钦（以撒叔）、玛娜丽亚（玛利亚姨）、巴伯摩钦（摩西叔，据说他把两颗下门牙拔了以便咬烟斗）、巴伯姆林（山姆叔）、玛娜维盖亚（阿比盖亚姨）、玛娜弗林亚（柴伯亚姨，源自希伯来文 Tsippora，意指“小鸟”，一个漂亮名字）。雅各叔一定是几代以前的人。他去过英国，所以穿格子装，他弟弟“巴伯帕钦”（波拿帕特叔，这仍是一个常用的犹太名字，以纪念拿破仑解放犹太人）后来则从叔叔辈退了下来。上天不仁，赐了他一个无法忍受的妻子，他绝望到去受洗，成了传教士，到中国去传教，如此可离她远远的。

宾芭奶奶年轻时很美，脖子上围着一条鸵鸟羽毛的围巾，是个伯爵夫人。拿破仑赏给她家族伯爵名位，因他们会借他钱（manòd）。

巴伯隆宁（阿隆叔）个子高，健朗，又有些怪主意。他离家到都灵，干过很多行业。他会和卡力南诺剧院签约当临时演员，并写信要家人来参加开演。内森叔和亚勒格娜姨来了，坐在包厢里。当幕布升起，亚勒格娜姨看到儿子打扮得像非利士人^①，她拼命大喊：“阿隆，你在搞什么？把剑放下！”

巴伯米林脑筋简单；在亚奇，人们把傻子当上帝的儿女，没人可以喊他笨蛋，他受到保护。但他们叫他“种火鸡的”。因为有个拉山（rashan，异教徒）骗他说养火鸡像种桃树，种火鸡羽毛到土中，树上就长火鸡。也许是由于它那无礼、笨拙、暴躁的反面脾气，火鸡在这家族世界中有它特别被用以取笑的地位。譬如，巴西菲可叔养了只母火鸡，

① 古代居于巴勒斯坦的好战民族，曾多次攻击犹太人。

而且对它疼爱有加。而他家对街住着拉特先生，是位音乐家，火鸡老吵到他。他求巴西菲可叔让火鸡安静，这大叔回答：“遵命！火鸡小姐，给我闭嘴。”

加布里叔是个犹太教士，所以人称巴伯莫仁诺，就是“我们的老师叔”。他年纪很大，又快瞎了，有次从外地回来，看到马车经过，就喊停要求载他一程。和车夫讲话时，他发觉那是一辆载基督徒到坟地去的灵车，多可怕的事。按教律，一个碰了死人，甚至进到停尸间的教士，就受污染七天。他跳起来：“我和异教徒死女人同车！车夫，快停！”

可伦坡先生和格拉西狄奥先生两人亦敌亦友。据传说，这两个对头住在莫卡弗镇一条巷子里的两边。格拉西狄奥是个瓦匠，很有钱。他有点以身为犹太人为耻，便娶了个基督徒。她有一头及地长发，与人私通，让丈夫戴了绿帽。虽然是个异教徒（goyà），但大家还是叫她玛娜奥西丽亚，表示有点接纳她。她爸是船长，送格拉西狄奥一只圭亚那来的彩色鹦鹉。它会用拉丁文讲：“认识你自己。”可伦坡先生是个穷人，鹦鹉来了以后，他就去买了只秃背乌鸦，也教会它讲话。每当鹦鹉喊“认识你自己”，乌鸦就会回答“臭神气”。

加布里叔的 *pegartà*，格拉西狄奥先生的 *goyà*，宾芭奶奶的 *manòd* 和我马上要谈的 *havertà*，这些字需要一番解释。*Havertà* 是个希伯来词，词的形和意都已改变，有特别含义。事实上，它是 *haver* 的不规则阴性词，等于“友伴”而意指“女佣”，但引申的含义是出身低下，风俗信仰都不同，但不得不让她住同一屋檐下的女人。*Havertà* 习性不净，态度不雅，对主人谈话简直有恶意的好奇心，令人讨厌到不行，以致她在场时，他们不得不用些特别术语，*havertà* 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术语行话现在几乎消失了，几代以前还有几百个词。它们多半有希伯来词源，带上埃及蒙特词尾。只要粗略研究一下，就可看出隐语的功能，是用来在 *goyim* 面前谈 *goyim*，或咒骂些没旁人懂的话，或用来对付社会上的限

制与压迫。

因为顶多只有几千人说隐语，这话的历史价值不大，但人性意义可不少，所有变化中的语言大抵如此。一方面，它有皮埃蒙特方言粗犷、清晰、简洁的特性（除了打赌，从不写成文字）；另一方面又混杂了神圣和庄严，经千年砥砺，光滑如冰河的希伯来文。两种文字的对比带来不少喜剧力量。这语言上的对比，又反映了四散的犹太人在犹太文化上的冲突。自从四散于异教徒之间（是的，在 *goyim* 之间），他们在所受神圣召唤和日常困顿之间总是不停挣扎。人就像那神话中的人头马身，半灵半肉，圣灵与尘土都是召唤来源。犹太人两千年来就悲伤地和这冲突共存，也就从中吸取了智慧和笑话，而后者是《圣经》和先知所缺的。它遍布意第绪语，也渗透到“地上之父”^①的奇言怪语中。在没消失之前，我要记下来。这语言初听之下，还以为是亵渎神祇的，事实上却和上帝有种亲密关系——如 *N-ssgnór*（我们的主）、*Adonai Eloenó*（赞美主）、*Cadòss Bar-khu*（亲爱的主）。

它屈辱的根源很容易看出来。例如，有些词因没用就没有了——“太阳”、“男人”、“城市”；而“夜晚”、“躲藏”、“钱”、“牢狱”、“偷”、“吊”、“梦”这些词是有的。[最后的“梦”只用于 *bahalom*（在梦中）这个情境，以作为反义词，指别想。]除此之外，有许多嘲弄的字，有时用来批判人，更多时候是夫妻在基督徒店东面前举棋不定时用的。我们有 *n saròd* 这复词，已不再指希伯来文中的 *tsara*（霉运），而是指不值钱的货。它的昵称则是优雅的 *sar-dínn*。我也忘不掉恶毒的 *saròd e senssa manód*，这是媒人（*marosav*）用来指没嫁妆的丑女人。*Hasirud* 是从 *hasir*（猪）字而来，指肮脏。值得注意的是，法文中“u”这个音在希伯来文中不存在，但是有“ut”这字尾（意大利的“u”），用来制造抽

① 此处是对比基督徒的主祷文起头“我们在天之父……”。

象观念的词（例如，*malkhut* 指王国），但没有特殊用语里带有的强烈嘲弄含义。另外，它常出现的场合是在店里，店东和伙计用来损客人。上个世纪皮埃蒙特的服装业是受犹太人掌控，从这行业产生了一些术语，在伙计做了店东后又传了下来，后来也不一定是犹太人，很多店一直到现在还用。很多说的人偶尔发现其词源是希伯来文，还大吃一惊。譬如，很多人还用“*na vesta a kinim*”代表格子装。而 *kinim* 是虱子，是古埃及十大灾难的第三个，是犹太人逾越节中所教唱的仪文中的词。

然而也有一大堆不是很雅的词，不但在小孩面前用，也用来代替诅咒。不像意大利语和皮埃蒙特语，它既可发泄，又不脏嘴，别人却听不懂。

对风俗有兴趣的人，那些谈到天主教的词就更有意思。此处，原始的希伯来文形式就变化得更厉害了。有两个理由：第一，秘密是绝对必要，万一异教徒听懂了，可会招来亵渎之罪；第二，用意本来就是要扭曲，扭到否定意义，去除原来的超凡德性。同样道理，在所有语言里，“魔鬼”都有各种文饰的讲法，不讲它，指的却是它。教会（天主教）是叫 *tònevà*，它的来源我无法查考，也许只从希伯来文取其音；而犹太会堂则被谦虚地称作 *scola*（学校），一个学习成长的场所。对等地，教士不是用 *rabbi* 或 *rabbenu*（我们的教士），而是用 *morénô*（我们的老师）或 *khakhàm*（智者）。事实上，在“学校”里，人不是被基督徒中狠毒的 *khaltrúm* 所苦：*khaltrúm* 或 *khantrúm* 是天主教徒讲究仪式和偏执的结果，因为多神而拜偶像，令人无法忍受。（《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这个词在长久诅咒中成长，来源已不可考，几乎可确定不是来自希伯来文，而是某种犹太—意大利隐语中的形容词 *khalto*，亦即“偏执”，用来形容崇拜偶像的基督徒。

A-issá 是圣母（就是“那女人”）。而全然不可解、秘密的字——可

预料到的——是 Odo，当无可避免时，压低声音，四处张望，用这字指耶稣。越少提基督越好，因弑上帝之神话难以磨灭。

还有很多从祷文、圣书来的词。上世纪出生的犹太人，大致都熟读希伯来原文，至少懂得部分；但成了隐语时，就任意扭曲。Shafòkh 这字根，意指“倾倒”，它出现在《诗篇》第七十九章（“愿你将你的愤怒，倾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我们的老祖母们就把 fê sefòkh (to make a sefòkh) 用来形容婴儿呕吐。Rúakh (复数 rukhòd) 意指“呼吸”，出现在黑暗而可敬的《创世记》第二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从而发展出 tiré 'n rúakh (放屁) 这生理词，由此可看出一点选民与造物主间特殊的亲密感。举个实例吧，多年来流传着雷琪娜姨的一句话，她和大卫叔坐在波街上佛罗里奥咖啡店，说：“Davidin, bat la cana, c’as sento nen le rukhòd !”（“大卫，用力踩你的拐杖，免得人家听到你放屁！”）这是夫妻间亲密的话。那时，拐杖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就像今天坐头等舱旅行。譬如，我父亲有两把手杖，平常是用竹拐杖，礼拜天则用藤手杖，杖柄镶银。他不用手杖撑身体（无此需要），而是在空中比划，还用来赶无礼的狗，简言之，那是一个和粗俗大众区隔的权杖。

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应该每天颂祷 barakhà 这词上百次。他应深深感恩，因每次如此做，就履行了与神的千年对话。雷翁宁爷是我曾祖。他住在蒙弗拉多，是扁平足，而他屋前巷子铺了圆石头，他每次在上头走就脚痛。有天出门，发现巷子改铺了平石板，他高兴地大呼：“N abrakha a coi goyim c’a l’an fait i losi!”（祝福那铺路的不信教者！）至于诅咒，有一怪词 medà meshônà，直译是“怪死”，但事实上是模仿埃及埃特语 assident，用意大利语直说就是“去死吧”！雷翁宁爷还留下了这句怪话：“C’ai takeissa ’na medà meshônà feita a paraqua.”（愿他碰上状如雨伞的灾难。）

我也没法忘掉巴伯里柯，他只早一代，差点就是我真正的叔叔。对他，我有清晰而复杂的回忆，他不是前面说的那些“固守某种姿态”的传奇性人物，而是活生生的记忆。本章开始所说的惰性气体的比喻，形容巴伯里柯是再贴切不过。

他学医，也成了个好医生，但他并不热爱这世界。也就是说，他虽喜欢人（尤其女人）、草原、天空，但不爱辛苦工作、承诺、时程、期限、为前程而处心积虑、为五斗米而折腰。他会想出走，但因为太懒没做。有个爱他的女人，他则心不在焉地容忍她。女人和朋友们说服他去考越洋客轮的船医，他轻易考取，从热那亚到纽约航行了一次，回到热那亚就辞职了，因为在美国“太吵了”。

那以后，他就定居在都灵。他有好几个女人，每个都想嫁他、拯救他，但他认为结婚、诊所、开业都是过多的承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已是个怯懦的小老头，深度近视，也没人理。他和一个壮硕粗俗的 *goyà* 女人同居，不时怯怯地想离开她。他喊她 “*’na sôtià*（疯子）”、“*’na hamortà*（驴子）”和 “*’na gran beemà*（巨兽）”，但总是略带不可解的温柔。那 *goyà* 甚至想要他 *samdà*（受洗，字面解是“毁灭”），他则总是推拒——并不是出于宗教信念，而是缺乏动机，事不关己。

巴伯里柯有十二个兄弟姊妹，他们给了他的女伴一个残忍的名字“玛娜吗啡娜”（吗啡姨）。这女人既是异教徒又没儿女，不能真算是个玛娜；事实上对她而言，玛娜这头衔代表了恰好相反的意思，一个“非玛娜”，不被家族承认的人。而这名字残忍，是因为它可能不正确地暗指，她利用巴伯里柯的空白药单获得吗啡。

他们两人住在凡奇里亚街一个脏乱的阁楼。叔叔是个有智慧、有能力的好医生，但他镇日躺在那儿看书读旧报纸。他记忆力奇佳，阅读广博，深度近视让他戴着酒瓶底厚度的眼镜，书只离脸三英寸。他只有出

去行医时才起来，因他几乎从不要钱，常有人来求他。他的病人多是住在郊外的穷人，他会收下半打鸡蛋、菜园的菜，或旧鞋子作为诊费。因没钱坐街车，他走路去看病人。路上，透过近视眼微弱的视力，看到小姐朦胧的身影，他会上去在一英尺距离仔细打量，弄得人家不知如何是好。他几乎不吃东西，好像无此需要，最后以九十高龄，有尊严地过世。

费娜奶奶排斥世界的程度和巴伯里柯不相上下。她们四姊妹都叫费娜：因为从小四姊妹都先后被送到同一个叫戴费娜的保姆那儿，她叫这些小孩同一名字。费娜奶奶住在卡马诺拉一栋二楼公寓，很会钩织。八十六岁时，她得了个小病，那时女士常有这种病，现在则似乎都神秘地消失了。从那以后二十年，直到过世，她再也没出过门，礼拜时，她就在布满花朵的阳台向从 scola（会堂）出来的人挥手。但她年轻时一定不一样。她的故事是：她丈夫带蒙卡弗教士来家做客，这教士是一个博学广受尊敬的人。家里没什么吃的，她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他吃了猪肉。她弟弟巴伯拉弗林（拉飞尔），在升格成巴伯之前，人称“色林摩西己子”（色林摩西之子），现因贩卖军用物资而成了富人。他爱上加西诺的瓦拉布里加夫人，她是个大美女。他不敢公开追求，给她写了很多从没寄出的情书，然后给自己写热情的回信。

马钦叔也有段失意的爱情。他恋上苏珊娜（希伯来文是“百合”之意），她是个轻巧、虔诚的女人，拥有百年特制鹅香肠的秘方，用鹅脖子本身做香肠的外膜。因此在 Lassòn Acodesh（“圣言”，即我们所讨论的术语）中，脖子有三种相似词留传了下来。第一个 mahané 是中性字，代表脖子的字面意思。第二个 savàr 只用在隐喻，例如“有断颈危险的快速度”。而第三个 khanèc 就非常委婉且有暗示性，指可被阻绝、断去的重要通道，例如“断你生路”。khanichésse 的意思则是“上吊自杀”。好了，马钦当苏珊娜的助手，在她厨房兼工厂和店里帮忙，她架子上有

香肠、圣物、护身符和祈祷书。苏珊娜拒绝了他，而马钦恶毒报复的法子，是把秘方偷卖给一个 goy。显然，这 goy 不懂它的价值，因此苏珊娜死后（遥远以前的事），市面上就找不到这祖传的鹅香肠了。因这令人厌恶的报复，马钦叔就被开除“叔”级了。

最老最老，充满惰性，笼罩在层层传说之下的是那令人难以相信，化石级的巴伯布拉敏，来自切里的我外婆的叔叔。很年轻时他就很富裕，从贵族手上买了很多切里附近的农地。亲戚们投靠他，吃喝跳舞旅行浪费了他不少钱。有天，他妈米尔卡（女王）姨病了，和丈夫吵了很久，终于决定雇个 havertà 做女佣。之前，她有先见之明，总是拒绝家里有其他女人。果然，巴伯布拉敏爱上这 havertà，也许这是他第一个有机会遇上的可爱女人。

她名字没传下来，但德性大家知道一些。她丰满而美丽，有对壮观的 khlaviòd（乳房）：这词在古希伯来文没有，那时 khalàv 指“牛奶”。她当然是个 goyà，傲慢无礼，不识字，但烧一手好菜。她是个农家女，在家里打赤脚。但这就是我叔叔爱死的地方：她的脚踝、直率的言语，和她的菜。他和女孩没说什么，但告诉他父母他要娶她。他双亲马上发狂，叔叔就躺上床，然后留在床上二十二年。

那么多年布拉敏做什么呢？有很多说法。毫无疑问，大多数时候，他把日子花在睡觉和赌钱上。据说，他经济状况垮掉是因为“他没夹好”债券，或因为他信任一个 mamser（杂种）管理他的农场，那人把它贱价卖给自己的同伙。米尔卡姨完全料中，我叔叔就这样把全家拖垮了，到今天他们还为此后果悲叹。

也据说他在床上读了不少书，最后也算成了公正、有知识的人，在床边还接见切里名人并仲裁争执。也听说，那同一个 havertà，也到床上去了。至少我叔叔自愿上床闭关的头几年，晚上还会偷溜出去到楼下酒店打弹子。但他总算是在床上待了几乎四分之一世纪。当米尔卡姨和所

罗门叔过世后，他娶了个 goyà，真的带她上了床。到那时，他腿已完全无力站起来。一八八三年，他死时很穷，但名声显赫，精神也平安。

做鹅香肠的苏珊娜，是我祖母玛利亚奶奶的表姊。奶奶留下一八七〇年在相馆照的一张臃肿、盛装打扮的相片。在我小时遥远的记忆里，她是个邋遢、皱皮、暴躁、聒透了的老太婆。直到今天，不知怎么搞的，橱子里最高架子上还有她的宝贝：黑丝花边披肩、丝织巾、一个长了四代霉的貂皮手筒、刻有她名字的巨大银器。好像，五十年后，她的灵魂还会回家来看看。

年轻时，她可是个令很多人伤心的大美女。年纪轻轻她就守寡了，谣传先祖父受不了她的不贞自杀了。她独自节俭地带大三个男孩，让他们读书。但到年老，她让步了，嫁了个天主佬医生，一个堂皇、寡言、大胡子的老人。自此以后，她就倾向古怪小气，虽然年轻时，她像多数美丽被爱的女人一样慷慨大方。随着年岁的增长，她逐渐断绝家庭温暖（本来大概就不是很深）。她和医生住在波街一个阴暗的公寓，冬天只有一个小富兰克林炉，几乎暖不了。她不再丢掉任何东西，因为它们都可能有用处，连乳酪皮、巧克力箔纸都留着——她用箔纸做银色小球，好送给教会以“拯救黑人小孩”。也许因害怕自己的选择错误，她轮流去佩俄斯五世街的犹太 scola 及圣欧塔维奥教堂做礼拜，她似乎甚至还去告解呢！一九二八年，她八十多岁过世，一群身着黑衣、邋遢的街坊邻居为她送终，由一个叫西林柏格夫人的女巫带头。虽然为肾病所折磨，奶奶到最后一口气还小心地盯着西林柏格，怕她找到藏在床垫下的 maftekh（钥匙），偷走 manòd（钱）和 hafassim（珠宝），后来证实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她死后，她儿子和媳妇气急败坏地花了几星期清理屋里堆积如山的垃圾。玛利亚奶奶不分青红皂白，存下垃圾和宝贝。从雕工复杂的核桃木柜子里蹦出成千的臭虫，有从没用过的床单，还有打补丁脱线、薄得

透明的床单。地下室中有几百瓶好酒，都已经变成醋了。他们找到八件医生全新的大衣，里面还塞了樟脑丸，但她允许他穿的唯一那件却打满补丁，衣领油腻。

对她，我不记得很多，爸爸喊她妈妈（也用第三人称），带着孝意的爱说她的绝事。每星期天早上，爸带我走路去看玛利亚奶奶。沿着波街，我们走去，一路上爸爸停下摸摸猫咪，闻闻美食，翻翻旧书。爸爸是工程师，口袋里总装着书，认识所有猪肉贩子，因他用计算尺算所买的猪肉。他买猪肉时并不轻松，并非宗教原因，而是由于迷信。打破食物禁忌令他不自在，但他爱猪肉，只要看到猪肉店橱窗，每次都无力抗拒。他叹一口气，闭嘴诅咒两下，以眼角盯我三次，似乎怕我批评或期望我的赞同。

当我们到公寓台阶下，父亲按铃，奶奶来开门，他会对她耳朵大喊：“他考了第一名！”祖母有点不情愿地让我们进去，带我们经过一串积满灰尘、没人居住的房间，其中一间有奇怪的仪器，是医生半弃置的诊所。很少看到医生，我也不想看到他。尤其是自从有次我无意中听到爸爸告诉妈妈，有人带口吃的小孩就诊，他拿剪刀把他舌下的筋肉剪掉。当我们到了起居室，奶奶会挖出一盒巧克力，总是同一盒，给我一颗。巧克力已叫虫咬了，我困窘地赶快藏进口袋里。

Hydrogen

氢

我释放了一个自然力，
也证实了一项假说。

是氢没错，

和星星、太阳里燃烧的元素一样。

它的凝聚产生了这永恒而孤寂的宇宙。

一月，晚餐后恩瑞可来叫我。他哥哥去爬山，把实验室的钥匙留给他了。我立刻换装到街上去会他。

路上，我才知道他哥哥并没真的交钥匙给他，那只是借口，那种让人会心的理由。他哥哥没按习惯藏起钥匙，也没带走，更没警告他偷钥匙的后果。直说吧，等了几个月，那钥匙就躺在那儿，我们能错过机会吗？

我们十六岁，而我对恩瑞可蛮着迷的。他不活泼，成绩也差，但和班上其他人不一样，他敢干那些没人敢干的事。他有一种冷静、固执的勇气，一种早熟的能力，明白自己的未来，加以重视并促其实现。他全不理（但无轻蔑之意）我们对柏拉图、达尔文、柏格森的冗长讨论。他并非粗俗，但也不吹嘘自己有多壮，从不说谎。他有自知之明，但我们也从没听他说过（向我们讨好时，或发泄时）：“你知道，我觉得自己像个呆子。”

他有一种慢吞吞的想象力；和我们一样活在梦中，但他的梦是合理的、圆钝的、可能的。接近现实，并不浪漫，亦非天马行空。他不会像我摇摆于天堂（好成绩、球技、友谊、爱情）和地狱（不及格、悔恨，以及每次有永不如人的感觉）之间，他的目标总是可及的。他只爱升级，那些没兴趣的东西他也耐心学习。为了要一个显微镜，他可以把脚踏车卖掉。他要练撑竿跳，就长达一年每天去体育馆，吭也不吭，也没摔断腿，他自订目标是三米五，等达到时就停止。后来，他喜欢某个女

孩，就努力追到；他要钱安静地过日子，就努力做十年单调的事。

我们立下志愿要成为化学家，但我俩的期望大不相同。恩瑞可很合理地拿化学当饭碗，赚个生活。我要的完全不一样，对我，化学好像远方西奈山上的涡云，还夹带闪电。就像摩西，我希望从云中取得我的定律、世界的原理。虽然我仍生吞活剥地读书，但那时已对书本厌倦，正在找其他通往真理之钥。那钥匙一定有，但我确定由于某种阴谋，我无法在学校里找到它。学校里，他们塞给我成吨的东西，我也辛勤地消化它们，但血管就是没法暖起来。我要观察春天的花蕊、花岗岩的闪烁云母，用我自己的双手。我对自己说：“我也要了解这些，要知道每一样，但不是按他们教我的法子。我要找个捷径，做个万能钥匙，我要打开那扇门。”

成天听那些有关存有、知识的课，但周遭一切看来都不可解，这真令人丧气、想吐。桌椅的木头，窗上的日轮，六月空中飘浮的冠毛。世界上所有哲学家和部队能营造这妙舞吗？不，甚至无法了解它，这真是羞耻，一定还有另外一条路。

我们要成为化学家，恩瑞可和我。我们要以自己的力量和天分去挖掘那迷宫。我们要抓住海神的脖子，阻止它那毫无结果的蜕变，由柏拉图变到奥古斯丁，由奥古斯丁变到托马斯，托马斯变到黑格尔，黑格尔变到克罗齐，全都得停下来。我们要迫使它说话。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我们可不能错过任何机会。恩瑞可的哥哥是个神秘、易怒的家伙，恩瑞可不爱提他。他是个化学系学生，在自家后院弄了个实验室。到他家得穿过格罗斯广场，进入羊肠小巷。实验室很简陋，不是因年代久远，而是因极端的贫穷。有铺了瓷砖的台子，少数一些容器，约有二十个装了药剂的烧瓶。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阴暗而酷寒。路上，我们讨论着要干什么，但想法很混乱。

我们好像受窘的暴发户，但是更深、更本质的是另一种困窘，它与

我们的家族、阶级、祖先有关。我们双手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或近乎零。女人，我们的妈妈和祖母，有灵巧的手，煮饭、缝衣，甚至有人能弹琴、画水彩、刺绣、打辫子。但我们和我们的父亲呢？

我们的手既粗又弱，退化而不敏感，是身体最缺乏训练的部分。除了小时能玩，后来就学写字，如此而已。基于内在冲动，并且对远祖表达敬意去爬树时，（恩瑞可和我）这双手还熟悉如何握住树枝；但它们不谙那神圣、均衡的锤子，刀刃的精准，木器的纹理，铁、铅、铜的可塑性。如果人是制造者，那我们不是人。我们清楚这点，也痛苦。

实验室里的玻璃，威迫而蛊惑。对我们而言，玻璃会破，属于那种不能碰的东西，但亲近接触后，和其他东西完全不同，神秘而无常。这点和同样没有形式的水相像：但出于熟悉和必然，水的独特隐藏在习惯表层下。但玻璃是人造的，历史较短。它是我们的第一个牺牲者或对手。在格罗斯实验室里，有各种实验玻璃，各种口径，长的，短的，都布满了灰。我们点起本生灯，开始工作。

要弯管子很容易，你只要在火焰上抓稳玻璃管。过了一阵子，火焰变黄，同时玻璃微微发光。此时弯它，曲线虽不完美，但大体上有了变化，你能随意创造新的形状：“可能”变为“真”，这不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吗？

铜管、铅管也可以弯，但我们马上发现，红热的玻璃管有种特性。当它软化时，你可以快速一拉，拉成细丝。真的，不可思议的细，细到可以被火焰上升的热气吹得朝上弯。细而弯，像丝。那么，如有大量的丝和棉，是否能像玻璃一样坚强？恩瑞可告诉我在他爷爷的家乡，渔人如何抓蚕。当它们已经长肥，快变成蛹，又瞎又笨地在树枝上往上爬时，渔人就抓住它，用手指掰开，拉出粗粗的蚕丝。他们用来做渔线。这件我毫不怀疑的事让我既恶心又着迷。因它惨死的样子而恶心，但这干净利落的发明也让我着迷。

玻璃管也可以吹胀，但这难得多。管子的一端要塞住，然后从另一头用力吹，可以得到奇薄、美的玻璃球。玻璃壁像肥皂泡，一吹就破。像死亡的象征，泡泡一破，散落一地薄蛋壳。从某种角度看来，这是公平的处罚，玻璃就是玻璃，不应该去学肥皂泡。如果再追究一步，颇有伊索寓言的味道了。

和玻璃奋斗了一小时后，我们又累又辱。看红热的玻璃太久，眼瞳红肿干涩，脚又冷，手指也烧破。毕竟，搞玻璃并非化学，我们来还有其他目的。我们的目标是要亲眼看到、亲手操弄化学书上轻轻松松提到的现象。例如，我们可以制造氧化亚氮——教科书上语调轻佻地说是笑气。真会令人发笑吗？

氧化亚氮可以由硝酸铵加热来制造，我们的实验室里并没有这个，但有氨水和硝酸。我们不懂事先计算，就把它们混起来，直到石蕊试纸显示中性。因此，反应放出大量的热和白色烟雾。然后，我们决定煮沸，把水赶掉。不一会儿，实验室里充满刺鼻的烟，一点也不好笑。我们赶紧停止实验。运气可真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再热下去将要产生会爆炸的盐。

看来既不简单也不好玩。我在墙角找到一节干电池。噢，可以电解水。我在家里已经试过了几次，保证成功。恩瑞可绝不会失望。

我在烧杯中装了水，放一把盐，把两个空果酱瓶子倒立在烧杯中，然后为电池接上铜线，线的另外一端置于果酱瓶中。一串串小气泡从铜线上升起，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阴极的气体大约是阳极的两倍。在黑板上，我写下那有名的方程式，向恩瑞可解释发生的化学反应。他似乎不大相信，但天色已暗，我们快冻僵了。洗完手，我们买了些核桃布丁回家，让电解继续下去。

第二天，我们还有钥匙。完全和理论说的一模一样，阴极气体差不多满了，阳极气体大约半满。我要恩瑞可注意这点，并尽量让自己看起

来有学问，让他觉得我私下秘密实验多次后，发现了定比定律。但恩瑞可情绪不大好，怀疑每件事。“谁说真的是氢和氧？”他无礼地说，“你不是放了盐，那氯气呢？”

这些问题听来刺耳。恩瑞可怎可怀疑我的话？我是这儿的理论家，他不是。他虽是实验室的主人（但是是二手的），但他对此并不在行，就更不该批评。“我们来看吧！”我说道。我小心地举起阴极瓶，开口朝下，点根火柴，靠近瓶口。一声尖锐的爆炸，瓶子碎了。（幸好，我只举到胸前。）手上只剩个讽刺的象征，一圈玻璃瓶底。

我们离开，边走边讨论。我的腿有点发抖，同时感到事后的战栗和愚蠢的骄傲，我释放了一个自然力，也证实了一项假说。是氢没错，和星星、太阳里燃烧的元素一样。它的凝聚产生了这永恒而孤寂的宇宙。

Zinc 锌

那一刻，
丽塔和我之间有座桥，
一座小小的锌桥，
脆弱但可通行。

五个月以来，我们像沙丁鱼般挤着上 P 教授的普通无机化学，心怀敬意。那门课百味杂陈，但总是新鲜刺激。P 的化学不在于宇宙机关，也不在于真理之钥：P 是个幽默的老头，一切高调的死敌（这是他反法西斯唯一的理由），慧黠而固执，有种冷冷的机智。

学生间相传着他那冷酷残忍的考试：他爱拿女生做牺牲品，接着是修女、神父以及所有那些“穿着像军人”的人。传说他主持化学研究所和他的专用实验室，极为小气：地下室中有无数盒用过的火柴，不准工友丢弃。化学研究所有个神秘的尖塔，给那地区带来些仿冒的异国风味。它是老教授遥远年轻时代下令建造的，为的是每年在那儿举行一种污秽、神秘的废物回收仪式。仪式中，所有去年用的烂抹布、滤纸都一起烧掉。他亲自分析灰烬，如乞丐般耐心地回收所有的贵重元素（也许连不大贵重的也要），有点灵魂轮回的味道。只有他忠心的助手卡西里可以参与那盛典。也传说，他花一辈子时光打倒一种立体化学学说，不是用实验，而是用论文。是别人做的实验，他的死对头躲在世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每次对头的论文发表在《瑞士化学家报》上，P 就一页一页地撕碎。

我没法确定这些谣言是真是假：但每当他来到化学制备实验室，所有的本生灯他都能注意到，所以最好关掉它们。事实上，他让学生用他们自己的五里拉银币做硝酸银，二十分的镍币做氯化镍。我唯一一次进

入他办公室时，看到黑板上写着：“不管死活，别为我举行葬礼。”这是真的。

我喜欢P，喜欢他正经严肃，欣赏考试时他轻蔑的作风。他不穿规定的法西斯衬衫，却套个可笑的巴掌大的围兜，走动时，不断地从外套翻领抖出来。他的两本教科书很有价值，清楚到固执的地步，简洁，充满对一般人及愚懒学生的蔑视。哪个学生要是运气好，在他面前证实自己不懒，会被当同事看待，享受简短的称赞。

现在，五个月的苦候结束了。我们八十个新生之中，将选出最不懒的二十个——十四个男生，六个女生——准许进入化学制备实验室。没人知道将遭遇什么；我觉得那课是他发明的。一种现代科技版的野蛮人成年仪式。每个人被迫离开书本，移植到刺鼻的烟雾、灼手的强酸之中，一切都和理论不合。我当然不反对成年礼，但P教授执行方式之残酷，可以充分看出他恨恨的才气。他让我们受辱，来证实我们是徒弟。

总之，他的话和字，没有一句是安慰的、鼓励的，没有一句指出来路的危险、告诉我们这行业的秘诀。我常想，在内心深处P是个野蛮人，是一个猎人。一个去打猎的人，只要带着枪、箭、弓到森林里去，成败全靠自己。抓了就走，事到临头，所有的预言都不算数。理论没用，别人的经验也无效，重要的是自己面临挑战。有種的就赢，弱的就改行。我们八十个人之中，第二年改行的有三十个，第三年又有二十个。

那实验室干净整齐。我们一天在那儿五小时，两点到七点。在门口，一个助理给每个学生一个题目，然后大家到准备室，在那儿，蓬毛的卡西里分给大家材料，本国的或进口的，这人给点大理石，那人给十克溴，另一个给点硼酸，再一个给点黏土。卡西里将这些货交给我们时，总是面带疑虑。这是科学食物，P的食物也是他管的。天晓得我们这些野家伙会干出什么亵渎的事来。

卡西里爱 P，一种争论、抱怨式的爱。显然，他忠心耿耿地跟了 P 四十年，他是他的影子，他的地上转世。就像世上所有代理者一样，他属于一种有趣的人类品种：自己没有权威却代表权威的那一种。像博物馆导游、助理、代书、护士和销售员。这些人或多或少把主管的人性转入自己身上，有时因此受苦，但通常以此为乐。他们有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看他是为自己，或为职位行动。常常，主子的人格完全渗进来，以致阻碍他发展正常的人际关系，所以他一辈子单身。事实上，在修道院一定要守贞以献身于最高的他。卡西里是个谨慎寡言的人，从他悲哀而骄傲的眼神可以读到：

——他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作为他的“助手”，我也有点伟大。

——虽然低微，但我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

——我比他还了解他自己，我预见他的行动。

——我支配他，防卫他，保护他。

——因我爱他，我可以说他坏话。你却不行。

——他的原理是正确的，但应用起来却含糊。“以前，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不在这儿……”

事实上，卡西里之小气及对新事物的痛恨，比 P 还过分。

命运使我第一天要制备硫酸锌；应该不会太难，只要做了基本化学计量计算，以稀酸和锌反应，然后浓缩，结晶，干燥，洗净，再结晶就好。锌，锌板，锌块，他们用来做洗衣盆。这不是个让人有想象力的元素，这元素是灰色的，化合物则是白色，无毒，也缺乏有颜色的化学反应。简单地说，这元素很乏味。人类知道它已有两三百年，所以不像铜有辉煌的历史，但也没有新发现元素的光彩。

我从卡西里手中拿到我的锌，回到实验台准备工作。我感到有点怪异，略带恼意。就像满十三岁时得去圣堂内教士面前，以希伯来文复诵祈祷文。这期待多时的时刻终于来了，与精神对立的物质，我和它

有约。

不需再从卡西里那儿拿其他材料了。锌的伴侣——硫酸，在实验室的每个角落都有。当然是浓硫酸，你必须用水稀释。但，注意！所有书上都载明，把硫酸倒入水中而非反过来。不然，那无奇的液体会发怒，连小学生都知道这点。然后，你把锌放到稀酸里。

讲义上有个细节，我第一次看时看漏了。锌虽然很容易和酸反应，但是很纯的锌遇到酸时，倒不大会起作用。人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两个相反的哲学结论：赞美纯真，它防止罪恶；赞美杂物，它引导变化以及生命。我放弃了第一个道德教训，而倾向于后者。为了轮子要转，生活要过，杂质是必要的。肥沃的土壤之中，要有许多杂质。异议，多样，盐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法西斯不要这些，禁止这些，因此你不是法西斯分子。它要每个人一样，而你就不。世上也没有无尘的贞德，若有也令人生厌。所以在纯锌上加点硫酸铜，你会看到反应开始了。锌醒了，盖满白色的氢气泡；蛊惑已经开始，你可以放手由它去，安详地在实验室里踱方步，看看别人在做些什么。

别人在做各种事，有些人做得很专心，也许吹吹口哨故示轻松。有些人到处跑，看看窗外现已翠绿的公园，另外有些人在角落抽烟、聊天。

在实验室一角，有个油烟柜，丽塔坐在那儿。我走过去，很高兴地发现她煮的东西和我的一样。是真高兴，因为我已在她四周晃荡了一段时间，心中盘算着出色的开场白，但关键时刻总是吐不出来，就留到第二天。我不敢，是因为害羞，没自信，也因为丽塔拒人千里之外，真不明白为什么。她很瘦，苍白，悲哀而笃定。她考试成绩不错，但学习态度缺乏热情。没有人是她的朋友，没人知道她的事，她话很少。因此，她很吸引我。我试着上课时坐在她旁边，但也没吸引她，我觉得气馁但有挑战性。事实上，那时觉得永远无法得到女生的笑颜，就像没了空

气，觉得注定一生孤独无伴，甚感绝望。

很显然，那天良机不可失；那一刻，丽塔和我之间有座桥，一座小小的锌桥，脆弱但可通行；来吧，踏出第一步。

在丽塔旁边晃时，我注意到第二件事：她的袋子露出一本黄色红边熟悉的书。书名？只能看到 IC 和 TAIN，但对我已经足够了。那是我正在读的汉斯·卡斯托普在魔山放逐的永恒故事。我问丽塔对那本书的看法，心中提心吊胆，仿佛那本书是我写的。不久，我就发现她读那小说的方式和我完全不同。就小说来说，她很有兴趣知道汉斯如何与舒夏特夫人进行下去，但全然跳过对我而言很有意思的政治、宗教及形而上的讨论——犹太教士纳夫塔和人文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之间的讨论^①。

无所谓，事实上这也是个可讨论的基础。也许可以有更深入的辩论，因为我是犹太人，而她不是。我是那让锌反应的杂质，我是盐粒或芥末。当然是杂质，就在那个时候，《种族保卫》杂志发行了，到处在谈“纯”，而我才刚开始以杂质为傲。真的，直到那时，我的犹太裔对我自己或我的基督徒朋友始终没什么意义。我一直觉得我的出身只是一偶然的有趣事实，没多大意义，就像有鹰钩鼻和痣一般。所谓的犹太人只是在圣诞节时没有买圣诞树，他不该吃香肠但仍照吃，十三岁时学了点希伯来文，然后全忘光。照前面那本杂志的说法，犹太人小气奸猾；但我可不怎么小气奸猾，爸爸也不。

所以和丽塔可有的聊了，但我想象中的谈话并没有燃起任何火花。不久，我就明白丽塔和我全然不同；她不是芥末，她是个穷店主的女儿。对她而言，大学不是知识殿堂，它是一条困难、满布荆棘，但通往

① 《魔山》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作品，描述主人翁汉斯·卡斯托普到一疗养院探病，深受当地环境吸引而留下，并受导师指引，进入知识与哲学思辨的世界。舒夏特夫人、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均为书中人物。

学位、职位和固定薪水的路。从小，她就帮爸爸工作，曾经在乡下小店卖东西，在都灵市大街上骑车送货、收账。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在我们之间产生距离，我反而觉得羡慕，羡慕为她所有的每一件事：她那双照顾得不大好的粗手，她平凡的衣着，她笃定的目光，她悲伤的表情，她对我言谈的斟酌。

我的硫酸锌结果搞得很糟，变成一团白粉，放出令人窒息的硫酸气。我放下它不管，请丽塔让我陪她走回家。天已黑，她家也不近。我自设的目标，客观来说很平凡，但那时对我而言却是无比的大胆；一路上迟疑，谈一些片断的事，感觉如酒醉。最后，发着抖，我用手臂环着她。丽塔没闪开，也没靠拢过来。但我和她齐步，觉得兴奋、得意。好像对未来几年的黑暗、虚无和敌意，我已经打了个小小的，但决定性的胜仗。

Iron 铁

桑德多似乎是铁打的，
他先祖和铁关系不浅；
他告诉我他祖先是铁匠，
打铁打到耳聋，
而他自己看到岩石里的铁矿脉时，
就像看到了老朋友。

化学馆墙外是暗夜，黑暗的欧洲：被骗的张伯伦刚从慕尼黑回来；希特勒不发一弹就进入布拉格；弗朗哥已降服巴塞罗那，入主马德里；法西斯意大利，这个三流海盗已占领阿尔巴尼亚。大灾难的预兆像露珠般凝结在屋里、街头，在谨慎的言谈和昏沉的意识中。

但暗夜并未穿透厚墙。是法西斯的新闻封锁——这政权的杰作——使我们和世界隔离，处于一种苍白、麻痹的过渡状态中。我们三十人通过第一次考试的严苛关卡，准许修读二年级的定性分析化学实验。我们进入那巨大、阴暗、烟雾朦胧的化学馆，就像来到天主的福拜堂，步步戒慎惶恐。以前我做硫酸锌的那个实验室简直像是小儿科。就像小孩玩煮菜，不管怎么样，总会煮出东西来，也许太少，也许不纯。但只有天才猪脑袋，才不会从菱镁矿做出硫酸镁，从溴做出溴化钾。

这儿可不一样：我们要向物质——无情之母——挑战，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了。下午两点，教授给每人整整一克的粉末。第二天我们得完成定性分析的报告，也就是它所含的金属和非金属。要像警察犯罪报告一样，写有或没有，不准模棱两可。每次都是一种抉择，都是一种成熟、负责的审议，感觉干净利落，法西斯教育从没培养这种经验。

有些元素，像铁或铜，很容易而且直接，它躲不了。有些，像铋和镉，就很会骗人，无从捉摸。有一套古老而辛苦的系统研究方法，像压路机和梳子的组合，没有任何东西（理论上）逃得掉。但我喜欢每次发明一种快速的新方法，就像在战场，不打阵地仗而是快速突击。例如，

把水银升华，把钠变成氯化钠，然后在显微镜下检查晶形。在各种状况下，在这儿，和物质的关系变成辩证的，面对面的比画。两边是不对称的对手。一边问问题的是羽毛未丰的小化学家，手边的教科书是唯一伙伴（因为虽然常请 P 教授帮忙，他总维持绝对中立，拒绝提供意见。这倒是个聪明的态度，此时谁开口都可能说错，而教授是错不得的）。另外一边的是以谜题回应的物质，它古老、庄严，如人面狮身。那时我刚开始学德文，对德文 *Urstoff*（“元素”）这字很感兴趣，那字头 *Ur* 表示远古的源头，遥远的时空。

在这实验室，没人废话再教我们怎样防酸、碱、火和爆炸。似乎化学系的粗糙道德观，就是靠天择来选出我们那些能残存下来的。没有什么通风设备，每个学生在分析化学实验时按课本煮出一大堆氯化氢和氨气，所以空中就永远飘浮着呛人的白色氯化铵烟雾，玻璃窗上形成了亮闪闪的细小结晶体。在要人命的硫化氢室里，竟还有人躲在里面吃点心。

在幽暗忙碌的沉寂中，我们听到一个人用皮埃蒙特地区的方言说：“我向大家宣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有铁！”那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就在几天前，当局才宣布关闭红衣主教秘密会议，那是很多人希望的寄托，而宣布这项消息的用词几乎和前句相同。说出这句冒渎的话的人是班上安静的桑德多。

桑德多一向独来独往，他中等身材，瘦而肌肉发达，最冷的日子也从不穿大衣，总穿着磨平的楞条花布灯笼裤，手织毛线长筒袜，有时戴个小黑帽，让我想起托斯卡纳当地诗人佛契尼。桑德多有双长茧的巨掌，粗犷的外貌，晒红的脸，短前额，剪着平头，走起路来大步而缓慢，像农夫。

几个月前，反犹太的种族法宣布了，我也变成一个独行侠。我的基督徒同学们是有礼的人，没有任何同学或老师对我有无礼举动，但我

可以感觉出来他们的疏离。而按原始反应，我也疏远，每次彼此互视都夹带点丝微的疑虑。你觉得我如何？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和半年前一样，不去望弥撒的人，或者像但丁所说的“在你们当中嘲笑你的犹太人”？

我惊讶而愉快地注意到桑德多和我之间有些变化。那不是由于习性相近而产生的友谊。相反地，我们出身差异极大，使我们拥有很多“可交换物”，像两个远方的商贾遇到一起。我们之间也不是那种正常青年人间的奇特亲昵，桑德多和我从来没到那程度。不久我就发现他慷慨、敏感、执着、勇敢，甚至有些傲慢，但此外他有些难以捉摸、桀骜不驯的特质。在我们那年纪，大家都不客气地把心中盘绕的任何事一股脑吐给别人，那是一种需要和本能（这时光可以拉得很长，直到第一次的妥协）。虽然可以感觉他内在丰硕而肥沃，没有任何东西穿透出他矜持的保护壳，除了几次偶然的暗示。他有猫的特质，你可和它住几十年仍穿不透那神圣的皮毛。

我们之间有很多需彼此让步的地方。我说我们是阴离子和阳离子，但桑德多似乎不承认这比拟。他生于北部山区，一个美丽但穷困的地区。父亲是泥水匠。夏天他帮忙牧羊。不是牧心而是牧羊，不是出于自大而是对自然的爱好。他有种独特的模仿本领，谈到牛、羊、鸡、狗时，他很高兴地模仿它们的声音和动作，好像自己变成动物。他教我植物、动物，但很少谈到家庭。小时，他父亲就死了，家庭简单而穷困，因他聪明，他们就决定送他上学，可以赚钱回家；他以皮埃蒙特人一贯的认真服从了，但并不热衷。他一路爬过高中的长路，没花多少力气就得最高分。他对卡图卢斯^①、笛卡儿没兴趣，他有兴趣的是升级，星期

① 卡图卢斯（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7—54年），古罗马诗人，抒情诗为欧洲诗人典范。

天去滑雪、攀岩。他选化学是觉得它比其他学科好。那行业研究的是看得到摸得到的物质，而且比木匠或农夫赚面包要容易些。

我们开始一起读物理，当我试着向他解释我近来混乱学习的一些理念时，他感到惊讶。千百年来的尝试错误，人所获得的尊贵是由于对物质的征服，而我学化学是因为要忠于这尊贵传统。征服物质是了解物质，而了解宇宙和人就必须了解物质。所以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那时候正在努力学——是诗，比我们在中学时吞下的所有诗更高尚庄严，它还押韵哩！如你找寻语言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桥，不必找太远，就在那里，在普通化学课本，在我们烟雾弥漫的实验室，在我们未来的事业中。

最后但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实开放的男孩，难道对法西斯布满天空的腐臭毫无知觉？他能接受一个会思想的人被要求只信不想？对所有的教条、断言、命令，他不感到恶心？他确实感觉到了。那么他怎能忽略这事实：我们所学的化学、物理除了本身是养分外，亦是我们所追寻的反法西斯解药，因为它清晰明白，每一步都可以验证，而且不像报纸、电台充满了空话和谎言。

桑德多静静地倾听，而当我过于浮夸，他总是及时用一两句客气话泄我的气。但他内心有些东西在发酵了（当然不全因我，那些日子是多事之秋），因它既新又古老，使他内心翻腾。直到那时，他只读过萨加里、杰克·伦敦和吉卜林，一夜之间他成为个爱书者。他消化、记住每件事，他内部的每件事都归位成生活的一部分。他开始努力学习，成绩一下从C跳到A。同时，由于潜意识的谢意，也由于要平等，他开始也对我的教育产生兴趣，告诉我其中有漏洞。我也许对，也许物质是我们的老师，政治学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但他有别的老师，它不是分析实验室里的粉末，而是真正、永恒的 Urstoff，附近山上的冰和岩石。他轻易地向我证明我没有足够的资格谈物质。在此之前，我和

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①有过什么亲密关系？我知道如何点火炉？涉过湍流？我熟悉高山的风暴？种子的发芽？不。所以他也有很重要的东西可教我。

一段友情诞生了，而我也展开狂热的一季。桑德多似乎是铁打的，他先祖和铁关系不浅；他告诉我他祖先是铁匠、锅匠，他们在炭火中锻造钉子，覆轮子以铁环，打铁打到耳聋，而他自己看到岩石里的铁矿脉时，就像看到了老朋友。冬天，兴起时，他会把滑雪板绑在脚踏车上，大清早骑着车直到遇到雪地，身上没有一文钱，口袋里一边是生菜一边是水果，然后晚上或第二天回来。睡在草棚里，风雪越大，肚子越饿，他觉得越健康快乐。

夏天，单独出门时，他常带只狗做伴。这是一条表情颓丧的杂种狗；事实上，桑德多告诉我那狗小时候被猫欺负过，边说还边表演。它走得太靠近一窝初生的小猫，恼怒的母猫开始发出嘶嘶声，毛发竖起，但那小狗还没学会这些讯号，站在那儿像个呆子。猫袭击它，追上它，抓破了它的鼻子，此后狗就永久受创。它觉得颜面尽失，所以桑德多做了个棉球，告诉它这就是猫，每天早上给它发泄一顿，恢复它的狗格。同样为了心理治疗，桑德多带它去爬山。他把它绑在绳子一端，自己在另一端，把狗稳放在突岩上，然后往上爬，当绳子拉紧，他慢慢拉上去，所以狗学会鼻子朝天，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爬，还呜呜叫，好像在做梦。

桑德多攀岩主要靠直觉，不是技术，信任他的手力及岩石中的矽、钙、镁。如果没把精力耗光，他会觉得浪费了一天。他向我解释，如果不运动，肥肉会累积在眼睛后面，眼都会凸出来，这可不健康。努力运动会耗掉肥油，眼球就陷回眼座变得锐利。

① 希腊哲学家的元素说，含水、火、土、气。

谈起他的冒险他有些勉强。他不是那种会为了能说它而去做某些事的人（像我）。他不喜欢伟大的话，连话也不爱说。就像爬山，他也没学过怎么说话。他只说核心重点，全不像别人。

如必要，他会带个三十公斤的背包，但通常不用。他有口袋就够了，放蔬菜、面包、小刀，有时是毛了边的山岳指南，还有修补用的铁丝。事实上，他带指南不是因为信任它，恰恰相反。他排斥指南，觉得它碍手碍脚。不止如此，他觉得那是一种可厌的雪、石头和纸混合的杂种。他带它上山是为了贬损它，若找到错他会高兴，即使自己或同伴受损。他可以走上两天不吃东西，或一次吃三顿再走，对他，任何季节都好。冬天滑雪，但不是在那些设备优良、价格高昂的滑坡，对此他的短评是：太穷，买不起上坡穿的海豹皮大衣。他教我如何缝大麻布，一种克难品，它吸水然后冻得像鳕鱼，滑下坡时须绑在腰际。他拉我到渺无人迹的新雪地越野滑雪，凭野人般的直觉找路。在夏天，从一个山崖到另一个，陶醉在阳光和风下，指头划过人类从没碰过的岩石，但并非名山，也不是追寻伟绩，这些事他无所谓。重要的是知道他的极限，考验并改进自己。更模糊的目的是为日日逼近的未来苦日子做准备。

看到山上的桑德多，让你还能认命地活在这世界，忘掉欧洲的梦魇。这是他的地方，他生下来就为此，像土拨鼠一般。在山上，他就高兴，那种沉默而感染的快乐，像点亮的灯。他让我进入与天地的和谐，并注入了我对自由的企求，能力的丰饶，及了解事物的饥渴。我们会在清晨爬出帐篷揉着双眼，太阳即将升起，四周矗立着白色、褐色的群山，清新得好像昨夜才出生，但同时又如此古老。它们是孤岛，是他乡。

有时并不需要到高山或远地。季节间，桑德多的王国是攀岩体育场。离都灵骑车两小时内有好几个地方，我真想知道人家现在是否还去；草堆尖石的渥克曼塔、古明拿之牙、巴塔拿石（意为裸石）、布罗

及沙如等等，都有些朴实的名字，而最后一个是桑德多和他神秘的兄弟发现的：神秘是因桑德多从未让我认识，但从桑德多的言谈看出，他与桑德多的关系与普通人差不多。沙如的意思是“恐怖”，那是一块在满布黑莓和灌木的山丘上竖起的一百公尺高的花岗岩，从底端到顶上有一个狭缝，缝越到顶越小，最后攀岩者不得不爬到岩石的光面上，惊骇不已，颇像但丁的克里特老人。在那时，顶上只有一支岩钉，是桑德多兄弟留下来的。

那些是奇特的地方，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业余者去，桑德多全认得他们。爬时有技术问题，一路还有汗水吸引来的大青蝇，半途则常有长草莓和羊齿植物的岩壁。我们常抓着缝中植物根爬，几小时后到达峰顶，但这并不是峰，大多数是宁静的牧地，牛儿漠然瞪着我们。然后只用几分钟，我们以疯狂的速度沿着布满牛粪的小道冲下山去拿脚踏车。

我们的冒险从不是安详踱步，有时反而更困难，桑德多说到四十岁时，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欣赏风景。二月某天，他说：“让我们去，好吗？”——他的用语是指，既然天气很好，我们下午该出发去爬M之牙，我们商议已久的一座。我们在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不太早（桑德多不喜欢表，它静静的宣示是一种侵犯）离开。我们一头栽进雾中拼命爬，一点左右看到阳光，已到一峰顶的巨石，但爬错了峰。

然后我说我们应可以往下爬一百公尺，穿过山，然后沿着下一条山脊上去；或干脆就爬这座错山好了。但桑德多，以他了不起的怀疑及短短几字说我的建议很好，但从这儿“走轻松的西北脊”（这是讽刺地引用指南），我们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到M之牙。连走错路都不允许，岂不辜负了二十岁的青春。

“轻松山脊”在夏天一定是很轻松，但我们发现它实在令人头痛。向阳的石面是潮的，背阴面结冰，大石块之间的地方是深到腰部的松雪。我们五点才到山顶，我可怜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而桑德多则幸灾乐

祸地哈哈大笑，我有点恼怒。

“我们怎么下去？”

“要下去嘛，到时候再说吧。”然后他神秘地又说，“最糟的情况是必须尝熊肉。”嗯，那夜我们尝到熊肉了，夜晚感觉非常非常长。我们花了两小时爬下来，绳子都冻直了，丢起来困难。七点钟天已黑，我们到一个冻住的池塘边。我们吃剩下的一点东西，在迎风面搭个没用的挡风板，在地上躺下来睡觉，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时间仿佛冻结，我们隔一阵就站起来活动血液，感觉总处在同一时间：风从没停过，总是同样的月影，同样的碎云。我们照书上说的脱下靴子，脚留在袋中。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似乎来自雪堆而不是天上，我们两眼惺忪，四肢麻木地爬起。靴子冻住，敲起来像铃，我们得像老母鸡孵蛋般抱着它许久才能穿。

我们还是拿出精神下了山。旅店老板吃吃窃笑问我们可好，同时瞪着眼睛看我们那副狼狈相。我们轻松地回答旅途愉快，付了账，扬长而去。这就是那——熊肉；多年过去，我后悔我吃得那么少，因再没有任何东西尝起来那么香，那是健壮和自由的滋味，可以犯错的自由，自己做主人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感激桑德多有意地带我找麻烦，我知道这日后帮了我。

那倒没帮桑德多，至少没多少。桑德多的全名是桑德多·戴马斯楚，皮埃蒙特行动党游击队战死的第一人。一九四四年四月，在数月极端紧张活动后，他被法西斯俘虏，拒不投降，反试着从法西斯党部逃走。墨索里尼从少年感化院招募的儿童行刑队，用冲锋枪从背后打穿他的脖子。尸体暴露在路上很多天，法西斯禁止人民埋葬他。

今天我知道想用文字编织一个人，让他在纸上活起来，尤其桑德多，是完全无望的。他不是那种你可以说故事的人，也不是那种你可以立碑的人——他嘲笑石碑。他活在行动中，当行动结束，他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就只有文字。

Potassium

钾

蒸馏是美丽的。

第一，它是件缓慢、安静、哲思式的工作；

然后，从液体转化成气体，

再从气体转回成液体，

一上一下就纯化了，

它是惊奇的。

最后，你在重复一个古老的仪式，

几乎是宗教性的，

从不纯的物质，你得到精华。

一九四一年一月，欧洲的命运似乎注定了。只有自我蛊惑的人还以为德国不会赢。迟钝的英国人“还没注意到他们已输”，还在轰炸下顽抗；但他们是孤军，所有战线都在败退中。只有装聋作哑的人还会怀疑德意志统治欧洲下犹太人的命运。我们已经读了福克特万格^①的《奥培曼兄妹》，是由法国偷运进来的，也读了由巴勒斯坦走私来的不列颠白皮书，内中描述“纳粹的暴行”；我们只是半信半疑，但那就够了。许多难民由波兰和法国来到意大利，和他们谈论时，他们并不清楚在沉默的恐怖笼罩下正在进行的屠杀，但每个都是使者，说着：“只有我逃出来告诉你这故事。”

但是，若要活下去，若要善用年轻的血气，没有其他法子，只有自己捂着眼，如英文这句“我们没注意到”，把危险推到脑后，暂时忘掉。我们也可以抛弃所有的东西，逃到还开放的国家去，如马达加斯加，英属洪都拉斯。但这要很多钱和勇气——而我和家人及朋友们两样都缺乏。况且，从近的看，事情似乎还没那么糟；我们四周的意大利，精确点说，皮埃蒙特和都灵，对我们并无敌意。皮埃蒙特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在此我们不会迷失自己，都灵四周晴天可看到的山，是我们的，是别处所没有的，它教导我们忍耐和智慧。简单地说，皮埃蒙特和都灵是我们的根，虽不庞大却深入广阔，藤蔓缠绕，无法割舍。

^① 福克特万格（Feuchtwanger），德国小说家及剧作家，作品常表现反纳粹论调。

不管是“亚利安”或“犹太”，我们这一代还没想到，人们可以也必须抵抗法西斯主义。我们的抵抗是被动的，限于排斥、孤立和避免污染。反抗的种子没传下来，多年前被一网打尽了。那些最后的都灵大头们：爱因诺迪、金兹堡、孟弟、福亚、齐尼和卡罗·莱维^①都已被送到监狱，放逐去了。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说是空洞的，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四周的法西斯毫无对手。我们必须从头“发明”我们的反法西斯，从我们的根创造出来。我们看看四周及过去，《圣经》、克罗齐^②、几何和物理似乎是信心的来源。

我们在“犹太法典”学校的体育馆集合——古老的希伯来小学被大家很骄傲地称为法政学校，再度学习《圣经》里的正义与不义，以及克服不义的力量，认清新的压迫者，亚哈随鲁^③和尼布甲尼撒王^④。但何处有西奈山，那“圣王”，解除奴隶脚链、淹没埃及战车者？颁布律令予摩西、鼓舞解放者以斯拉与尼希米^⑤的它，未再鼓舞任何人，圣贤不再，天空寂静而空虚，波兰犹太区被毁。慢慢地，逐渐地，孤独无援的想法深入我们心中。天上地下，我们都无同盟，我们只有孤军奋战。所以，我们有内在的驱动力去发掘自我极限：去骑车数百里，去爬我们不熟的山岩，去自愿忍受饥饿、寒冷和疲倦，来锻炼我们自己的耐力。岩钉有没有钉好，绳子牢不牢靠，这些也是信心的来源。

化学，此时对我不是这力量源泉。它导向物质的中心，而物质是我的盟友，因为法西斯最心爱的“精神”是我们的敌人。但到了化学系四年级，我不能再忽视化学本身无法回答我的问题，至少我们所学的化学如此。按加德曼法制备溴化苯或甲基紫是颇有趣，甚至迷人，但与食

① 都是都灵的反法西斯前辈，此时都已流亡放逐，或进入地下。

② 克罗齐（Croce），意大利哲学家与政治家。

③ 亚哈随鲁（Ahasuerus），旧约所记之波斯王，曾欲斩除犹太人，为其妻所阻。

④ 尼布甲尼撒王（Nebuchadnezzar），巴比伦国王，曾摧毁耶路撒冷。

⑤ 摩西、以斯拉、尼希米都是《圣经》中犹太民族之救难者。

谱差别不大。为何要这样而非那样？在中学里被强灌法西斯理论后，所有的未证实真理，在我看来都可疑或无聊。化学定理存在吗？不，所以你还得往前走一步，回到源头，回到物理和数学。化学的起源寒微，或至少暧昧——那是炼金士的窝，炼金士的想法怪异荒诞，他们对金子着迷，他们是骗子和魔术师的综合体。而物理的源头是西方文明的清明理性——阿基米德与欧几里得。我想成为物理学家，也许没学位，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都禁止它。

第四年化学课中有些物理：测量黏度、表面张力、旋光性这些东西。任课的是个年轻助教，又瘦又高，有点驼背，有礼而极害羞，他做事的方式我们不大习惯。其他的老师绝无例外地都自认教的东西极重要，有些是基于信念，有些是个人自尊。但那助教，几乎是向我们致歉地站在我们这边。他那困窘的笑容似乎是说：“我也知道以这种老旧破仪器，你们是做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都只是属于边缘的，更重要的知识在他处。但这是你我必须做的工作——所以请不要毁坏太多，同时尽量学习。”短时间内，班上所有的女生都爱上了他。

在那几个月中，我到处求这个或那个教授收容为学生助理。有些人尖酸地说那违反种族法律，其他人则找些模糊的借口。经过第四或第五次拒绝后，有天我抱着难忍的痛楚骑车回家。我沿着卡罗素街没精打采地骑着，范伦提诺公园那方向吹来阵阵寒风，已是黑夜，街灯也照不透雾气。稀疏的路人行色匆匆，突然我注意到当中一人，他和我同方向慢慢地走着，穿着黑大衣，头上没戴帽。他背有点驼——看来像助教。是的！是他没错。我超越他，不知要说什么，然后又鼓起勇气回过头来，这次仍不敢说。我知道他什么呢？什么也不知道。他可能漠然、伪善，甚至是敌人。然后，我想反正也无可损失，大不了再一次被拒绝，于是，就单刀直入问他能否让我成为他实验室的学生。那助教看来很惊讶，但没有我期待的冗长解释，他直接吐出福音书上的二字：“跟我。”

实验物理研究所内部，都是灰尘和上世纪的鬼魂。有成排装着发黄的文件的纸盒，被老鼠和蟑螂咬得乱七八糟。这些是日食的观测记录，地震记录，还有上世纪留下来的气象报告。在走廊边上，可以看到一只奇长的喇叭，三十英尺以上，没人知道它原来是干什么用的——也许用来宣告审判日，所有隐藏的都得现身。有个风琴管、汽缸，还有一堆各式各样古老的机械，用来做课堂示范：一种病态而聪明的初级物理教学形式，舞台效果重于概念，它既非魔术亦非幻视，介乎两者之间。

助教在他住的一楼小房间接待我，那儿的仪器全然不同，是生疏而令人兴奋的设备。有些分子有电偶距，它们在电场中就像在磁场中的磁针会转向，有些快，有些慢。它们会看条件，或多或少遵守一些定律。而，这些仪器是要搞清这些条件。它们等着有人来用，而他本人正忙着其他事（天文物理，这使我震惊彻骨。啊！我面前就是个天文物理学家，连血带肉！）。而且，他对物质的纯化没经验，需要个化学家，而我就是那受欢迎的化学家。他高兴地把场所及仪器交给我。场所是两平方米的桌子，仪器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斯特保天平和共振器。我已知第一样，不久我也弄熟第二样，基本上是个无线电接收器，目的是量两个频率的差别，很灵，如果实验者移动椅子或有人进来，它就叫得像只看门狗。一天当中某一时段，它放出一堆神秘的讯息，像摩斯密码、嘶嘶声、扭曲的人声、外语或意大利语，但都是听不懂的秘语。它是战争中的无线电巴别塔^①，由飞机战舰传来的死亡信号，越过群山大海，天晓得是传给谁。

在山海之外，助教告诉我有位学者叫翁萨格^②，他对这个人一无所

① 巴别塔，《圣经》中诺亚后裔向西迁移，并在示拿定居，并为留名后世及防止族人分散，建城墙与高塔。

② 翁萨格（Onsager），挪威出生的美国化学家，1968年获诺贝尔奖。

知，除了翁萨格导出一个方程式，声称可以解释所有液体中极性分子的行为。在稀释溶液时，那方程式很好用，但似乎没人去研究它对浓缩溶液、纯液体及混合液的功效。这是他建议我的工作，准备一些复杂的液体，看看它们是否遵守翁萨格方程式，我很兴奋地接下这工作。第一步，我需做一些他不会做的事；在那时代不容易买到纯物质来做实验，我应先花几星期纯化苯、氯化苯、氯化酚、胺基酚等等。

几小时的接触就足以看出助教的性格。他三十岁，刚结婚，希腊裔，但来自特田斯特，懂四种语言，爱音乐、赫胥黎、易卜生、康拉德和托马斯·曼，尤其爱最后一人。他也爱物理，但他觉得任何有目标的活动都可疑，所以他有些高尚的懒散，自然也讨厌法西斯。

他和物理的关系困惑我。他毫不迟疑地刺破我的期望，证实我们从他眼里得到的“边缘无用论”印象。不只是我们学生的实验，而是整个物理都是边际的，它的本质是从宇宙的外观规则着手，而真理、实体、人与事的本质则在他处，在面纱之后，或是在七重纱（我不很记得）之后。他是个勤奋的天文物理学家，但无幻念：真理在望远镜达不到的地方。这是条长路，他走来充满荆棘、惊奇和快乐。物理是诗篇、心灵运动场、创造之镜、人类控制自然之钥。但创造者、人和地球的位置在哪里？他的路遥远，他才刚开始；我是他的徒弟，我愿跟他走吗？

那是个吓人的请求。做助教的徒弟对我而言每分钟都快乐，一种无阴影、从未有过的经验。更深刻的是，我确定这关系是相互的。我，一个犹太人，为时代的动乱所排斥于社会之外，是暴行的对象，但还不到以暴制暴的地步。我应是他理想的对话者，一张上面可以写任何东西的白纸。

我没有登上助教给我的神驹^①。那几个月，德国毁了贝尔格莱德，

① 原文 hippogriff 是神话中半马半鹭怪兽，此处指改行学天文物理，飞向天空。

冲破希腊的抵抗，空袭克里特岛；那才是真的，才是实在的。我没有其他逃路。最好是留在地上，老老实实地玩电偶距，纯化苯并预备面临未知的悲剧。在战时条件下，准备苯可不简单。助教宣称我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从地下室到阁楼到处搜寻，搬走任何仪器，但我不能买任何东西，他自己也不能，这是完全的自给自足政策。

在地下室我找到一大桶百分之九十五纯度的工业用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但手册规定要分馏它，最后蒸馏时要加入钠来去除残存水分。分馏意思是部分蒸馏，丢弃那些沸点太高或太低的部分，只留下“中心”部分，它的沸点须固定。在地下室宝库中，我找到所需的玻璃器皿，包括维氏分馏管，一种需要玻璃匠超人毅力的艺术品，美得像镶花缎带。但（偷偷告诉你）它效率可疑。我拿一小铝锅作加热用。

蒸馏是美丽的。第一，它是件缓慢、安静、哲思式的工作；你虽忙但有时间想其他事，有点像骑脚踏车。然后，从液体转化成气体（看不到），再由气体转回成液体，一上一下就纯化了，它是惊奇的。最后，你在重复一个古老的仪式，几乎是宗教性的，从不纯的物质，你得到精华，而历史上最早则是蒸馏温暖人心的酒。我花了两天得到些足够纯的部分。因为要用火，我躲到二楼一个没人的小房间去。

现在我得加进钠蒸馏第二次。钠是一种退化的金属。它的金属意义是化学面的，不是一般语言指的金属。它既不硬也不韧；它软得像蜡，它不光不亮。除非你拼了命照顾它，不然它立刻和空气作用，使表面盖着一层丑陋的外壳；它和水反应更快，它浮在（一个会浮的金属！）水面跳舞，放出氢气。我翻遍整栋楼也找不到钠，只找到一大堆封管剂，各种古怪的药，显然几辈子都没人碰过，就是没有钠的踪影。但我找到一小瓶钾。钾是钠的双生兄弟，所以我抓了它回到我的隐居间。

照手册写的，我在苯中放“半个豌豆大”的钾，然后开始蒸馏。蒸馏完后，我规矩地灭火，拆开仪器，让瓶中余液冷却，然后用长夹取出

“半个豌豆”的钾。

前面说过，钾是钠的双生兄弟，但它和空气、水反应更剧烈，谁都知道（我也知道）它碰到水不但产生氢，而且烧起来。所以我待它像圣物，把它放在干滤纸中包起来，下楼到院子里，挖个小坟，把这小鬼的尸体埋了，再小心地盖上土，回去工作。

现在烧瓶空了，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下，打开水龙头。我听到砰的一声，一道火焰从瓶口喷向窗子，四周的窗帘立刻起火。我还在蹒跚地找东西灭火时，百叶窗开始烧焦起泡，房间里到处是烟。我找到一把椅子，拉下窗帘，丢到地下拼命踏，烟熏得我半瞎，太阳穴血脉偾张。

破碎的窗帘熄火之后，我呆立了好几分钟，两腿发软，茫然望着灾难后的遗迹。气喘过来以后，我下楼去告诉助教发生的事。如果说在痛苦时回忆美好时光是悲伤的，那么现在安详地坐在桌前，回想那痛苦时刻，可真是衷心的满足。

助教礼貌地注意听我说，但面带疑问：谁叫我去干这事呢？如此大张旗鼓地蒸馏苯？可以说算我活该。有些事就是会发生在那些只在圣殿前混混但就不进去的人身上。但他没说什么重话，只是借机（总是不太情愿地）指出一个空瓶子不可能着火，如果着火里面一定不空。里面除了空气外，一定还有苯蒸气。但从没人见过苯自己会烧起来，只有钾可能自燃，而我已取出全部钾。真的是全部吗？

我说全部，但开始心虚，回到犯罪现场后在地上找到碎片。在其中一片上，有几乎看不到的一小片白粉。我用酚酞指示剂试了一下，是碱性，那是氢氧化钾。罪魁找到了，在瓶壁上一定还沾着一小片钾，它只要有一点倒进的水，就反应起火点燃苯。

助教带着些微的反讽表情看着我：不做总比做好，沉思比行动好，他的天文物理是巨大不可知的起点，我的化学是恶臭、爆炸和小秘密。我则想到另一个比较实际的教训，我相信每一个强硬派的化学家都同

意：不要相信“几乎一样”（钠几乎和钾一样，但如用钠就没事）、“实际上相同”、“代用品”，以及各种凑合物。差异虽小，但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像铁轨的转折点。化学这行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些差异。见微知著，这不只是化学。

Nickel

镍

年复一年，山谷就慢慢塞满碎石和灰尘，
碎石中仍残留的石棉使它有点滑，
像冰山一样慢慢滑动下去，
大约每年滑十公尺。

它对山壁的压力大到在岩壁压出很深的横纹。

山下的房子每年也往下陷几英寸。

我住的那房子叫“潜艇”，

就是因它正静静地往下沉。

在抽屉里，我有一张精美的毕业证书。上面以高雅的字体写着：普里莫·莱维，犹太族，荣获特等绩优（*summa cum laude*）化学博士学位。因此，这是张暧昧的文件，一半荣耀一半嘲讽，半是赦免半是判决。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它就躺在那儿，而现在已是十一月末。世界正奔向灾难，而我四周却什么也没发生。德军像洪水般淹没波兰、挪威、荷兰、法国、南斯拉夫，并且像刀切牛油般深入苏联大草原。美国还没有出兵帮助孤立的英国。我则失业，为找任何能糊口的工作耗尽力气。在隔壁，得癌症的父亲只剩几个月可活。

门铃响起，来了个着意大利军装的瘦高年轻人。我立刻意识到来了天使救星，拯救灵魂的使者。简单说吧，每人都在等待前来宣告命运的人，等他开口才知是好还是坏。

他开口了，有很重的托斯卡纳腔，要找莱维博士，真是我哩，我还不习惯这头衔。他文雅地自我介绍，并要聘用我。谁介绍他来的？另外一个使者，卡西里老头，那个P教授的不屈不挠的捍卫者。我文凭上的“绩优”总算有用了。

中尉显然知道我是犹太裔（反正我的姓也让人无从怀疑），但好像并不在意。而且，好像有意找的，他有点为打破种族隔离法令而稍稍得意。他是我们秘密的同盟。

他给我的工作颇为神秘有趣。“在某处”有一矿场，只从其中取出百分之二的有用物质（他没说是什么东西），其余百分之九十八的无用

物质，就堆在附近山谷没被用到。在这“无用物质”中有镍，虽然含量很少，但镍价很高，应该考虑提炼。他有些主意，但因身在军中，缺乏自由。而我就来代替他在实验室中试验他的主意，如成功就想法和他一起大量生产。显然，这是要我搬到“某处”。我的搬迁要在双重保密下进行。一方面，因为这“某处”是在军事管制之下，我不能让人知道我的真名和低贱的血统，以便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为保障他的主意，我要发誓不向任何人透露。事实上，一个秘密会加强另一秘密，所以，就某种程度而言，我的贱民身份是再好不过了。

他的主意是什么？“某处”在哪里？直到我确定接受以前，中尉告罪不能说，这当然。只大约知道“某处”离都灵有几小时车程，而主意是使“无用物质”转成气体以便反应。我马上和双亲商量。他们同意了：爸爸生病，家里急需钱。至于我自己，根本毫不犹豫：我感觉没有工作使我无奈，而对化学又很有自信，愿意一试。而且，中尉引起我的好奇，我喜欢他。

可以看出，军服让他不自在，选择我一定不止于实务考量。他含蓄而轻蔑地谈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我不难看出他的态度。这整代意大利人反讽式的轻快态度，足够慧黠和诚实而不信法西斯，太怀疑所以不积极反抗，太年轻所以不能消极接受那将至的悲剧。天意介入的种族法律，让我提早成熟做了人生选择，不然我也就属于那样的一代。

中尉确知我同意后，立刻约定明天在火车站会面。准备什么？我不大需要什么：当然不要任何文件（开始时，我连假名都没有，以后看着办），一件衬衫，也许书吧。至于其他，没有问题：我会有间有暖气的房间，一个实验室，定时供餐，一组工作人员，同事们是好人，但他劝我别混得太亲热。

我们一起出发，下了火车，通过森林爬了五公里山路到达矿场。中尉匆匆而认真地介绍我给主任，一个高个子精干的年轻工程师，比中尉更一板一眼，显然已经知道我的来临。我被带到实验室，那儿只有一个

人等着我。一个骨瘦如柴的女孩，约十八岁，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一双斜而绿色的精明眼睛，说是我的助理。

饭是送到办公室的，吃饭时我听到广播报告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向美国宣战。一起吃饭的同伙（中尉和一些职员）对这则新闻的反应不一：包括中尉在内的几个人，小心地望我一眼，有些则担心地评论着，也有人则好战地坚持这更证明了日军和德军是无敌的。

就这样“某处”具体化了，但仍是魔境。是的，所有矿场本身自古以来都像魔术般不可思议。地下五脏内都是 kobolds 和 nickel（即德文的“精灵”或“怪魔”）。镍（nickel）这个字就源自这里。这些怪物可以大方地引导你的锄镐找到宝物，或是蒙骗欺眩你，让硫铁矿像金子，把锌装得像锡。事实上，很多矿物的名字，其字源的意思是“欺骗、仿冒和昏眩”^①。

工厂建在隧道口下方，沿山坡的一排平台上，在那儿，矿石被巨大的机器压碎，主任几乎带着孩子气，兴奋地跟我描述那机器。那像是一个倒放的巨钟，喇叭花状，直径四米，钢制的。在中央，从上而下有个大锤子。它振动的幅度不大，但足够在瞬间把从推车倒下的石头压碎，然后从底端送出如人头大的小石头。操作时，会发出有如地狱般的隆隆巨响，烟灰好远都看得到。接下来，石头继续压碎直到变成沙石，然后弄干、筛选。不难明白，最终目标是取出岩石中那百分之二的石棉。剩下的就在山谷中到处乱倒，一天有好几千吨。

年复一年，山谷就慢慢塞满碎石和灰尘，碎石中仍残留的石棉使它有点滑，像冰山一样慢慢滑动下去，大约每年滑十米。它对山壁的压力

① 镍最早采自德国萨克斯森的砷化镍矿，它外表很像氧化铜，矿工无法从中提炼出铜，认定是魔鬼捣蛋，而称为 kuppennickel（铜魔），后来发现不含铜而含镍，因此“铜”字去掉，剩下的“魔”字即指镍。元素钴也源自 kobolds（精灵），今名为 cobalt。

大到在岩壁压出很深的横纹。山下的房子每年也往下陷好几英寸。我住的那房子叫“潜艇”，就是因它正静静地往下沉。

到处是石棉，像雪一般。书放在桌上只要几小时，再拿起时就留下书影。屋顶盖了厚厚的灰，下雨时雨水就像从海绵渗出，直到突然整大块从屋檐掉下。矿场工头是个叫安泰斯的肥胖巨人，留着浓厚而黑的大胡子，有乡土味。他告诉我说，多年前一场连续大雨，从矿场壁刷下几吨的石棉，塞住排水口，其上漏斗的地形，积了有两万立方米的湖水。没人管它。只有他看出麻烦，向主任坚持要处理。身为好工头，他主张湖底炸开个洞解决。但又是这，又是那，危险呀，要请示上司呀，没人要做主，直到矿场自己做决定。

当那些人还在讨论时，忽听到一声闷响，塞子破开了，大水向下冲，冲走许多车子，场区变成废墟。安泰斯指给我看洪水留下的痕迹，离地面足足有两米。

工人和矿工（当地人称矿员）来自附近村子，每天由山路走两个钟头上工。职员就住在场里。平原只有五公里之遥，但矿场就像个独立王国。当时外头靠配给和黑市运作，但矿场没什么供应问题。没人知道怎么搞的，但大家就是什么都有。许多职员有自己的菜圃，有人还有鸡舍。常常，某人的鸡溜到别人的菜园去破坏，引起烦人的争吵不快。这实在破坏主任的要求及当地的宁静。他不愧为主任，订下个妙法。他买了把猎枪挂在他办公室中。任何人若从窗口看到自己菜圃中有别人的鸡，就可来拿枪轰它两发，但可得是现行犯的鸡。如鸡死在他园里，就是他的。这就是法令。法令订下的头几天，枪被抢用了好多次，每一次大伙儿就下赌注，但几天后侵犯事件就消失了。

还有其他奇妙故事，譬如皮斯塔米格罗先生的狗。我到此地时，这位先生已经离职多年，但他的事迹鲜活，成为传说。这位皮斯塔米格罗先生是个高明的领班，不再年轻的光棍，很有智慧，为人庄重。他的狗

是只漂亮的德国牧羊犬，也同样庄重而受尊敬。

有年圣诞节，山谷中的村子里最肥的四只火鸡失踪了。真可惜，也许是狐狸干的好事，事情到此为止。但第二年冬天，十一到十二月有七只火鸡消失。当地警局接到报告，但要不是有天皮斯塔米格罗醉酒时说多了话，这案子永远也不会破。偷火鸡的贼就是他和他的狗。有个星期天，他带狗到村中乱逛，对那狗指点那些肥美又无人看管的火鸡，解释每次作案的最佳策略，然后他们回家。到晚上他就放狗出门，狗就像真狼一样跳过篱笆，掘洞进入鸡舍，静悄悄地杀了鸡带回来。看来皮斯塔米格罗先生并没卖火鸡，按最可信的版本，他把它们送给他的众多爱人，老的、丑的，都散居在皮埃蒙特阿尔卑斯山谷。

好多好多故事，据我所闻，当地五十个人，每两人之间都有过节。排列组合算算，你可知那有多少。尤其是男人对每个女人，从老处女到有夫之妇，女人对每个男人也同样。我只要任意选两个名字，最好是一男一女，问第三者：“他们两人，怎么了？”哎呀我的妈，一连串美妙的故事就倒出来了。反正，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故事。我搞不懂这些很复杂私密的事为何都很随意地传播，尤其是对我这连自己名字都不能透露的人。但这似乎是我的命运（我绝非抱怨），我是大家都信得过所以来吐露故事的人。

我听到一个远在皮斯塔米格罗先生之前的故事，有许多版本。那时，下班后的办公室成了罪恶之城。每晚，五点半下班钟响后，大家都不回家，从柜里，酒和席垫都被拉了出来，一场狂欢，每人都有份。从少年的抄写员到秃头的会计，从主任到残障的看门人。白天冷静的公文往来转换到晚上无限级别的淫乱。当时的人没有一个留到现在，所以没有直接见证。后来，一连串账务的灾难，逼使米兰的董事会进行全面大肃清。每个人都被炒鱿鱼，除了波多拉索夫人，她一定看到也知道每件事，但因她极端内向，她不讲。

反正，除了工作必要，波多拉索夫人和谁都不说话。她得这名字之前，叫作季娜·德·本内，十九岁时已是场里打字员，爱上一个年轻的红发矿工。他并没真的追求她，但还是接受她的爱。但她家人可很坚决。他们好不容易供她念书，她总得弄到个像样的婚姻，而不是胡乱钓上任何人。女孩拒绝讲道理，他们就下最后通牒：不是甩掉那红头，就是滚出家庭和矿场。

季娜愿意一直等到二十一岁生日，但红头可不等她。某星期天他和别的女人玩去了，接着又是第三个，后来娶了第四个。季娜于是做了个残酷的决定，如她不能和她爱的人——那唯一的人结合，好，那就永没有第二人。不是做修女去，她有现代观。但她以一个狠心的方式禁止自己结婚，就是让自己成为已婚妇人。当时，她几乎已是主管了，非常能干，有钢铁般记忆，极为上司所依赖。她让每个人，她双亲、她上司，都知道她要嫁给场里的傻瓜——波多拉索。

这波多拉索是个中年工人，壮得像驴，脏得像猪。他极可能并不是真的白痴。可能是我们皮埃蒙特人说的，那种装傻、躲避责任的人。躲在蠢蛋的烟幕之下，波多拉索是个极端无能的园丁。好了，大家宣告他无能后只有忍受，还让他干活过日子。

被雨水泡过的石棉很难萃取出来，所以场里的雨计很重要。它置于花圃中央，主任每天亲自看数据。波多拉索每天浇花，也就浇那雨计，结果数据大乱，生产大烂。主任（过了一阵子）知道了，命令他停止浇。波多拉索想“他喜欢干的”，每次下雨，就去把雨计倒干。

当我到来时，状况已稳定下来一段时候了。季娜，现今的波多拉索夫人，差不多三十五岁。原来的美貌已变僵硬、冷漠，一种老处女的神态。每个人都知道，她仍是处女身。因为波多拉索到处讲。这本是当初结婚时讲好的条件，他当时也接受了。但后来，几乎每晚他都试着上她床。但她拼了命抵抗，抵抗到今。绝对，绝对，尤其是他，不能再有男

人碰她。

这每夜的战争是矿场最吸引人的话题。在某一温和的夜晚，一群好事的家伙拉我去听大战。我拒绝了，他们不久失望地回来。他们只听到伸缩喇叭吹奏《小黑脸》^①。他们解释有时会是如此结局：他是个有音乐细胞的蠢蛋，奏乐来泄愤。

打第一天，我就爱上我那工作，虽然在那阶段只是对石头做定量分析。溶之于氢氟酸，然后用氨水沉淀铁，用二甲基乙二醛肟沉淀镍，用磷酸沉淀镁。每天都同样地重复，不是很有意思。但另一种感觉是新奇有意思的：分析的对象不再是无名配制出来的物质谜^②，那是真的从地下炸出来的石头，一天一天累积的数据将拼凑出地下矿脉。读过十七年来那些希腊动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③学校功课之后，第一次感到学的东西有用。枯燥无趣的定量分析变成活生生有用的东西。它成为马赛克镶嵌图中的有用一部分。我用的分析方法不再只是书上的教条，它每天都被检视考验，可以为特别目的而巧妙地修改。犯错不再是考试答错那种有些可笑的意外，犯错是像爬山——竞赛般严格的事，它让你学会更精准。

实验室中的女孩叫爱丽塔。她袖手旁观地看着我这兴奋的新手。她事实上有点吃惊、恼火。但她还蛮亲切的。她高中毕业，会背品达^④和萨福^⑤的诗，是当地法西斯小官员的女儿，是个狡黠、懒散的女孩，什么都不在乎，更不要说是向中尉学来的石头化验技术了。她也像其他人，和好些人混过，在我面前，她也从不掩饰。因为争风吃醋，她和许

① 一首当时流行的法西斯歌曲。

② 这是化学系训练学生的方式。

③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公元前 431—前 404 年间，雅典及其附属城邦对抗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

④ 品达 (Pindar)，古希腊颂诗作家。

⑤ 萨福 (Sappho)，古希腊诗人。

多女人打过架，和好几个男人稍稍恋爱过，和一人大谈恋爱过，但和另一个阴沉、平凡的家伙订婚。他在技术部门工作，是她家为她选的故乡。这，她也不大在乎。她能怎样？反叛？逃婚？不，她来自好人家，她的前途是儿女和厨房。萨福和品达都是过去的事，镍只是暂时的补白。在实验室，她动作懒散，等着那没什么好期望的婚姻。马虎洗沉淀物，称那含镍的沉淀。我花好多时间说服她不要假造数据，一件她承认常干的事，反正这也没伤到任何人，可以让主任、中尉和我都高兴呀。

让中尉和我绞尽脑汁的化学到底是什么呢？就像厨房里的水和火，没有什么稀奇。只是味道较差的厨房，飘的不是家里的香味，而是刺鼻臭味。也有围裙、打浆机、被烫到的手，和一天终了时的清洗。爱丽塔一辈子躲不了这些。她抱着意大利人怀疑一切的态度，若无其事地听着我在都灵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是删改过的，因为她和我必须玩这隐名埋姓的游戏。但过了些日子，总还是透露了一些。几星期之后，我发现我不是个没姓名的人。我是不能当面被叫莱维的莱维博士，必得守这礼节以免制造问题。在这轻松而小道八卦盛行的矿场，我这隐名、温和的流浪人的确引人好奇——爱丽塔承认的。他们常常讨论着，各有说法，从法西斯秘密警察到高层人士都有。

下去到山谷是不大舒适的事，对我也不大妥当。由于我不可以拜访别人，晚上在矿场颇为无聊。有时，晚饭后我会留在实验室读书或思考镍的问题，有时则把自己关在“潜艇”小房里读托马斯·曼的小说。有月光的夜晚，我常沿着山路散步到矿坑顶，暗夜常被山谷下的狗吠声划破，矿砂场有神秘的沙沙声，似乎真有小精灵在下面筑窝。

当时，爸爸在都灵快死了，美军大败于巴丹岛，德国拿下克里米亚，我感到张开的陷阱即将收网，这些漫步可以安慰一点苦楚的心。内心对自然产生的信心，其力量比学校教的东西更强。那些石头、沙子是我即将失去的自由之岛。

对石头发生的脆弱而不安的恋慕，我有双重的情结。第一次是与桑德罗的远征，然后是这化学研究，试验分离其中的宝物。从这磐石之爱与满布石棉的孤独长夜中孕育了两篇自由诗章。一篇是有关猎铅先驱者的冥想，另一篇是在那段时间恰好阅读到特里斯坦岛^①以后写下的流动水银之幻想。

中尉在都灵服役，只能每星期上来一次。他会检查我的结果并建议下星期的工作，是个不错的化学家、敏锐的研究者。短期的适应以后，我们形成了一个目标远大的计划。

岩石中是有镍，但很少。我们分析出来平均只占千分之二。比起加拿大和新喀里多尼亚的矿，镍含量可笑地少。但也许可以浓缩它？在中尉指导下，我试了所有法子：磁分离、浮选、筛选、摇晃。都没办法，镍含量还是和原来一样。大自然太不帮忙了，我们的结论是镍和二价的铁像兄弟般如影随形分不开。铁占百分之八，镍是只有千分之二的小弟弟。所有要用的试剂都要加到四十倍的量，先得满足那多量的铁，还没把镁算进来呢。真不划算。

在无奈的时候，我四周的岩石——阿尔卑斯山麓的绿蛇纹石——看来就像是凶恶、顽固的恒星。比较起来，山谷刚开花的树，施放欢欣的花粉，随着气候冷暖，跟着太阳默默地转，像人一般生老病死。岩石并不能储备能量，太古以来已熄了火，只是恶狠狠地矗立在那里；我则一城一城地去攻取那精灵，那无常的 *kupfernickel*，它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地露露它的尖耳朵，从我锄头下躲过，无从捉摸，让我空手而回。

但这不是中古时代谈神论灵的时候了。我们是化学家，是狩猎者，

① 特里斯坦岛 (Tristan da Cunha)，南大西洋一群岛，隶属于原英国殖民地圣赫勒拿，距南非很近。

只有两条路，成功或失败，杀死白鲸或船沉海底，不能向难以理解的物质屈服，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来这儿就是要犯错再更正，受罪得正果。我们不可感觉无能为力，自然广漠无边但非不可解。我们得见缝插针，找漏洞征服它。每周和中尉的讨论像是战术方案。

我们考虑过用氢气来还原那岩石。把磨碎的石头放在石英玻璃管中的坩埚，通之以氢气并从外加热，希望氢能把束缚着镍的氧除去，还原成金属态的镍。金属镍像铁一样具有磁性，那么按方案，应该可以用小磁铁来把镍和铁吸出来。但处理之后，把强磁块放在悬液中搅了半天，只能得到一点点铁。明显而悲哀的事实：氢没法把镍和铁还原出来。镍仍然紧密地和矽酸盐（石头成分）结合，不愿另找去处。

但假若把那结构打散呢？有一天，偶然翻到以前矿场的化学师制的一张图，一个主意像灯一样在头上亮了。那张图显示当石棉被加热时如何失重。石棉到一百五十摄氏度时会失去一点水分，然后维持同样重量直到八百摄氏度，在该温度突然损失百分之十二重量。作者说：“变脆弱。”而蛇纹石是石棉的来源，如果石棉在八百摄氏度分解，那蛇纹石也应该如此。既然化学家不能没有模型，我就在纸上画下长链的矽、氧、铁和镁的原子排列构造，再画一点点镍原子夹在当中。当长链因分解变短之后，镍就露出来而能加以处理了。史前人类在阿尔塔米拉穴壁上绘羚羊，希望第二天打猎能有好运，我似乎有类似的感觉。

这感觉没有陶醉太久，中尉随时会来，而我怕他不接受我这很不正统的假说。但我已全身发痒，要干就干，最好立刻动手。

“假说”让人整个活了过来。已经是下午了，爱丽塔频频看表，怀疑地望着我，我则一阵旋风般开始做。一会儿，设备就装了起来，温度计定在八百摄氏度，压力也设定，流量计调整好。我把原料加热了半小时，然后降温，再通氢气一小时。这时，天已黑，女孩走了，除了筛选组的机器哼鸣声外，一切安静。我觉得自己半是阴谋家，半是炼

金土。

时间到了，我从石英管中拿出坩埚，在真空下冷却，把粉末分散在水中，它从绿变成土黄色，似乎是好兆头。我就丢进磁铁。每次拿出磁铁，它就带出一些褐色粉末。我小心地用滤纸把它取出来，每次也许只有千分之一克。分析工作要做好至少需半克，也就是好几小时的工作。半夜时，我决定停止这分离的工作，因不愿再延迟接下来的分析。我试了一个简化的手续。清晨三点时我得到结果，不再只是通常的少量，而是大批的沉淀。过滤、洗濯、干燥、称重。最后得到的东西，百分之六是镍，其余是铁。一大胜利，甚至不必再分离，就可以去做镍铁合金了。回到“潜艇”时，天几乎亮了，我真想立刻叫醒主任，打电话给中尉，去草地打滚。脑里转着各种愚蠢的想法，没法冷静。

我想的是已打开了一扇门，这把钥匙还可能打开好多门。我发现了一个没人想到的方法，连加拿大、新喀里多尼亚那边也不知道。虽然敌人已近，我觉得所向无敌。最后，我认为对那些宣告我族低贱的人是项甜蜜的报复。

我没想到可能的工业应用，生产的镍很可能全部用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弹壳和战车上。我也没想到就在那几个月里，阿尔巴尼亚发现丰富的镍矿，使我的、主任的和中尉的计划都得停止。我也没预见我对磁分离法的解释并不正确——当我告诉中尉结果时，几天后他立刻证明了我的错误。对大量更粗糙的粉粒，我的方法并不实用。我也没预见，当主任与我分享几天兴奋，了解大型磁分离工作行不通后，就对计划喊停了。

但这故事并没全完。虽然几年过去了，通商也自由化了，国际镍价也下跌了，那山谷下藏着的大量宝矿仍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在那介于化学与魔术之间的界线，仍有人半夜去那矿场偷矿，试验各种磨、煮、烧

的新方法。每吨废石含两公斤贵重金属的地下宝物，使人们的好奇还没消失。

我那时写的那两篇矿物故事也没消失。它们几乎和我有一样曲折的命运；曾经过轰炸和逃亡，我以为早已遗失，最近却在几十年前的旧文件中找到。我不愿丢弃它们，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就要在正统化学故事中间插进这些幻梦曲。

Lead

铅

铅是种代表死亡的金属，

因为它象征死亡。

它重，

倾向坠落，

而坠落是死尸特性，

它颜色是死色，

它代表天上最慢的行星，

死亡之星。

我叫罗德孟，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家乡是西奥达，至少自己人是这样称呼的，但我们邻乡敌人给我们取了不一样的名字——沙克散、尼梅、俄拉曼。我们家乡和这里不一样，它有茂密的森林、大河、长冬、沼泽、雾和雨。我们的人民——我指那些说我们的语言的——是牧羊人、猎人和战士，他们不喜欢耕田。事实上他们蔑视农夫，把羊群赶到农夫的田里践踏，掠夺他们的村庄，俘虏他们的女人。我既不是牧羊人亦非战士，连猎人都算不上，虽然我这行业和打猎差不远。与土地结合但自由自在，我不是农夫。

我们罗德孟家族一直干这行，亦即熟悉一种重石，去远方找它，按祖传秘方加热，从中取得黑铅。在我家村庄附近，有个祖先曾找到一块巨大的矿床，他们叫他蓝牙罗德孟。那是铅匠的村庄，每人都会熔炼铅，但只有我们罗德孟家族的人知道怎么去找真矿，而不是神撒在山上那些用来骗人的重石头。神让金属矿脉在地下生长，但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能找到的人是和神比高下，所以神不爱他，试着迷惑他。它们不爱我们罗德孟家族的人，但我们不在乎。

五六代以后，矿床枯竭了。有人说要挖坑进矿脉到地下深处，也真干了，结果亏损一场。最后大家都放弃，回到老本行。但我可不，铅没有人见不了天日，人没有铅也没法生活。这行业可发财，但也让人短命。有人说是血进了铅，坏了血；又有人说是神的报复。但反正短命对我们罗德孟家族的人来说没什么关系，我们富有、受尊敬、周游世界。

事实上，我那蓝牙的远祖是特例，他找到的那块特别丰富。通常，我们到处云游。据说，他自己也来自远方，那儿太阳很冷，从不落下，人民住在冰屋里，海里怪物有千英尺长。

所以六代以后，我再旅行，去找那石头让人们炼制，教他们这炼法，来换取黄金。我们罗德孟家族的人是魔法师，把铅变成金。

还年轻时，我就独自离家朝南走。走了四年，从一区到另一区，避开平原，登上山谷，用锤子敲地，成绩一直不大好。夏天，我下田，冬天我靠编织或我带的金子过活。我说过我是独行的，女人得生男孩延续香火，但我们路上不带女人。她们有什么用？她们不学探矿，经期来时碰了它，还会让它变成死砂。路上遇到的女人，只能一夜情地玩乐，别想明天，明天只能千山独行。当年华渐老，发落齿摇，肌酸骨疼，最好是自己走。

我到了一个地方，晴天可看到南方远处连绵的山脉。春天时，我决定再走，要去那儿。我受够了那些黏土，什么用处都没有，只能烧瓦罐，既乏味又没价值。山上不一样，地球之骨的岩石暴露在那儿，马靴踏上发出的声音就可让人分辨它不同的品质，平原不是我们的地方。我会到处问最好走的隘口在哪里。我也问他们有没有铅，哪儿买的，多少钱。价钱越好，我就越在附近找矿。有时，有人不知道铅是什么，我拿随身带的铅块给他们看，他们会取笑它的柔软，笑问在我国是否用铅制剑做犁。大多数时候，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不知我说的，只能问面包、牛奶、床、女人和第二天的路，就这么多。

盛夏，我经过一个隘道。日正当中，但高山草地上还有残雪。往下一点，可看到山路、羊和牧羊人，远处可见深谷，深到似乎还在黑夜里。我下山找到村庄，是一个不小的溪边村子，山上的人下来交易羊、马、乳酪、皮毛和酒。听他们讲话，我几乎要发笑，他们的语言很粗糙，像动物叽里咕噜的，然而我很惊讶他们像我们一样有武器、工具，

有些还更精良。女人也织布，房子是石头盖的，虽不美但坚固。有些是木头的，离地撑起几英尺以防老鼠，看来还是很聪明的做法。屋顶不是茅草而是扁石瓦。他们不知有啤酒。

我立刻注意到山谷高地的石头有洞，还有一堆堆的碎石，是有人在此地探勘。但我一个外人不敢乱问，以免招疑。我下到水流湍急的溪边（我记得水浑浊，带灰白，好像混了牛奶。我们家乡没见过这），仔细检查石头。这是我们的秘诀之一，石头从上游下来，懂的人可看出端倪。各种石头都有，燧石、绿石、灰岩、花岗岩，甚至有点我们所谓的加美达岩，这些我都没兴趣。但我认定在这样的山谷，有白纹红石，有那么多铁成分，一定有铅岩。

我一会儿爬巨石，一会儿涉流水，沿溪而下，眼睛盯着地面，像头猎犬一路找。哇！在和一小溪汇合之处，我找到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一块带黑点的灰白石头，遂像头猎犬立刻静止不动。我拾起来，感到沉重。它旁边还有一颗小一点但一样的石头。我们很少犯错，但为了确认，我敲碎一块，取一小片带回试验。一个认真的探矿者，不想自欺欺人，就不能只从外观判断。因为石头虽是死的，可也会骗人。它会像一些变色蛇般改变颜色，甚至就在敲它的时候。所以一个好的探勘者会带很多工具，坩埚、炭、火种，还有其他我不便讲的秘密工具。我用它们来试验石头的真伪。

当晚，我在隐蔽处搭了一个小炉，架上坩埚，把样品加热半小时，然后冷却。我打碎它就看到了——可用指甲刮的小亮块，那可让你忘却疲惫、心生狂喜的所谓“小王子”。

此时，工作才刚要开始。你必须溯溪而上，在每一岔点，判断好石头是往左或往右。我沿着主溪往上走了很久，石头一直有，但越来越稀，然后山谷变成峡谷，极为深陡，没法爬上去。我问牧羊人方向。他们用手势、口语，让我了解没路上去，但如回到山谷，你会找到一条这

样宽的小路，可到一个大约叫钦哥的隘口，然后可下去直接到峡谷，到达一个有哗哗叫的有角野兽正在吃草（我想）的地方。我就走去，很容易地找到小路及钦哥，从那儿下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从峡谷往正前方望，我看到绿松满布的山谷，远方有盛夏覆雪的高山，眼前则是一片草原和羊群。我很累，往前走遇上牧羊人。他们看来疑心，但他们知道（太知道了）金子的价值，便收容我几天，也没烦我。我趁机学点他们的话——他们把山叫作“本”，草原叫“查”，夏雪叫“罗沙”，羊叫“菲”，房子叫“贝”。房子是用石头作底，上面是木造，底下养牲畜，上面住人和储物。他们话少，脾气坏，但没武器，对我也还好。

停留时，我又开始探勘，还是沿着溪流找。我溜到一个和绿松谷平行的荒谷，没人、没草、没森林。溪里的好石头很多，我觉得快找到了。我睡在野外三天，事实上几乎没睡，心中急切，夜里观星等着天快点亮。

矿床相当偏远，在一个深山沟里；在草堆中到处可看到一些突出的白石，你只要往下挖两三英尺就可找到黑岩，是我从没见过的好石头，以前只听父亲讲过。没什么岩渣的大块矿床，足够一百人采上百年。奇怪的是，一定曾有人来过，在一块巨石（一定是故意放的）后面可看到隧道入口。隧道一定很古老了，因里面悬有指头长的钟乳石。地上有烂木板和一些碎骨头，其余一定是狐狸咬走了——的确是有狐狸或狼的脚爪印。地面半突出的一颗头颅是人的。这很难解，但从前已不止一次发生：有人不知来自何方，在何时找到矿脉，没跟别人说，想独自挖出石头，结果死在这儿，几世纪也没人知道。父亲曾说，只要有地道，就有朽骨。

长话短说，矿床找到了，我做了试验，在野地里尽力造了一个好炉子，找了木柴，尽我所能熔了足够多的铅下山去，在草原我没和任何人

说。我继续往下，经过钦哥来到山谷另一边叫赛斯的大村庄。遇上市集日，我拿出铅块展示。有人停下来看，摸摸并问些问题。我只能半懂，但知道他们问的是有啥用，要多少钱，从哪里来。然后，有一个戴折绒帽的精明家伙过来，我们能听懂彼此。我当场示范可用锤子敲扁它，做铅板。然后，我解释铅板卷好，焊上可做铅管。我说你们村子用来接水的木管会腐烂，又解释铜管很难制，若用来接饮水会引起肚疼，而铅管容易接，永远不会坏。我也板起脸来瞎说，铅板可做棺材内衬，里面可保持干燥不长虫，灵魂不散。用铅可为死人铸像，比青铜看起来更沉稳庄重，适合祭典。看他很有兴趣，我解释除了外观，铅是种代表死亡的金属，因为它象征死亡。它重，倾向坠落，而坠落是死尸特性，它颜色是死色，它代表天上最慢的行星，死亡之星。我也告诉他，我认为铅和其他材料都不一样，它摸来觉得疲软，也许变化得累了不想再变，是千年以前火烤余烬的结果。这不是编来好做生意的，我真的相信。那人叫波维尔，张着口认真地听，然后他说他相信，那行星他们叫土星，以镰刀图象征它。他还在思索我这些吹嘘卖弄时，我开价三十磅金子，包括交出矿床所在、炼铅技术和它的用途。他还价为一些不知哪儿来的熊像铜币，但我作势吐口水：别啰唆，就只能金子。但，对一个长途跋涉的人，三十磅实在太重了，大家都知道，我俩心知肚明。所以我们以二十磅成交。他坚持要我陪他到矿床，这当然。回到山谷后，他给了金子，我检查，都是真金实重。我们开酒庆祝。

那也是告别之饮。并非不喜欢那地方，但很多原因让我继续旅程。第一，我要去那生长橄榄、柠檬的温暖城乡。第二，我要看海去，不是那祖先原乡的怒涛之海，而是产盐的平静之海。第三，背着大袋金子到处跑不是办法，总是担心被偷遭抢。第四，总之，我要把金子花在海洋之旅，要去认识海和水手，水手也需要铅啊。

我就走了，步行两个月，下了一个宽而阴郁的山谷直达平原。有

草原、麦田和烧柴的强烈烟味，使我思念家乡的秋天，同样有枯叶的气味、休憩的大地、燃烧的枯枝，亦即那些“结束”的东西，让你思及“永恒”。我来到两河交汇的一座城堡——家乡没见过这么大的——热闹的市集有肉、酒、奴隶，和肮脏、邈邈的女人。那儿像家乡一样下雪，我在一温暖的酒店过冬。三月我离开，走了一个月后到达海边。海面灰而不蓝，怒涛拍岸，吼声如野牛。想到它自太初以来就没停过，我几乎失掉勇气。但我继续沿着海滩往东走，海深深地吸引我。

我遇到另一城市，金子快花完了，我就留在那儿。有渔夫和一些从远方各地来的陌生人。他们白天做买卖，晚上争风吃醋为女人打架，在暗巷里拿刀互捅。我也买了把有皮鞘的铜刀，扎在腰际衣服下面。他们有玻璃但没玻璃镜，也就是他们只有小铜镜。那种容易有刮痕，会歪曲颜色的便宜东西。如果你有铅，用来做玻璃镜就不难，但我小题大做般地卖此秘密。我告诉他们只有我们罗德孟家族的人知道这项技艺，是费丽加女神教我们的，还说了其他一些哄他们的诳话。

我需要钱，便到处看看，在港边遇到一个似乎精明的玻璃工，和他做了个交易。

我从他那儿学了几样东西——首先，玻璃可以吹，我很喜欢那技术，我让他教了我，有一天我得试试吹铅和铜（但它们太液态了，我怀疑能否成功）。我则教他在一块热玻璃板上倒熔铅可得镜子，不大但是可用多年仍光亮的好镜子。他技术不错，知道做彩色玻璃的秘法，做出来的彩斑玻璃板很美。我很高兴和他合作，还发明一个做哈哈镜的方法：吹出圆顶的玻璃，然后在里或外布上铅，若你对着它照，你自己就变得很小或很大或扭曲。女人不喜欢它，但孩子们可争着要。整个夏天和秋天，我们卖镜子给商旅，他们出好价钱。但同时我也和他们聊，试着收集他们所知道的远方的资料。

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些半生在海上的人，对距离和方位的观念都很模

糊。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往南航行，有人说一千海里，有人说是十倍远，你会到一个地方，太阳炙热，树木动物都奇异，住着凶猛的黑人。但也有很多人说，半途中有个叫依奴沙的大岛，是盛产金属之岛。对这岛，他们也说些奇谈。岛上住着巨人，但牛、马、兔、鸡都很小，女人发号施令打仗，男人养畜牲、纺织。巨人吃人，尤其是外地人。那是个乱交之邦，男人换妻，动物也胡搞乱交，狐狸配上猫，熊配上牛。女人孕期只有三天，生了孩子马上叫婴儿：“快去拿剪刀，开灯，好让我剪你的脐带。”还有人说沿着海边有石造的城堡，巨大如山。那岛上每样东西都是石头做的——矛尖、车轮，甚至女人的梳子和针都是石制的。菜锅也是，他们还有一种会燃烧的石头，把那石头放在锅下烧就可煮菜。在十字路口，有化石猛兽看路，蛮吓人的。我板着脸听这些故事，但肚子里快笑破了，至此我已见过足够的世面，知道所有人、物都和家乡差不多。但是，当我返乡时，也炮制一些他乡奇谈来自娱。果然，他们也说一些我老家的奇怪故事。譬如，我们的水牛没膝盖，晚上就靠着树睡，要宰它，只要去锯树，它身子压倒树后就再也爬不起来。

关于金属，他们意见倒一致：很多商人和船长都把矿石或金属从岛上运到大陆，但他们是粗人，没法从他们的话中弄清是什么金属，而且大家说的语言也不一样，没人讲我家乡的话，连用词都弄不清。譬如，当他们说“卡力布”，实在弄不清是指铁、银或铜。又有人用“赛达”同时指冰和铁。他们极为无知，坚称高山的冰，历经岁月压力会变成石头，最后成了含铁的岩石。

直截了当地说，我受够了这些三姑六婆式的胡扯，我想直接去依奴沙看看。我把我的股份让给了玻璃工，换了钱，加上卖镜子的钱，买了货船票。但冬天不能走，风向不对，得等到四月。之前，我只能喝酒，赌骰子，想法把港边女人的肚子搞大。

我们四月开航。船上载满酒。除了船主，有水手长，四个水手，和

二十个链在坐板上的桨夫。水手长来自克里提，是个大骗子。他说了一个大耳国的故事，他们的耳朵大到冬天可以把人包在耳内睡觉，还有一种叫阿尔非的动物，尾巴在前面，能懂人话。

我得承认我不习惯船上生活，脚下船身晃动，忽左忽右，吃睡都难，空间窄狭，人挤人。还有那些桨夫恶狠狠瞪着你，让你想到要不是那链索，他们会把你撕成碎片，船主说这有时真发生。但风向好的时候，帆张满，桨夫收起桨，船在海面静静滑过，你可看到跃出水面的海豚，水手声称可以从海豚鼻嘴的表情预测明天的气候。船身都涂满了松脂，但整个龙骨到处是洞。它们是船虫吃的。在港口，我也看到停泊的船都是洞。身兼船长的船主说没法子。船老旧后就拆了拿来烧；但我有个主意，对锚也是。用铁做锚真蠢，反正会生锈，挨不过两年。那渔网呢？当风平浪静时，水手会捕鱼，渔网用木制浮标和石头做的锤子。石头！如用铅可以小四倍。当然，我一声不吭，但已在梦想我去依奴沙挖出的铅；熊还没影子，却已在卖熊皮了。

海上航行十一天后，我们望见岛了。我们划进一小港，四周是花岗壁和刻壁奴工。他们既不是巨人，也不睡在自己耳朵里，长得和我们一样，和水手也能通话，但守卫不准他们说话。这是个岩和风之岛，我一眼就喜欢。空气中有药草的野味，人们看起来简朴强壮。

金属矿有两天路程之遥，我雇了只小驴——真的很小（但不是他们在大陆所说的像猫）——和驴夫，驴虽小但强壮。总之，所有传言底下都有几分真，也许就像谜语，是藏在字面下的真实。譬如，海边石头城堡的故事颇真，但没大得像山，不过也的确坚固，建得方方正正。说来也奇怪，每人都说“它们一直都在那里”，但没人说得上是谁建的，怎么建的，何时建的。吃外人的故事则是个大谎言。既不为难，也不故弄玄虚，他们分段带我到矿场，好像这岛属于大众。

金属矿之丰盈足以让你醉倒，就像猎犬进到满是猎物的森林，在野

味之间跳来奔去，乐得半狂发抖。

靠海边有一列山脉，高处则成峭壁。由近而远到天边，可看到由铸炉升起的浓烟，有工人或奴隶在工作。那可燃石头的故事也是真的，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不易点着，但热量颇大，可烧很久。不知道是从哪里用驴子载来的——它油黑、易碎、不重。

所以如我所说，这儿有蕴藏不知名金属的奇石，表面呈白色、紫色和蓝色的斑纹：这地下一定有丰富矿脉。我大可专心在此探勘、挖掘、试验，但我是个罗德孟，我属于铅。

在岛西边，我在一处没人找过的地方发现一个矿床。事实上，地表看不出探勘过的痕迹，和其他地方也没有不同，更别说矿坑、隧道和矿渣。但就在下面，铅在那儿。我常想我们探矿人以为自己是用眼睛、经验和技术找到金属，但真正引导我们的是一种更奥秘，类似鲑鱼返乡、燕子回巢的本能。也许像水脉占卜者，不自知是什么在引导他，但的确有某种力量引导着，转动他手上的魔杖。

说不上什么理由，但我感到就在脚下，那灰浊、毒重的铅沿着溪边野蜂林延伸两海里。我赶快买了奴工帮我挖掘，赚了足够的钱后，我也买了个女人。不是为了玩，我仔细选她，不为了美貌，而是要健康、年轻、快乐、屁股大。我这么选，是她可为我生个罗德孟，让我们的家传绝活不会断绝。我手膝已开始抖，牙齿也动摇，逐渐像海上来的祖先变蓝了。这小罗德孟在年底就要诞生，生在这个有柳树、生产食盐、夜里野狗向熊迹咆哮的岛上。在野蜂溪边我立了个村庄，我想为它用快忘了的家乡话取个名——Bak der Binnen，意指“蜂溪”，但人们只部分接受。用他们的话，也就是我现在的话说，它成了Bacu Abis。

Mercury

汞

他目中露出凶光，
像是水银之光，
他自己好像也变成汞了，
汞在他血中流，
在他眼中发亮。

我，亚伯拉罕下士和妻子玛姬已住在这岛上十四年了。我原是从这儿做驻卫军的。附近有一小岛（我是指最近的那个岛，离此东北方向一千二百海里以上，叫圣赫勒拿岛^①），放逐着一个危险的重要人物，他的支持者也许会助他逃亡到这儿，但我从没相信这传说。我的岛叫孤独岛，这名字再贴切不过，所以我实在不懂这位要人来这儿干什么。

传言他是个叛徒、通奸犯、天主教、煽动家和吹牛者。只要他活着，就得守着。还有另外十二个兵士，都是从威尔士和萨里郡来的年轻快活的小伙子，他们也是好农夫，帮我们工作。然后那煽动家死了，来了兵舰带我们全部回去，但玛姬和我想到尚有旧债缠身，宁愿留在这儿养猪。

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岛，不止一次被葡萄牙人、荷兰人发现过，甚至更早以前还有来此的野蛮人，在斯诺登山岩上刻了符号和偶像。但没人留下，因它半年下雨，土地只适合种高粱和马铃薯。但不挑剔的人也饿不死，岛北岸一年中五个月有海狮，南边两个小岛有很多海鸥窝。你只要划船过去，可以找到吃不完的蛋，吃起来有鱼味，富有营养，也能止饥。这里的東西都有鱼味，甚至连马铃薯和吃马铃薯的猪都一样。

斯诺登山东麓生长着冬青栎和一些无名树，秋天开淡蓝花，带着点儿人体臭味，冬天就结又硬又酸的果子，不能吃。这种怪树，从根部吸

① 拿破仑流放地。

收水分后从枝端洒出来，即使干旱的日子，树四周也是潮的。枝端落下的水好喝，可以消炎，虽然味道像苔，我们用管线接下来。这林子是岛上唯一的森林，我们叫哭林。

我们住在亚伯代。这不是个村子，只有四座木屋，其中两座倒塌了。但有一个威尔士人一定要这样叫，因他来自亚伯代。鸭嘴岬是岛的最北点；士兵柯克兰害思乡病，常去那儿，在盐雾中待一天，因那儿靠近英格兰。（他也在那儿建了个烽火台，但没人去点过。）它从东边看去像鸭嘴，因此得名。



海豹岛是个平坦沙丘岛，海豹冬天在此产小海豹。魔井窟是妻子取的名，我不懂她看出什么。有一阵子只有我俩时，虽然那儿离亚伯代有两英里路，她几乎每晚带着火炬去。她在那儿坐着编衣服，不知在等什么。我问过她几次，她含糊回答，她听到声音，看到影子。在那儿连海浪也听不到，她觉得安全点，也较不孤单。但我恐怕玛姬有点偶像崇拜。窟中有人兽石头像。深处有一块石头像长角的头骨。当然，这些都不是人造的，那是谁造的？我宁愿避远一点。又因为窟中常听到隆隆响声，像是地球闹肚疼，而地下发热，地缝会冒出带硫黄味的蒸气，我会

叫那地窟别的名字，但玛姬说她听到的声音有一天会宣告我们，还有小
岛和全部人的命运。

玛姬和我住了多年，每年复活节时，波顿的捕鲸船会来供应补给和
消息，也运走少量我们产熏肉。然后来了大变化。三年前，波顿送来
两个荷兰人。威廉几乎还是小孩，害羞，有金发和粉红色皮肤，在额
上有个银白伤口，像是麻风病，没有船肯收留他。亨德里克年纪大些，
瘦瘦的，头发灰白，皱着眉头。他模模糊糊地说他和人打架，砸了舵手
的头，荷兰的吊刑台等着他。但他谈吐不像水手，手也像绅士，不像是
砸人头的手。几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们看到蛋岛冒起烟来，我划船过
去看，找到两个遇船难的意大利人：阿玛非的格丹诺及诺里的安德烈。
船身裂在犁头岩上，他们游上岸，不知道大岛土住着人，他们烧柴是为
烘干身体。我告诉他们几月后波顿会经过，可带他们回欧洲，但他们惊
恐地回绝。经过那夜以后，他们再也不愿上船，我得大费口舌才能劝他
们上小船划过几百码海水去大岛。就他们而言，他们宁愿留在那荒凉的
岩石上吃鸟蛋到死。

孤独岛并不缺空间。我让四人住在威尔士人留下的空屋，地方够
大，而且他们也没什么行李。只有亨德里克有个木箱，锁了起来。威廉
的伤口根本不是麻风，玛姬用她特制的药草，花了几星期治好了他。她
用的不是荷兰芥，而是长在林边的浆草，很好吃，虽然吃后会做怪梦，
但我们还是叫它荷兰芥。老实说，她不止是帮他敷药，还关在他房里为
他唱催眠曲，而且似乎待在里面太久了些。我很高兴不久威廉病就好
了，但接着是亨德里克让我伤脑筋。他和玛姬常一起散步，我听到他们
在谈什么七钥匙、赫姆神、阴阳合一，以及一些神秘难懂的东西。亨德
里克搭了一个没窗的坚固小屋，把箱子搬去，成天待在里面，有时候玛
姬也去，你可看到烟囱冒烟。他们也会去洞窟，带回彩石，亨德里克叫

“辰砂”。

两个意大利人我比较不怕。他们也贪婪地看着玛姬，但他们不懂英文，没法和她谈话。而且，两人互相嫉妒，彼此监督。安德烈非常虔诚，短时间岛上就布满木头或泥做的圣像。他曾送圣母像给玛姬，她倒不知如何处置，把它放在厨房一角。总之，谁都看出这四人需要四个女人。一天我把他们召集起来，也不多废话，就直接告诉他们谁要敢碰玛姬就会下地狱，因为人不可贪婪他人之妻，即使自己会完蛋，我也会亲自送他们下地狱。当波顿再来送货时，我们全都郑重地托他找四个女人来，但他当场嘲笑我们。想得可真妙！去哪里找女人愿和海豹为伍，嫁四个无用虫，住在这荒岛？也许我们用买的，用什么买？当然不是用那半猪肉半海豹肉的香肠，那比他的捕鲸船还腥臭。他马上升起帆走了。

当晚，在夜幕将垂时，我们听到隆隆雷声，好像岛要摇裂。几分钟就天色昏暗，乌云密布，乌云下方好像被火光照亮。斯诺登山顶冒出红光照亮天空，然后流出红色熔岩，不是流向我们，而是向左边的南方流，从山脊涌到山脊，嘶嘶作响，一小时后到达海边，激起大片蒸气。没人想到斯诺登山是座火山，但它的锥状山顶，中间还有两百英尺深的大圆洞，早应让我们想到。

那奇观持续了整夜，有时安静，有时在爆炸，好像没完没了。天快亮时，东方刮过一阵暖风，天放晴了，巨响慢慢平息，变成低语，最后安静了。熔岩最初是亮黄的，逐渐变暗红，最后熄灭。

我很担心猪。我告诉玛姬她该去睡，然后要求四个男人随我出去，我要看看岛变成什么样子了。

猪没事，但像兄弟般奔向我们（我无法忍受说猪坏话的人，它们很懂事，每次宰猪，我都痛苦）。在东北麓开了两个大地缝，深不见底。哭林的西南边被埋了，有两百英尺宽的一片地着了火烧干了，地一定比天还热，因火由树干烧到根，树根都被挖了出来。熔岩结膜后，上面布

满破泡，泡边很锐，像碎玻璃，整块看起来像乳酪，它从火山口南边流出，南缘塌了，而北缘是最高点，现在看来更高了。

探视魔井窟时，我们吓呆了。全都换了样子，像重新洗了牌。从前宽处现在变窄，矮的变高，有一处洞顶垮了，原来下垂的钟乳石变成横的，像鸟嘴。在后面原来鬼头的地方变个大洞，像教堂圆顶，仍然烟雾弥漫，吱吱作响，安德烈和格丹诺急着要回头。我派他们去找玛姬来看她的洞窟，如我所料，玛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两个意大利人留在洞外祈祷念咒。玛姬像猎狗一般到处跑，好像她曾听过的声音又来叫她了；突然她尖叫一声，大家毛发都竖立起来。圆顶有条缝，缝中滴下液体，但不是水，是亮晶晶、重重的液体，滴到地面就散成成千小珠滚走。低处已积了一潭，我们了解那是水银。亨德里克和我伸手去碰，它很凉，小波浪起伏，像是活的。

亨德里克像中了魔。他和玛姬互瞄一眼，不知有什么含义，嘴里说着含混不清的东西，但她好像懂。他说什么要开始大业，地和天都凝液滴，洞窟里有精灵。然后他公然向玛姬说：“今晚来这里，我们来做双背兽。”他从颈上拿下铜十字架让我们看，架上有条蛇，他把十字架丢到水银里，它浮了起来。

如果你四周看看，壁缝到处流出水银，就像啤酒从桶子漏出。如果你听听，千万金属滴敲打出洪亮的声音。

老实说，我从没喜欢过亨德里克，四人中我最讨厌他。这时，他让我害怕、发麻、恶心。他目中露出凶光，像是水银之光，他自己好像也变成汞了，汞在他血中流，在他眼中发亮。他拉着玛姬像松鼠乱窜，将手浸入水银中，把水银撒在身上，倒在头上，好像饥渴人遇到水一样，再进一步他就会喝水银了。玛姬跟着他着魔。我站了一会儿，然后亮出小刀，抓着他胸膛，推他到墙壁。我比他壮很多，他像止风的帆软了下来。我要知道他是什么人，他要什么，双背兽又是什么。

他像大梦初醒，立刻说了。他承认杀舵手的故事是假的，但荷兰的上吊架不假。他向政府宣称能把沙变黄金，拿了十万盾银币，只花一点在实验上，其他都花天酒地了。然后，他得当着裁判面表演关键实验，但一千磅沙里，他只能得两小片金子，所以他从窗子跳出，躲在女友家，然后偷溜上第一艘船。在他箱子里有炼金道具。至于双背兽，他说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的。他们的工作里水银不可缺，因它是精气所凝，也就是说，它这阴素与硫的阳素结合可得“哲人蛋”，也就是“双背兽”，因其中综合了雌雄两性。真奇妙的故事，真正的炼金术语言，我可一点都不信。他和玛姬两人，就是双背兽，他灰而多毛，她白而光滑。在洞里，天知道他们干什么，也许就在我养猪时上我们的床。若他们还没干，现在醉心于汞，也就快要干了。

也许水银也在我血管里奔腾！这时我气疯了。结婚二十年了，也许不再那么在意玛姬，但此刻我妒火中烧，可为她杀人。不过我控制住了自己，事实上我还把亨德里克按在壁上时，就有了个主意。我问他水银值多少，他干这行的应该知道。

他轻声答道：“一磅值十二基尼。”

“发誓！”

“我发誓。”他回道。他竖起两拇指，从中间吐口水，也许这是他们术士起誓的法子。但我刀子离他喉咙如此近，他说的应该是实话。我放开他，他还怕得要死，向我解释这种粗汞不大值钱，但可以蒸馏来纯化，像蒸馏威士忌一样。若我饶他一命，他肯为我做。我什么也没答应，只是告诉他要用水银来买四个妻子。造泥锅、泥瓶一定比从沙中提炼金子容易，快去干。复活节快来了，波顿也就要到了，到时我要四十瓶纯水银，每瓶都一样，都盖好盖子，得看顺眼。其他三人可帮他忙，我也会帮。不必烦心烤泥瓶的事：已经有安德烈烤圣像的炉子。

我学会如何蒸馏，十天内瓶子也做好了，每瓶是一品脱，但一品脱

汞重十七磅，重得很难提起来，摇晃时觉得里面有动物。至于采粗汞，没问题，人在洞里是泡在水银中，滴在头上、肩上，回家后靴子、口袋，甚至床上都有汞。大家都很兴奋，觉得用它换女人很自然。它真是个奇怪的物质，冷而不易捉摸，动来动去，静止时比最好的镜子照得还清楚。若在碗里搅，可以转上半小时。不但亨德里克的铜十字架浮在它上面，石头，甚至铅也浮。金可不，玛姬试她的金戒指，立刻就沉了，等把它捞出来，变成锡了^①。简单讲，这不是我喜欢的物质。我想尽快成交送走。

复活节时，波顿来了。他带走四十瓶小心用蜡泥封好的汞，走时没任何承诺。秋末一个晚上，我们看到雨中他的船来了，逐渐变大，然后消失在暗夜雾中。我们以为他在等天亮好靠岸，一如从前。但天亮后，波顿和船都没了踪影。而在海滩上，又湿又冷地站着四个女人和两个小孩，因冷和害羞全挤在一起。其中之一默默地交出波顿的信。潦草数行——说为四个不知名的人找四个女人到荒岛，他只得支出所有的水银，没剩下经手的佣金，下次来时还要百分之十，用腌猪肉和汞抵算。她们不是上等的，但也没法找到更好的了。他快速靠岸放人，以避免看到大打出手的场面，也因他既非媒人也非老鸨，更不是福证婚礼的牧师。但他建议我们尽可能举行正式婚礼，就当为了我们心灵的健康吧。

我叫来四个男人，本想建议抽签，但立刻看出不必要。有个中年混血胖女人，额上有刀疤，她紧瞪着威廉，威廉也好奇地看着她，这女人可以当他妈。我问：“你要娶她吗？拿去！”——他要了她，我尽我可能福证婚礼。我问她是否愿意，问他是否要她，但我没法记清那句“无论贫富，在病痛或健康时”，只好当场编造，变成了“至死方渝”，我觉得听起来还不错。当我快要完成第一对福证时，我已看到格丹诺看上一年

① 指外观如锡。

轻独眼女孩，或者是她看上了他，他们便手牵手在雨中奔走了，我还得跟在后面跑，边跑边宣告婚礼誓词。留下的两个，安德烈要了个约三十岁的黑女人，她美丽且高雅，头戴的鸵鸟羽饰帽湿答答的，但态度有些轻浮。我虽刚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是证了他们的婚。

亨德里克只剩下一个瘦小女人，那两个小孩的妈。她有双灰眼，好像整个场面不关她事，她只是旁观欣赏。她不看亨德里克而只望着我。亨德里克则望着玛姬，而玛姬才刚从屋里钻出来，还戴着发卷。她也望着亨德里克。然后，我突然了解到，两个小孩可帮我看猪；玛姬不可能给我生小孩了。而亨德里克和玛姬在一起会过得很好，他们搞蒸馏，弄他们的双背兽。而灰眼女人也不令我讨厌，虽然比我小很多，但却让我心飘飘然，想起蝴蝶飞舞追逐。所以，我就问了她名字，然后我在证人之前问我自己：“你，丹尼尔·K. 亚伯拉罕，愿意娶在场的瑞贝嘉·约翰逊为妻吗？”我自己回答说：“是。”女的也同意，我们就结婚了。

Phosphorus

磷

半夜有人在我桌上留下各种植物，

一天一种，都是家常植物，

我也不知道是凭什么选的：

洋葱、大蒜、胡萝卜、蓝莓、牛蒡、柳、

迷迭香、野蔷薇、杜松和洋苏。

我每天测量它们的无机磷及总磷量，

觉得像被绑在井边的驴瞎忙。

一九四二年六月，我坦白地和中尉及主任说了。我明白我不再有用，他们也同意并建议我去那些犹太人还可以进去的行业找找工作。

正觉得茫然时，一天早晨来了件不寻常的事：有通电话找我。另一端是一个粗鲁有力的米兰腔，自称是马丁尼博士，约我下星期天在都灵的“Hotel Suisse”（瑞士饭店）见面，什么细节也没提。但他说的是“Hotel Suisse”，而不是一个爱国公民应该说的“Albergo Svizzera”。在斯塔拉切当权时^①，人们都注意用语，耳朵特别尖。

饭店休息室（哦，对不起，意大利人该说大厅）有豪华的装潢、紫窗帘等等。马丁尼博士正等着我。刚才我从门房那儿知道，他还算是个爵士。他年约六十，中等身材，壮硕，黝黑的皮肤，头几乎秃了。他脸上皱纹深刻，眼小而锐利，薄嘴像是有点轻蔑地斜向一边。从第一句话，可以看出这位爵士是个认真、公事公办的人。这奇特的“亚利安”式一本正经对待法，像我这种犹太人是不会意外的。不管是本能，还是算计，对一个犹太佬，在这“种族优先”的年代，你可以加以礼遇，甚至可以帮助他，或是可以（小心地）吹嘘帮助过他。但可别和他有私人关系或深交，以免惹上麻烦。

爵士只问了几个问题，对我的很多问题都避开了，但对两个重要

① 原注：多年来，斯塔拉切是法西斯党的秘书长，他推行“纯化”意大利文化活动，包括打击外来语，如 hotel 这种字，做法愚蠢至极。

问题倒是直截了当：薪水之高，是我根本没敢要的数字，直接让我目瞪口呆；他经营的是一家瑞士公司，事实上他是瑞士人（他把 Swiss 念成 Sviss），所以我的应聘是没问题的。他那浓厚米兰腔的瑞士味道，有点怪和好笑。但他的拘谨是有道理的。

他的工厂在米兰郊区，我得搬去米兰。工厂生产荷尔蒙精，而我得处理一个很特定的问题，就是研究一种治糖尿病的口服剂。我了解糖尿病吗？不多，但我说外祖父死于糖尿病。也有几个叔叔，通心粉吃太多，年老时出现糖尿病的病征。听到这，爵士眯起眼开始注意起来。后来，我便了解，既然糖尿病是遗传的，他倒是乐意找个还算是人类的糖尿病患者来试验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薪水会加得很快，实验室宽广、设备好、现代化，工厂图书室有一万本书。最后，像魔术师从帽子拉出兔子，他说也许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在实验中已有一个我熟悉的人在研究同样的问题。是我一个同学，乔丽亚·文耐斯，她跟他提到了我。我应该仔细考虑，两星期后和他在瑞士饭店见。

第二天，我就辞掉矿场的工作搬去米兰，只带了少数几样必要的东西：脚踏车、拉伯雷的文集、《白鲸》、另外几本书、鹤嘴锄、登山索、计算尺和笛子。

爵士的实验室比他说的还好。和我那矿场实验室比起来像是皇宫。到达时，他已为我预备了实验台、抽烟柜、书桌、装满玻璃器皿的橱子，以及一种让人不自在的安静与井然有序。“我的”玻璃器皿上都点上蓝记号，以便认清，也便于施行“打破要赔”的规矩。这只是我到差时爵士传达下的很多规矩之一。“瑞士精准”是这实验室及整个工厂的精神。但对我，则是近乎虐待的障碍。

爵士跟我说，工厂的工作，尤其是我负责的问题，一定要小心工业间谍，不可外泄。这些间谍，可能是外人，也可能是工厂里的职工，尽管他用人已是够小心了。所以，我不得向任何人提起我的工作，尤其不

可向同事提起。因此，每个职员都有他特定的上下班时间以配合电车时间。A 八点上班，B 是八点零四分，C 是八点零八分，依此类推，下班也是如此。于是，没有任何两个同事搭同一班电车。至于迟到早退则要重罚。

每天下班前，即使天塌下来，玻璃设备都得拆下、洗净、收好。如此，任何下班后进实验室的人都无法猜出什么。每天傍晚，报告要密封好亲自交给他，或交给他的秘书罗瑞丹娜小姐。

午饭随我高兴去吃，他并不想中午也关人。但他告诉我（此时，嘴扭得更薄了）附近没好饭馆，劝我在实验室中自理，如果我从家里带菜肉来，可以帮我找个厨子代我烧。

至于图书室的规矩，则严厉无比。书绝不能借出，只能在馆员巴里塔小姐准许下阅读。画线或作记号是重罪：还书时，巴里塔要一页一页地检查，若她找到一个记号，该书就销毁，犯者要赔。连书中夹书签或折角都禁止。“某人”也许会因此而发现公司的秘密。在这制度下，钥匙最重要：晚上，每样东西，包括天平，都要锁起来，钥匙交给守卫。而爵士有把万能钥匙，可开所有的锁。

这一大堆规矩和禁令准会把我搞惨，要不是第二天就看到了乔丽亚·文耐斯。她安详地坐在实验台边，并没干活，而是在缝补袜子，似乎在等我。她做个鬼脸，亲切地迎接我。

大学四年，我们同班，实验课都一道上，姻缘机会很多，却从未深交。乔丽亚皮肤是暗色的，个子小而矫健。她眉毛长得漂亮，脸庞轮廓清秀，动作利落。她对实务比理论有兴趣，待人亲切、慷慨而幽默，是天主教徒而不僵硬，讲话懒洋洋的像活得不耐烦，其实完全不是。她已在这儿做了快一年。是的，就是她向爵士提到我。她隐约知道我在矿场的处境朝不保夕，认为我很适合这项研究工作，而且说穿了，她在这儿很孤单。但我可别会错意，她已订婚了，热烈地订婚了，她以后会详

述她那复杂的爱情。我自己呢？没有？没有女孩？可怜，她会帮我想办法，别担心种族法令，反正是些无聊的东西，管它们干什么。

她建议我别把爵士的那些奇怪主意当真。乔丽亚是那种不必问什么，就能把所有人底细搞清楚的人。我可全没这种本领，于是她就成为我的一级导游兼翻译。只第一次，她就告诉我工厂中各人事要角和机关秘密。爵士是这儿的大老板，虽然在巴塞还有其他幕后的老板。但实际下命令的是罗瑞丹娜，他的秘书兼情妇。（她从窗口指向庭院里一个高个子、褐发、丰满而粗俗的女人。）他们在湖边有个别墅，他常带她去坐帆船，据说他“老而弥坚”。人事室的格拉索先生也在追罗瑞丹娜，但目前乔丽亚还看不出他上了她的床没有，她会让我知道后续情节。在工厂生活不难，但这些瓜葛难以让人专心工作。答案很简单，就是别做事。她当初早就了解到了，一年中，她几乎没做成任何事。每天早上架起设备，让人看起来像点样子，到晚上则按规矩收拾。每日报告则是凭空想象的。除此之外，她准备嫁妆，睡觉，给未婚夫写热烈的情书，违反规定和每一个接近的人聊天。和照顾兔子的安布罗乔；和那负责钥匙，也许是法西斯特务的米奇拉；和那照理说该为我做饭的女工瓦丽斯可；和那花花公子麦奥奇，他打过西班牙内战，站在弗朗哥那边；和苍白疲软的马奥力，他有九个小孩，人民党党员，曾被纳粹棍子打断背。她可真是一视同仁。

她说，瓦丽斯可是她的死党，她忠心听命。这包括去有机药剂部门出猎（非本部门的人禁止去），带回肝、脑及其他难得的内脏。瓦丽斯可也订婚了，她们两人关系密切，成天交换秘密。瓦丽斯可管洗衣，所以各部门都可以去。从她口中可知道，连生产过程都是极机密、反间谍的。所有水管、蒸汽管、真空管、气管等都置于地下或以水泥包着，只有开关露出。机器都盖上盒子锁上。温度计、压力计上都没数字，只用颜色。

当然，若我想工作，对糖尿病研究有兴趣，那就干吧。我们还是

好朋友，但别指望她帮忙，她有别的事烦心呢。但若是做饭，瓦丽斯可和她倒可帮忙。她们两人快结婚了，都正在学做菜，可以喂饱我，让我免于饥饿。在实验室里搞吃的，我觉得不大合乎规定，但乔丽亚说除了巴塞那神秘木头顾问每月来一次（事先会充分告知），像参观博物馆般一言不发地看看，没人会进实验室，你可做任何喜欢的事，只要不留痕迹。人们记忆中，爵士从不曾进来过。

上班几天后，蒙爵士召见，那次我注意到墙上有帆船照片。他说该开始认真工作了。先到图书馆找巴里塔要肯恩著的糖尿病大作。我懂德文，对不？好，那我就读原文，而不是巴塞那边弄出来的蹩脚法文译本。他承认只读过法文译本，不是很懂，但认定肯恩博士是这方面专家，而我们若能把他的想法第一个付诸实施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是的，他文字晦涩，但巴塞那边的人，对这口服抗糖尿病剂可是认真的。尤其是那木头顾问。所以，我应去仔细读肯恩的书，然后一起讨论。但同时也别浪费时间，我可以开始工作。他工作忙，无法仔细读，但他也从其中得到两项我们应该试一试的主意。

第一个主意是有关花青素，你知道它是红花或蓝花的色素。就像葡萄糖一样，它很容易氧化。而糖尿病是一种葡萄糖氧化的病变，所以用花青素，我们也许可重建葡萄糖的正常氧化。矢车菊的花瓣含很多花青素，他已种了一园子的花，收了花瓣，晒干它。我应设法萃取，注射到兔子身上，然后检验它们的血糖。

第二个想法同样模糊，既简单又复杂。按照爵士的法文译本，肯恩博士认为在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中，磷酸是重要的角色。到此还没什么问题，但接下来爵士自己的假说就比较令人难以相信了，也就是说，给病人吃一些天然的有机磷，可以校正其不正常的新陈代谢。那时我太年轻，还以为可以去更正上级的建议，所以提了两三个反对意见，但我立刻看出他脸色变僵，如一片锤过的青铜。他打断我，以断然的口气下

令，建议变成命令，要我分析一大堆植物，选出有机磷含量最高的，萃取出来，喂给兔子。好好做，午安。

当我告诉乔丽亚和他的对话后，她的反应迅速而愤怒：老头疯了。但那是我自找的，一开始我就把他当真，惹了他，我就得干到底，看看那些矢车菊、花青素和兔子有啥用。按她的意见，我是工作狂，狂到愿为疯狂老头卖身，这都是因为我没女朋友。如果我有个女友，我就会想她而不是花青素。太可惜，她乔丽亚已心有所属，因她终于了解，我是那种不主动追求的人，得有人引导，一步一步解决感情冲突才行。好呀，她有个表妹在米兰，也害羞，她要来介绍一下。但天杀的我也该自己努力，看到我把宝贝青春浪费在兔子身上也让她伤心。这乔丽亚有点邪门，她看手相，拜灵媒，做通灵梦。有时我想她这么热心救我，帮我找乐子，也许是她预感到我未来的命运，而下意识地想帮我改运。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黑影港》，觉得很棒，还互诉所认同的电影中人物。瘦黑的乔丽亚爱那灵妙的米雪·摩根，她那绿色冰晶的眼。而我，温和退缩，则喜欢逃兵强·卡宾，一个硬汉，最后死了。不过，他们两个相爱，而我们则不，是不？

电影快完时，乔丽亚要我送她回家。但我得去看牙医，乔丽亚说：“如果你不送，我就大叫：‘猪猡，把你的脏手拿开。’”我试着抗议，但黑暗中，乔丽亚深深吸一口气，开始“猪……”，我只得打电话给牙医，然后送她回家。

乔丽亚属狮子座，可在空袭逃难的拥挤火车上站十小时，只为了去和她男人聚两小时。若能和爵士或罗瑞丹娜吵上一架，她会大乐，但她却怕打雷，怕虫。有次，她喊我去处理她桌上的一只蜘蛛。（我不可以打死，得把它弄到瓶里丢到花圃去。）这让我觉得像面对水怪的大力士，同时也感到女性的娇柔，不禁怦然心动。曾有次暴风雨，头两次闪电，乔丽亚僵立，第三下，她就奔向我避难，我感到她温暖的身体贴着我，

新奇而晕眩，却是梦中熟悉的，但我没回拥。如我做了，也许她和我的命运就脱轨，奔向不可预测的共同命运。

我从没见过的图书馆员，像个看门狗般统领那图书室。是那种被拴起来喂得很少，而故意被弄得凶恶的狗，或更像老而无牙的眼镜蛇，因长期在黑暗中固守国王宝藏而显得苍白。巴里塔，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比造物者的恶作剧（*lusus naturae*）好一点。她个子小，没奶没屁股，如干蜡，深度近视。她戴的眼镜奇厚无比，如从正面看她，那双蓝眼似乎很远，卡到脑后去了。她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给人从未年轻过的印象，似乎就诞生在充满发霉味、昏暗的地方。没人了解她，爵士谈到她似乎不耐烦。乔丽亚承认直觉地讨厌她，也不知为什么，就像狐狸恨狗。她说她像樟脑丸一样发臭，看起来便秘。巴里塔问我为何要肯恩，坚持一定要看证件，不怀好意地检视，要我签本子，然后才不情愿地给书。

那是本怪书，只有在第三帝国^①才会出版这种书。作者有些能力，但每页都透露着不得让人争辩的自大。他如着魔的先知一般滔滔不绝地说教，好像西奈山上的耶和华给了他糖尿病患者葡萄糖代谢的天机。也许我不应该立刻对肯恩的理论产生敌意的不信任。但是三十年后我也没有听说，有人对他的理论重新给予评价。

花青素的事不久就无疾而终。开始时是矢车菊的美丽进击，成袋如薯片的干燥花瓣送进来，萃取时得到美丽却很不安定的颜色。弄了几天，还没注射到兔子身上时，我接到爵士命令，整件事归档。我还是觉得，这精准踏实的瑞士佬居然会去信那疯狂想法真是怪事。一有机会，我就小心暗示我的意见，但他凶巴巴地说我没资格批评教授。他要我明白拿薪水就得干活，要我别浪费时间，立刻开始处理磷。他相信磷会带

① 指纳粹德国。

来答案。所以，就弄磷吧。

我不是很有信心地开始工作，觉得爵士和肯恩博士很可能被名词所惑。事实上，磷（Phosphorus）是个很美丽的名字（它意指“光之使者”），它会发出磷光，在脑子里，也在鱼中，所以吃鱼会聪明。植物没磷不能生长。法利叶一百年前发展出磷酸甘油给贫血儿童；磷也在火柴棒头上，爱得发狂的女孩吞食它自杀；它在鬼火中。不，它可不是个不带感情的元素。在纳粹王国妖魔横行的时代环境中，这半魔半仙的肯恩博士会以它为药，就不足为奇了。

半夜有人在我桌上留下各种植物，一天一种，都是家常植物，我也不知道是凭什么选的：洋葱、大蒜、胡萝卜、蓝莓、牛蒡、柳、迷迭香、野蔷薇、杜松和洋苏。我每天测量它们的无机磷及总磷量，觉得像被绑在井边的驴瞎忙。做一件自己不相信的事可真惨，每天的磷剂量使我屈辱。隔壁有乔丽亚也不大能让我高兴起来。她低哼着“春天到，醒来”，用温度计在烧杯中煮菜，每隔一阵就带着挑衅进来我的工作。

乔丽亚和我注意到，夜里留下样品的神秘客也留下各种小小痕迹。锁着的柜子早上开了。架子换了位置。打开的排烟柜又关了。一个下雨的早晨，就像鲁宾逊一样，我们在地板上找到橡胶鞋跟印，而爵士穿的鞋是橡胶跟。“他半夜来和罗瑞丹娜做爱。”乔丽亚如此认定。而我则认为实验室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我们有系统地在门缝里夹上牙签，每天早上由生产部到实验室的牙签都掉了。

两个月后，我大约做了四十个化学分析。含磷量高的有洋苏、白屈菜和西洋芹。此时，我想应该去决定磷在其中的化学形式，并分离它。但爵士打电话给巴塞那边，然后宣告没时间做这些深奥的事：继续萃取，别多事，然后真空浓缩，塞进兔子食道，然后量它血糖。

兔子不是什么有趣的动物。它们在哺乳类中距离人类最远，也许是当它们受辱受惊时的反应带些人性。它们安静、害羞、回避，只在乎食

与性。除了在遥远童年时的猫以外，我从未碰过动物。面对兔子，我有种排斥感，乔丽亚也有同样的反应。幸运的是，瓦丽斯可和安布罗乔与那些小动物都混得很好。她让我们看抽屉里的各种小装备。有个带盖子的高长盒子。她说，兔子爱躲在穴里（一个小地方），如果抓着它的耳朵（它的天然把手）把它塞进盒子，它觉得安全就不会乱动。还有橡皮探针和中间有洞的木轴。你得把木轴塞进兔子牙齿间，然后从洞中塞探针进喉咙，直到感觉到了它的胃底。如果你不用木轴，兔子咬断探针，吞下去就会死。通过探针，就可用普通针筒把萃取液灌进它肚子里。

然后你得量血糖值。老鼠靠尾巴，兔子就是耳朵。兔耳朵上有粗大的静脉，如你揉它耳朵，静脉立刻胀起来，就可以抽血。兔子要不是很能吃苦，就是神经粗，这些瞎整好像都没事——只要一被放回笼子，它们就冷静地回去吃草，下一次仍一点也不怕。一个月后，我可以闭着眼睛做这检验，但我们萃取的磷似乎全然无效。只有一只兔子吞了白屈菜萃取液后，血糖值下降，但几星期后在它脖子上长了个大肿瘤。爵士叫我开刀，我开了刀，觉得罪过和恶心，然后它就死了。

依爵士命令，那些兔子各关一笼，全都禁欲。但有次夜间空袭，没啥破坏，所有笼子却都打翻了。早上，我们发现满院子都是在交配的兔子，空袭一点没吓着它们。脱身以后，它们马上在花圃挖隧道，所以它们得这名字^①。只要有点惊动，它们就中断性交，找地方躲。安布罗乔为把它们重新关起来，花了很大力气。结果，试验工作得中断，因为笼子虽有标签，兔子可没有，散了以后就搞不清谁是谁了。

正在为兔子忙得满头大汗时，乔丽亚跑来急匆匆地说她需要我。我骑车上班，对不对？好，她下午马上得去热那亚港，去那儿得转三趟

① 在意大利文中，“兔子”是 coniglio，而“隧道”则是 cunicolo，所以莱维在此会这样说。

车，她急得很，有重要事。我可以用脚踏车载她吗？我按爵士那疯狂的时刻表，比乔丽亚早十二分钟下班，在街角等她，让她在横杠上坐好，我们出发了。

那时候，在米兰骑自行车还不难。那些空袭日子，人们常逃难，骑车带人也是正常的事。有时，也许在夜里，陌生人会要求这样的服务，从城这端到另一端，会给四五个里拉。但乔丽亚总是不安静，她紧抓着把手让我很难控制，一会儿猛然换位置，一会儿聊天时猛打手势，我们的重心因而随时乱摇摆。她开始时还是闲聊，但乔丽亚可不是藏得住话的人，在英波那提大街半途，她已把闲聊置诸脑后，到伏打港，她已说得很清楚了：她很生气，因为他父母说了“不”，而她正赶去反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认为我不够漂亮，懂吗？——她咬牙切齿地吼着，把手随着她猛摇晃。

“他们是笨蛋！我看你美得很。”我认真地说。

“少来，你什么也不懂。”

“我只是要赞美你，而且我真是这样想的。”

“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要是想追我，我就捶倒你。”

“那你也会倒。”

“你这笨蛋，快骑，时间晚了。”

到开罗里街时，我已全都知道了，我听到发生的一切事，但时间次序则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前因后果。

尤其是，我弄不懂他怎么没勇气克服这困难——真丢人，不可思议。乔丽亚平时形容这人慷慨、认真、稳重。这女孩为他着迷，在我双臂间猛摇，像是自己要骑车。而他却没有跑来米兰解释，反而躲在军营里。作为一个 goy（基督徒），他当然是在服兵役，我一边在想这，一边还得和乔丽亚争着控制把手，我不禁难过起来，恨这从未谋面的情敌。按我古老的定义，她一个 goyà 和一个 goy 应该要结婚的。我百般

无奈，第一次有种想吐的空虚感。这就是跟人家不同的意义，作为“全人类的盐”^①的代价。骑车载着一个我想要拥有，但又不能和她相爱的女孩，在格里齐亚街奔驰，把她送给别人，从我生命中消失。

在格里齐亚街四十号前有个凉椅，乔丽亚叫我坐着等她，然后她如阵风般飞奔而入。我悲惨地等着。也许我不应这么绅士，不要这么愚笨保守。我以后一辈子都会后悔和她只剩下同学同事之谊了。也许还不太迟，也许那对宝贝双亲会坚持，乔丽亚哭着下楼，我可以好好安慰她。我想了一堆乘人之危的念头。最后，就像一个沉船放弃挣扎的人，我回到那些年我主要的思绪：那种族法令、那未婚夫都只是愚蠢的借口。我对女人的无能是不得上诉的宣判，会跟我一辈子，让我一辈子嫉妒，为抽象、无根、无前景的欲望所毒害。

两小时后，乔丽亚像炮弹般从门口冲了出来。根本不必问她。“我猛捧他们。”她脸红气喘地说。我试着真心向她道贺，但你实在没法在乔丽亚面前隐藏自己的想法，或让她相信你的言不由衷。摆脱了心理的重担，脸上闪耀着胜利的光彩，她直视我双眼，看到其中的阴影，她问：“你在想什么？”

“磷。”我答道。

几个月后，乔丽亚结婚，和我道别，她哽咽地和瓦丽斯可交代各种烹饪食谱。后来，她受了很多苦，儿女成群。我们还是朋友，偶尔在米兰见面，聊聊化学和其他可聊的。我们对自己的抉择并不后悔，也不抱怨生命所赐予的。但当我们相遇时彼此都有种奇妙（我们都互相提了好几次）的印象：是一个骰子、一阵风、一片薄纱，让我们分道扬镳走上两条不归路。

① 原文 salt of the earth，源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你们是全人类的盐。盐若失掉咸味，就无法使它再咸。它已成为废物，只好丢掉，任人践踏。”

Gold

金

朵拉河就在近处默默地流过，
它塞满融冰的子宫带着金子。
我嫉妒那来历暧昧的同伴，
他马上可回到那朝不保夕但极其自由的生活，
重拾他那涓涓细流、永不止歇的金子，
以及绵延不尽的日子。

众所周知，都灵人到米兰没法生根，至少不大着地。一九四二年秋，我们有七个都灵朋友住在米兰，男的女的都有，为了各种理由，住在那因战事而不适居的大城。我们的爸妈——那些仍健在的——都搬到乡下躲避轰炸，而我们如公社成员般住在一起。尤基是个建筑师，想要重建米兰，宣称最好的都市设计师是腓特烈大帝^①。西维奥有法学学位，但他在羊皮纸上写哲学论述，有个在船货公司的职位。伊多是奥力维提打字机公司的工程师。琳娜和尤基睡一起，和艺廊有点关系。芳达像我一样是个化学家，但找不到差事，身为女性主义者，她为此很是恼怒。爱达是我表姊，为出版社工作。西维奥叫她双博士，因她有两个学位；尤基叫她表元帅，意思是元帅表姐，她很讨厌这个称呼。乔丽亚结婚后，我只有兔子做伴，觉得像鳏夫、孤儿，成天梦想写些像光合作用之类碳原子漫游的诗，只有化学家才看得懂。事实上，我后来终于写出来了，但那是多年之后了，是本书结尾的故事。

如我没记错，每个人都在写诗，除了伊多，他说工程师写诗有失尊严。当全世界在燃烧，写那些朦胧的烂诗，我们也没觉得奇怪或可耻。我们自称为法西斯主义的公敌，但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已对我们（也对所有意大利人）有影响，它孤立我们，使我们肤浅、消极、犬儒。

①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Barbarossa），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日耳曼国王，又称“红胡子”大帝。

我们咬牙忍受配给，屋里没煤，冷得要死。我们毫不负责地欢迎英军的夜间轰炸。他们不是炸我们，是代表着远方的友军力量，他们并不使我们困扰。像所有受辱的意大利人所想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无敌，但美国人也无敌，战事要拖上二三十年。一个血腥的僵局，你只有从电检过的战争公报中得知一点实情，有时是在一些亲属葬礼上了解——官方致哀的信件写着：“英勇地执行他的任务……”北非海岸和乌克兰平原的“死神之舞”永远停不下来。

就像一个人自知不是为自己前途做事，我们每天疲倦地做着自己都不相信的工作。我们上戏院、音乐厅，有时节目会被空袭打断，我们觉得可笑又欣慰。盟军是天空主宰，也许最后会赢，法西斯会结束——但这都是他们的事，他们又富又强，他们有飞机、航舰。但不是我们，“他们”已宣告我们“不同”，那我们就不同吧。我们选边站，但不加入这场愚蠢残酷的亚利安游戏。我们讨论奥尼尔、王尔德的戏，爬山，唱歌，彼此互坠情网。至于当时德国占领的欧洲发生什么事，我们弄不太清楚；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①阁楼，基辅郊外的人坑，华沙、巴黎、里底斯的犹太人区，即将面对的黑死病，我们当时都茫然，只有从希腊或苏联前线撤下来的兵士口中，可以听到一丁点罪恶的阴影，而我们也多少避免它。无知让我们活下去，像你在登山，你的绳子磨损得快断了，但你不知道，还觉得很安全。

但十一月传来盟军登陆北非的消息，十二月听到俄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我们悟到战事恐要较快结束，历史重新迈开步伐。才几星期，我们比过去二十年成熟得还快。阴影下走出了法西斯没征服的人物——律师、教授、工人——他们是我们一直徒劳地在《圣经》、化学、山脉

① 1942至1944年间，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与亲友为躲避纳粹的迫害，躲在阿姆斯特丹一间工厂仓库内。在此期间，她写下日记，描写密室生活，1952年以《安妮日记》为名发行英文版。

中找不到的老师。法西斯使他们沉默了二十年，他们跟我们解释，法西斯不但是小丑，而且是正义的反面。它不但把意大利带进一场不义的战争，而且其统治的基础是工人受迫，富人暴发，知识分子不愿受辱而沉默，以及精心设计的谎言，借此把自己巩固成一可憎的政权。他们说嘲讽和憎恶并不够，应转化成愤怒，而愤怒应导向有组织的反抗。但他们并没教我们如何开枪和制炸弹。

他们讲到一些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人物——葛兰西^①、赛佛明尼、格贝提和罗赛里兄弟——他们是谁？还有另外一种历史？和我们在中小学学到的历史平行的历史？在那动乱的几个月中，我们徒然地试着去填补二十年的历史空白，但这些新角色仍看起来像“英雄”，缺乏深度和人性。但我们没时间弥补教育了，三月都灵发生大罢工，危机逼近。七月二十五日，法西斯垮台，广场挤满庆祝的人潮。然后是九月八日，米兰和都灵的穿灰绿制服的纳粹部队撤退，闹剧结束。意大利就像波兰、南斯拉夫和挪威，成了盟军占领地。

就这样，长期耽溺于文字，坚信我们的选择，怀疑我们的方法，心中绝望大于希望的我们，重新在这战败国度中出发战斗。我们去追寻自己的命运，各奔前程。

既冷又饿，我们是皮埃蒙特最没武装的游击队，或许也是最缺乏准备的。因还没从三英尺雪下的避难所出来，我们以为自己安全，但有人背叛我们。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醒来，我们发现被法西斯共和军^②所包围。他们有三百人，我们十一个，只有一支没子弹的冲锋枪和几把手枪。八个逃到山里，民兵俘虏了半睡半醒的三个——阿尔多、基多和我。他们进来时，我把手枪藏到炉中的灰里，反正我也搞不清怎

① 葛兰西（Gramsci），意大利作家，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理论先导者。

② 这支军队是由意大利北部的法西斯余党所成立，在纳粹部队保护之下。

么用；它镶满了珠子，那种电影里女人用来自杀的枪。阿尔多，一个医生，站起来慢慢地点根烟说：“我可惜的染色体。”

他们狠揍了我们一顿，警告我们不得做任何蠢事，说要好好再拷问我们，然后枪毙。他们趾高气扬地围住我们，然后带我们上山。在几个钟头的路上，我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我一口一口地吃掉身上的伪造身份证（照片特别难吃），又假装跌倒，把通讯录塞到雪堆里。民兵们一路唱着雄壮的军歌，用枪打兔子，丢手榴弹到溪里炸鱼。山谷中有巴士等着我们。他们命大家上车分开坐。我四周全是兵，坐着、站着，他们也不理我们，继续唱。其中一个背对我站着，腰上挂着手榴弹，那种德制木柄的。我可轻易地拉开保险栓和其同归于尽，但我没勇气。他们带我到爱斯塔郊外的军营。那儿的排长叫福沙，想来荒谬可笑，他现在已躺在荒郊野外的军墓几十年了，而我却活得好好的，在写这故事。福沙完全公事公办照规矩来，他马上给我们定下规矩，把大家关在地下室，每人一室、一铺、一马桶，十一点供粮，放风一小时，不准谈话。最后这条禁令很难挨，因为我们之间有个丑恶的秘密，它使我们被捕，也在几天前丧失活下去抵抗的欲望。我们被迫违背良心执行了一个枪毙任务，结果是自己难过得想自杀，但也非常想互相谈谈以驱除这梦魇。现在，我们知道完了，掉在陷阱里，除了往下掉没别的出路。但多年熟读小说中的种种逃生奇迹，我也一寸一寸地检查起我这牢穴：墙是半码厚，门很重，外头有卫兵，小窗上有铁栏杆。我有个磨指甲刀，也许我可以锯断一条，甚至全部，我极瘦也许可以挤出去。但窗外紧接着是一大堵防空水泥墙。

每隔一阵，他们提押我审问。如果福沙审，情形就不太糟。福沙是一种我从未遇到的人，一个完全守规矩的法西斯分子，笨而勇敢。当兵（他曾在非洲和西班牙打仗，爱以此向我们吹牛）使他愚笨无知，但没使他腐化失去人性。他一辈子相信灾难起于两个人：国王和齐亚

诺^①，他们就在那几天在佛罗拿被枪毙。若不是从头他们就颠覆法西斯战争，意大利早就赢了。他认为我糊涂，交友不慎。在他阶级导向的心灵深处，他深信一个大学毕业生，不会真的是个“危险分子”。他要审问是出于无聊，或是为了给我洗脑并证明自己重要，并没有真正调查的意思。他是军人不是警察，他从不问困窘的问题，也不问我是否是犹太人。

另一方面，卡尼的拷问令人害怕。他就是抓到我们的那个密探，一个天生的、彻底的间谍，而非纯粹出于法西斯信仰及金钱回报。他每一寸血肉都爱伤人，有种浮夸的虐待狂特性，就像一个猎人射杀野兽。他很有技术。他先是以有力的身份证明加入我们邻近一游击组织，自称有许多德国军事机密，后来证实那都是盖世太保假造的。他负责那组织的防卫工作，让他们耗费精力搞消防演习（顺便也浪费不少子弹），然后溜回山谷，重回时就是以缉捕队队长身份出现。他大约三十岁，看来苍白无力，审问开始时桌上放把手枪，明显而刺眼，然后分秒不停，要知道每件事。他不断以拷打和行刑队为威胁，但我运气好，几乎什么都不知道，而我了解的别人都不知。他一会儿假装客气，一会儿冒充愤怒。他告诉我（可能是恫吓）他知道我是犹太人。那倒好，不是犹太人就是游击队。若是后者，他会把我拖出去枪毙。如果是犹太人，好，就在卡尔必有个集中营，那儿不是屠场，我可以去那儿等到最后胜利。部分出于疲惫，部分由于非理性的自尊，我承认是犹太人，但我绝不相信他的话。他自己不是说过，那集中营过几天就要被盖世太保接管？

牢穴中有一个小灯泡，晚上也亮着，几乎不能看字，但我仍读了很

① 齐亚诺（Ciano），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之外交部长，曾参与导致墨索里尼垮台的政变。

多东西，因为我以为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第四天放风时，我偷偷地在口袋里放了颗石头，因为我想和阿尔多以及基多联络，他们就在隔壁。我成功了，但可真累人，在墙上一下一下地敲密码，要花一小时才通一个句子。我把耳朵贴到墙上听回音，却又听到楼上大厅的兵士在唱歌：“阿里格里的风景……”或“但我没把冲锋枪留下……”或哭泣的“来吧，森林中有条路”。

牢中有只老鼠和我做伴，但半夜里它啃我的面包。屋里有两张铺，我拆了一张，拿了床板竖起来，把面包放到顶上，但在地上为老鼠留一些面包屑。我觉得自己比它更像只老鼠；我想念森林中的小路、窗外的雪、茫茫的山，以及千万件自由身可做的美事，不禁呜咽起来。

冻得要命，我猛敲门直到守卫出现，要求见福沙。那守卫在缉捕时是揍我的人，但当他发现我是“博士”时，他求我原谅他；意大利可真是个奇怪的国度。他没让我见福沙，但拿来毯子，并准许每晚熄灯前，可以站在炉前取暖半小时。

新规定当晚开始。一个民兵来带我，还带着另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囚犯。可惜，若是基多或阿尔多就更好了，但至少他是个人可以谈话。他带我们到伙房去，黝黑而低矮的房中有个巨大的火炉，好暖！民兵令我们坐在板凳上，他自己坐在门边挡住门，把冲锋枪竖在两膝间。但几分钟后，他对我们失掉兴趣就睡着了。

那囚犯好奇地看着我。“你是反抗军吗？”他问道。他大约三十五岁，瘦而有点驼背，有头卷卷的乱发，胡须不整，鹰钩鼻，嘴无唇，双眼闪烁。他的双手粗糙奇大，不停地动，一下抓自己，一下敲板凳。我注意到他手有点抖，呼吸有酒味，我想他刚被捕。他口音像是山谷里人，但不像农夫。我不着边际地回答他，但他又问：

“他睡着了，你愿意的话可以说。反正我关不久，可以帮你带消息出去。”

他看起来不可靠。“你为什么进来？”我问。

“走私。我不想分给他们，就这样。最后我们会达成协议，但之前他们得把我关着。真糟，这样生意做不好。”

“现在什么生意也不好！”

“但我的生意特别，我只在冬天走私，此时朵拉河面结冰。其他时候我做各种事，不管什么事都是自己当老板。我们是自由业，我父亲喜欢这样，祖父、列祖列宗直到罗马时代都是这样。”

我没听懂冻住的朵拉河的意义，要他解释，他是个渔夫吗？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朵拉河？”他回答，“因为它是金子做的，当然不是整条河都是金子，它有金沙，当冻住时你就没法淘金。”

“河底有金子？”

“是的，在沙中，不是到处都有，而是在一些河段。河水把金子从山上冲下到处乱堆，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祖先传下来给我的河湾地是含金最丰富的地方。那儿隐秘，没人能找到；反正最好是晚上去，没人来乱问。像去年冬天，河流冻住，你就不能工作，因为只要你切了一个洞，马上又冻住，何况手根本不听指挥。如果我是你，你是我，我发誓我会告诉你——我们的地方在哪里。”

我对这句话感到不舒服。我自己了解自己，用不着陌生人告诉我。那人知道失言，笨拙地试着修正：

“哦，我的意思是这些属于机密，连朋友都不能讲的。我是靠这过活的，在世界上我还没其他东西，但我可不愿和银行家换位置。你看，那儿金子也不多，事实上是很少，你洗上整晚才弄到两三克，但它永不枯竭。你总可以再回去，明晚或下个月，只要你喜欢，金子会再来，就像地上的草再长回去；所以没人比我们更自由，也是为什么关在这里我觉得会发疯。”

“而且，你要了解，不是每个人都能洗沙，这工作令人满意。父亲

教我，只有我，因为我最聪明，其他兄弟在工厂工作，他只把淘金锅子留给我。”他把那奇大的手弯成杯状摇动。

“不是每天都可以，天气好时和月缺时比较好。我说不上为什么，但如果你要试试，它就是这样。”

我以沉默感谢这好预兆。我当然要试一下，我为什么不试？那些日子里，我勇敢地坐在那儿等死，胸中充满强烈欲念，想要尝试每件事，尝试人世的所有可能经历。我诅咒毫无成就的前世，感觉时间就从指尖溜掉，分分秒秒从身上跑走，像止不住的血。当然，我要去寻金，不是要发财而是去试个新技术，再享受土地、空气和水，再去追寻我化学事业的基本形态——分离，也就是从矿沙中淘洗金子的技艺。

“我并没有全部卖掉，”那人继续说，“我太爱它了。我自己留一些，每年做两次熔化加工。我不是艺术家，但喜欢自己做手工，锤它、刻它、刮它。我对发财没兴趣，重要的是自由地活，不要像狗一样圈着脖子。我想做的时候就做，不要别人跑来和我说：‘快点！别偷懒。’所以我厌恶留在这儿，这样起码损了一天活。”

民兵梦中一抖，枪掉到地上哗啦响。那人和我快速地交换眼色，双方立刻明白。两人从凳子上跃起，但我们根本还没时间走，民兵已捡起枪。他坐起来，看看表，用威尼斯方言咒了一句，粗声地告诉我们该回房了。在走道上，我们碰到基多和阿尔多被另外一个兵带往伙房：他们向我点头示意。

牢穴中，我再度面对孤独与凄寒，小窗飘进的山岚，和明日的焦虑。在宵禁的寂静中我倾听。你可以听到朵拉河的呜咽，失去的朋友，以及青春、欢乐，也许生命。朵拉河就在近处默默地流过，它塞满融冰的子宫带着金子。我嫉妒那来历暧昧的同伴，他马上可回到他那朝不保夕但极其自由的生活，重拾他那涓涓细流、永不止歇的金子，以及绵延不尽的日子。

Cerium 铈

我想既然甘油是肥油分解的产物，
它一定能提供卡路里，
就强迫自己吞甘油。
也许的确有卡路里吧！
但副作用非常不愉快。

我，一个化学家，在这儿写我的化学故事，而曾在另外一个世界活过来的故事我已在他处写过^①。

事隔三十年，我很难说清楚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那个有我名字，号码174517的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时，我一定已克服了最困难的危机，隶属“营”的危机。我如果要生存、思考和工作，一定已培养了一种古怪的无情，以面对日日的死亡和苏联解放者将临（只距离八十公里了）的疯狂。希望和无助的快速轮替，足以毁灭任何正常人。

我们不正常，因为我们饥饿。那种饥饿和普通人错过一餐但会有下餐的感觉（不完全讨厌的）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已附身一年的欲求，深入骨髓，全面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吃，找吃的，是第一要事，远在其后的，才是生存的其他事，更后更远的，才是对家庭的回忆和对死亡的恐惧。

我在集中营的化学工厂实验室中工作（在其他书中谈过），为了粮食，我做小偷。如果你不是从小就偷，学做贼可不容易。我过了几个月才能完全压制罪恶感，并获得必要的技术。有天我突然了解（随后大笑一阵）我正在重演——我，一个可敬的大学毕业生——一条名狗的退化兼进化的过程。一条维多利亚的达尔文狗，它被放逐到野地变成贼才

① 原注：参见我的两本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如果这就是人类》和《终战》。

能活下去——《野性的呼唤》^①里的巴克。我偷得像它，像狐狸。每样东西我都偷，除了囚友的面包。

从你可以由偷窃获利的物质的观点来说，那个实验室是块处女地，等人来开发。有汽油、酒精这种普通但不便的赃物；很多人偷它，价格高但风险也高，因为需要容器。每个经验丰富的化学家都知道包装化学产品之难，上帝则有高明的法子，细胞膜、蛋壳、橘皮、皮肤都是，我们毕竟也是液体。那时还没有聚乙烯塑胶，若有的话我就好办了。它轻而软，绝不透水。但我想它太不易腐败，上帝一定不喜欢；虽然他是聚合化学之王，他不喜欢死硬不化的东西。

我既然缺乏包装材料，理想赃货应是固体，不易破，不笨重，最好是新物质。它体积不能大，因下工时在门口会搜身。最后，“营”里的复杂社会一定有部分人对它有需求。

我已在实验室试了几回，曾偷过几百克的脂肪酸，是辛苦地氧化很多石蜡而得来的。我吃了一半，它真减少了饥饿感，但味道可真恶劣，所以我放弃去卖另外一半的念头。我也曾试着用卫生棉花做烙饼，是用电热板去烤。有烧焦糖的味道，但看起来太恶心，想必没人要。我也试着直接把棉花卖给营属医院一次，但太麻烦，又缺需求。我想既然甘油是肥油分解的产物，它一定能提供卡路里，就强迫自己吞甘油。也许的确有卡路里吧！但副作用非常不愉快。

在一个架子上有个神秘的瓶子，里面有大约二十根灰灰硬硬、没味道的棒子，上面没有标签。这很奇怪，这里可是个德国实验室。当然，苏联人只距离几公里远，灾难近在眼前，每天轰炸，大家都知道战事快完了，但有些事想必是不变的：我们挨饿过日子，实验室是德国的，德国人从不忘贴标签。事实上，实验室所有其他瓶子都贴了，打字的，

① 《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所著小说。

或用漂亮的哥特体写的——只有那罐没标签。

当时，我当然也没设备和闲工夫去鉴定这些小棒子的成分，我在口袋藏了三根，当晚就带回营里。它们有二十五厘米长，直径三到四厘米。

我让阿拔图看看，他从口袋掏出小刀想切开，但切不开。他刮一刮，看到一些黄火花。此时，鉴定就不难了，这是铁铈，一种制造打火机火石的合金。但为什么这么大？阿拔图曾和一群焊工工作了几星期，他说那是用来点焊快的。此时我开始怀疑这货的市场机会，它也许可点把火，但“营”里火柴（非法的）并不很少。

阿拔图叱责我。对他，气馁、悲观和放弃都是讨厌该骂。他不接受这集中营的世界，直觉上，理性上，他都拒绝被感染。他是个心肠好但意志坚定的人，奇迹似的超脱。他没低头，也不折腰。他的举动、笑颜有种解放的力量，是“营”网的裂缝。所有接触他的人都感觉到了，即使那些不懂他语言的人。我相信没人比他更受爱戴。他责骂我：“你不可气馁，那有害，所以不道德，简直是下流。你已偷了铈，好！那我们就开始搞。”他要来处理，要把它变成宝。普罗米修斯真笨，天上偷的火该卖给人才是；他可赚钱，讨好丘比特，并避免后来被秃鹰啄食的酷刑。

我们可得精明些！这顿有关精明的训话可不是第一次。阿拔图常如此跟我说，之前自由时就有别人说过，之后又有很多人说过，直到今天人家对我说了无数次，结果是在我身上产生一危险倾向：可以和真正精明的人相处，使他占我便宜。而阿拔图则是个理想的朋友，他精明而不损友。我当时并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总知道每一个人的事，虽然他不懂德文、波兰文和法文）在工厂有个地下打火机制造业，有人利用闲余时间为大官、平民做打火机。那么，火石有销路了，但它尺寸得很小。我们怎么把它切小呢？“别烦，”他说，“让我来，你只管偷。”

第二天，我毫无困难地照阿拔图的指示去做。早上十点左右，空袭警报拉起。警报并不新鲜，但每次我们——我们及所有人——仍骨头发麻。那不像人间的声音，它出奇响亮，同时往上高拔再降到如雷轰耳。它不可能是随便发明的，在德国没有任何事是随便的，而且它和背景及目标完全配合。我常想这是个狠毒的音乐家发明的，他披上狼衣在狂风中对着月亮哭号。它挑起恐慌，不只是它宣告轰炸将至，也因它本身的恐怖，几乎像遍地伤兽的哀号。

德国人比我们更怕轰炸，我们反而不怕，因为那不是瞄准我们的，是送给我们的敌人的。几秒钟内，我就在实验室里了，口袋装满了所有的铀，直接冲回同伴那儿。空中已满布轰炸机，飘下片片黄单子，上面印着恶劣的嘲讽句子：

*Im Bauch kein Fett,
Acht Uhr ins Bett;
Der Arsch kaum, warm,
Fliegeralarm!*

翻译出来是：

肠里没糖
八点上床
屁股刚到
空袭警报

我们不准进防空洞，而是集合在工厂四周的空地上。炸弹下来时，我趴在冻泥巴地里，压在口袋里的小棒上，沉思我奇怪的命运，我们如

树叶似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照阿拔图说的，打火石的价钱等于一次面包配给，那就是一天的生命；我至少偷了四十条铈棒，每条可以做三枚火石，总共就是一百二十枚，是我两个月和阿拔图两个月的生命。两个月后，苏联人就会来解放我们了。最后会是铈救了我，这个元素我完全不了解，除了那唯一的实际用途。铈属于那模棱两可、异端的稀土族，它的名字和拉丁文、意大利文的蜡（*cera*）无关，也不是要纪念它的发现者，而是为庆祝（老派化学家真谦虚！）小行星色列斯^①，因为这金属和这行星同在公元一八〇一年发现。这也许是一种占星和炼金术的爱恋关系：太阳是金，火星是铁，那色列斯（*Ceres*）就一定是铈（*cerium*）。

那晚，我带铈棒回营房，阿拔图带回一金属盘，盘中有小圆洞，这小洞就是口径；我们得把铈棒弄到那口径才能转变成火石，再化成面包。

接下来可要小心。阿拔图说小棒得秘密地用力削，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的秘密。什么时候？晚上。哪儿？在大木屋里、床单下、草褥上，冒着起火，然后被吊死——这是任何人在房里点火的处罚——的危险。

在事成以后，人们总不大愿意批评蛮干的事，不论做的是自己或他人。也许这次还不够蛮干？也许真存在着上帝来保护小孩、蠢蛋和醉鬼？也许这种事比许多其他糟事更重大、更温暖，所以人们爱谈它？但我们可没问这些问题。“营”让我们深谙危险与死亡。对我们而言，冒险搞吃的完全合乎逻辑，理由简直明显。

伙伴们睡时，夜夜我们拿刀干。景象凄惨可泣；房内孤灯一盏，暗影中那些脸为睡梦折磨着，带着死味。下颚大动，都在梦吃。有些人手脚吊在床外，还有人呻吟说梦话。

① 色列斯（*Ceres*）也是罗马神话中的谷神。

但我们俩可醒着。我们用膝盖顶着被单，在这个小帐下拼命地瞎锉，每一下都听到小爆声，看到火花上冒，每隔一阵，则停下来看看棒条能不能通过那小洞。如不能，就再锉。如能，就折下收起来。

我们干了三晚，没人发现，床单和草褥也没起火。我们就是如此赚到面包，残活到苏联人来，如此建立信任和友谊的。我后来的事已在别的书里谈过。当战线逼近时，阿拔图和多数囚徒步行离开。德国人让他们在雪地里日夜地走，走不动的就枪杀，剩下的就用货车载到新的奴工营布成瓦德和毛沙森。熬过来的人不到四分之一。

阿拔图没回来，没留下任何踪迹。战后，他家乡有个人，半凭想象，半凭谎言，向他妈妈说了很多假故事安慰她，骗她钱以此过活多年。

Chromium 铬

那时我还不大会领略表格那种恐怖的麻痹人心的能力，
它那熄灭、钝化人想象力的效果。

有学问的人都知道，

所有分泌物都可能是有害毒物。

现在，在病态状况下，

这表格——一种公司的分泌物——

被重度地再吸收了，

麻痹且瘫痪了原来弄出它的公司。

主菜是鱼，但佐以红酒。营缮组长维辛诺说那些规矩都是扯淡，只要酒和鱼味道好就行。他相信那些遵从传统说法的人若蒙上眼睛，大部分人分不出红酒和白酒。硝化部门的布罗尼问有没有人知道鱼为什么要配白酒，这招来不少玩笑话，但没人说得上来。卡密多老头提起生活中有很多不知来源的习俗：糖果纸的颜色，男女衬衫扣子不同边，威尼斯船船头的形状，猪脚配扁豆，通心粉配乳酪。

我在心中迅速盘算一下，这些人应该还没听过，然后我就开始谈亚麻子油加洋葱的故事。这儿是油漆制造公司的餐厅，大家都知道几世纪以来，煮沸的亚麻子油，一直是这行的基本原料。它是个古老尊贵的艺术，最早出现在圣经《创世记》第六章十四节，诺亚按照上帝的意旨以熔化的松脂涂了（大概用刷子）方舟里外。但它也是个欺骗的艺术，表面的一层掩饰着下层的本来面目。从这点看，它同化妆品、装饰品，几乎一样古老（《以赛亚》第三章十六节）。既然它有几千年历史，这行业有些怪异的习惯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近代技术改进很多）。

言归正传，我告诉同桌吃饭的人，一本一九四二年出版的配方手册里建议，亚麻子油煮沸后，要在油中加入两片洋葱，但没说为什么。我在一九四九年曾问我的前任者，也是老师，奥林多先生。那时他已七十岁，做油漆已有五十年。他微笑着和我说，事实上他年轻时，还没使用温度计，只有借着观察烟来判断温度，或吐口水，或放一小片洋葱，如果洋葱开始炸了，油就煮好了。显然，事隔多年后，人们忘了原来量度

的意义，它成了一个神秘不可思议的法术。

卡密多老头也说了个类似的故事。他不无怀念地回忆起从前的好时光，那使用珣玞树脂的年代。他告诉我们，亚麻子油如何和那有名的珣玞树脂混合来做耐久光亮的漆。今天，它的名称只见于这个词“珣玞鞋”，那是指在皮鞋上涂上一层漆，已有五十年不流行了。那时，树脂是英国人从最遥远、野蛮的国度进口，然后就以国度取名，像马达加斯加珣玞树脂，或狮子山、新西兰珣玞树脂及有名的刚果珣玞树脂。它们是植物化石产物，熔点很高，不溶于油。为了要溶解，需用强热去破坏它（去碳气酸），而熔点也下降。过程是直接用水加热一粗糙可移动的四五百磅的锅，可说是半工业半家庭式的。当树脂由于冒烟，水分蒸发而损失百分之十六的重量以后，就完成了。一九四〇年战时，由于供应困难，它就被酚树脂取代。酚树脂又便宜，又能溶于油。很好，卡密多告诉了我们，直到一九五三年，某大工厂（姑且隐其名）是如何以处理珣玞树脂方法处理酚树脂——加热到失去百分之十六的重量，以获得它本就存在的油溶性。

这时，我想起语言中常含一些不知出处的隐喻和比拟。今天骑术少有人精通，已变成贵族运动，有些用语像“肚子着地”、“咬马嚼子”，已经让人听不懂；今日磨坊多已消失，像“四座磨石般地吃”听来奇怪而神秘。大自然也一样保守，我们今天还带着尾椎骨，虽然尾巴早就没了。

布罗尼说了个他自己的经历。但对我而言，这是个甜蜜、细致的故事。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五年之间，他在一家湖边工厂工作，也就是我在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学做油漆的同一家工厂。在那儿，他负责合成漆部门，继承了个以铬为基底的防锈油漆配方，里面有项荒唐的成分：氯化铵——炼金术士的铵盐，这东西只会腐蚀，并不防锈。他到处问厂里的老手和上司，那是怎么回事。他们惊讶地说那东西本来就在里面，至

少十年了。这刚上任的黄毛小子怎么胆敢问这愚蠢的问题，质疑公司的经验？氯化铵一定有用处，虽然月用三十吨，也没人知道到底有什么用。但没人敢把它拿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布罗尼很不高兴。但他也很小心，只得接受劝告。也就是说，除非发生新的情况，那湖边工厂还会一直添加那完全无用的氯化铵。但今天我知道那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我就是那始作俑者。

这铬和氯化铵的故事，让我想起那寒冷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那时肉和煤还要配给，没人有车，意大利人以前从未如此地自由和满怀期望。

但，我三个月前才从集中营出来，生活困顿。那儿的见闻经历还在心中燃烧，我感觉离死人比活人还近些，甚至觉得做人很羞耻，因为人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它吞没了我很多亲人朋友、百万以上的人，和我热爱的女友。我觉得把那些故事讲出来能净化自己。我觉得像柯勒律治^①诗作中的老水手，在路边拦下赴喜宴的客人，诉说着自己的灾难。我写下血腥的诗句，告诉人们或写出那些故事，到最后，变成一本书。写作让我平静，觉得再次像个人，像个普通的有家室、有远景的正常人，而不是个烈士、难民或圣人。

但人不能靠诗、靠故事过活。我拼命找工作，找到湖边这为战事所半毁的工厂。没人理我。同事、上司、工人都忙着为别的事担忧——在苏联前线没回来的儿子、没柴的炉子、没玻璃的窗、冻破管子的冬天、通货膨胀、饥荒和夙怨。实验室中给我安了一张跛脚桌。四周到处是一些无所事事的人走来走去。我占着个化学家的闲缺，万分孤独疏离（那时不流行这字眼），没头没脑地一页一页写着那毒蚀我的回忆。同事偷

① 柯勒律治（Coleridge），英国诗人，其作品《古舟子咏》叙述的是一位迷信的水手在遭遇不幸航行后所得的体悟。

偷看着我这无害的疯子。手上这书就像蚁窝，没有设计地生长起来了。每隔一阵子，敬业精神促使我去找经理要些事做。他总是太忙，无暇理会我内心不安的问题。应该多读多研究，若你不在意我这么说的话，你还根本不懂油漆、蜡。没事干？好，赞美上帝，坐在图书馆用功吧。真闲得发痒的话，总有德文要翻译。

有天，他找我去，眼带闪烁地说有事给我了。他带我到工厂的院子，墙角乱堆着成千的亮橘色方块，下头的都压歪了。他叫我摸摸，觉得是软软的胶质，恶心的黏度像牛内脏。我说，除了颜色外，看来像牛肝。他称赞了我一下，说在油漆手册上就是这样描述的。他说这现象就叫作“肝化”。在有些状况下，一些油漆会变成固体，黏度像肝或肺，就只得丢掉。这些方块，原是罐装的油漆，肝化以后，罐子被切走，油漆就丢在这垃圾场。

他说，那些油漆是战时到停战期间制造的，含有碱性的铬酸盐和烷基树脂。也许是铬酸盐碱性太强，或树脂太酸了；这正是“肝化”的条件。好吧！就把这堆旧罪过交给你了。检验一下原因，想想有什么法子防止它再发生，最好这些废料能回收。

就这么决定了，半是化学，半是侦探工作，我喜欢这问题。那晚（是个星期六），坐在满是烟灰、冰冷的货运火车上，我回都灵时还想着这问题。第二天，命运给了我独一无二的礼物。我遇见一个有血有肉，透过大衣都感到温暖的年轻女人。我们轻快地在雾中的大街走着，到处都是废墟。不到几个钟头，我们都了解到这不是邂逅，而是要互属一辈子。后来的确如此。几小时内，我觉得久病再生，体内注入新活力，生活又充满了快乐和希望。周边的世界也痊愈了。心底沉淀的女人名字和脸孔也随之祓除。再次，我以欢欣的活力回到这世界。写作也成了新活动，不再是孤独悲伤的治疗之旅，不再哀讨同情，而是神智清明的建构活动，化学家量度、分割、判断、证明的工作。除了像老兵讲故事的解

脱感之外，对写作，我有一种崭新的复杂而浓烈的兴味，就像学生时代破解那些庄严的微分方程式。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找到、选出贴切的词来描述，严密而不累赘，自己感到得意。吊诡的是，原本恐怖记忆的负担，现在倒变成财富与种子。写作好像让我像植物般成长。

接下来的星期一，在上班的货车上，挤在一堆昏睡的人当中，我感到心中欣喜，从来没这么清醒。就像对付奥斯维辛，我可以挑战任何人和事，尤其是那些臃肿堆在湖边的橘色肝。

人说精神战胜物质，不是吗？他们在法西斯的异教徒学校里，不是这样洗我的脑吗？我全力投入工作，用功的程度就像不久以前对付石墙。对手仍是一样，那“非我”，易卜生剧中的“铸纽扣者”^①：愚蠢的物质，像有敌意的蠢人，坚强而不可理喻。我们这行就是要对付它并赢得这冗长的战斗：“肝化”了的漆，比疯狮子还不好对付，虽然我得承认它没那么危险。

第一战是档案。奸情两造搞出这橘色怪物的是铬酸盐和树脂。树脂是现场制造：它们每批的出生证明都找到了，看不出有何不轨。树脂的酸度略有变化，但总是按规定低于六。有一批 pH 值是六点二，但检验员照章行事把那批废了。树脂没问题。

铬酸盐是从各处买来的，一批批地经过检验。按采购规格四八〇之〇，它含氧化铬不得少于百分之二十八。而我眼前有从一九四二年到现在冗长的检验报告单（一种最无聊的读物），所有报告值都合乎规格。事实上，全都是百分之二十九点五，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看到这作孽的数据，我这化学家肚里发毛。因为每次制造这铬酸盐状况总不一样，加上分析技术的误差，产生出如此一致的结果是极端不可能的。但

①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剧作《彼尔·英特》（*Peer Gynt*）中的角色，为上帝之使者，欲带走任意妄为的主角彼尔之灵魂。

那时我还不大会领略表格那种恐怖的麻痹人心能力，它那熄灭、钝化人想象力的效果。有学问的人都知道，所有分泌物都可能是有害毒物。现在，在病态状况下，这表格——一种公司的分泌物——被重度地再吸收了，麻痹且瘫痪了原来弄出它的公司。

我慢慢搞清楚怎么回事了。为某种理由，某分析师误入歧途，用错方法，用错了药，还有不正确的习惯。他勤奋地不断记下如此可疑却形式上全然正确的数据，中规中矩签下每次检验。签名像雪崩似的越滚越大，实验室主管、技术主任和经理全都签名证明。我可以想象在那困苦年代，那个不再年轻的可怜虫。分析师是年轻人的工作。但战时年轻人都打仗去了，也许被法西斯所迫，也许就是法西斯。那可怜虫一定很无奈，分析需要年轻的耐力，在那细致专长的碉堡中守卫。按定义，分析师不能错，就因他根深蒂固的守护性，成为公司中严厉、迂腐而缺乏想象力的判官。从那匿名的规矩字体来看，他的工作已成就一种粗糙的完美性，同时也耗尽他的精力。就像溪中鹅卵石，一直翻滚到河口。长久以来，他对自己工作的真正意义已发展出一种钝性。我想研究他，但没人记得他，碰到的都是无礼或无心的回答。而且我感觉到周遭环绕着一种嘲弄、不怀好意的好奇：这黄毛小子，这月入七千里拉的菜鸟，整天写东写西打字吵人，成天翻人旧账挖人墙脚的家伙，到底是谁？我甚至暗中怀疑，这任务的目的是让我去惹人惹事。但如今，这“肝化”的事已进入我身体和灵魂。总之，我几乎像爱上那女孩般爱上这问题了。事实上女孩还有点吃醋呢。

除采购规格外，同样严格的检验规格也不难弄到手。实验室抽屉中有一盒油腻的卡片，打字修订过很多次，每张卡片记载着一样材料检验的方法。普鲁士蓝卡片就染着蓝色，甘油卡片黏黏的，鱼油卡片闻来像沙丁鱼。我取出铬酸盐的卡片，它用得很久了已呈朝阳的颜色。我仔细阅读，它看来蛮合理的，合乎我那还不大会生锈的学术观念。只有一点看

来奇怪。颜料分解后，它写着要加入二十三滴某药品。“滴”不是一个准确的单位，值得去准确地规定二十三吗？而且看来量也实在太多，会“淹”过分析的准确度，得到相同的数据。我看看卡片背面，上面有最后一次修订时间——是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第一批“肝化”物出生于该年二月二十二日。

这时，我开始懂了。在旧的档案柜，我找到失效的旧检验规格。哈！上面写着“二或三”滴，不是“二十三”滴。重要的“或”字被抹掉了一半，后来誊写时就全掉了。真相大白，卡片誊写时犯的错，让后来的分析检验全错了，又让过多本不该用的碱性颜料，全都派上用场了。这就造成“肝化”现象。

但，就像侦探小说读者都知道的，如果立刻向美妙的假设投诚，恐怕有麻烦。我找到睡眠惺忪的仓库管理员，拿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以后所有的铬酸盐原料，把自己关在实验室中三天，正确和错误两种分析方法都用。当检验结果逐渐记录成表后，无聊单调的检验工作变得有趣了。好像小时候玩捉迷藏，把藏在墙后的小家伙捉到。用错的方法，总是得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五。用正确方法，结果就差异很大。有四分之一的样品成分未达最低要求，应予退货。诊断完成，现在该找治理的方法了。

运用“无机化学”的老知识，我很快找到法子。对我们有机化学家（黏巴巴的化学）而言，“无机化学”是远方的失乐园。对那病态漆，必须中和氧化铅所产生的碱性。但很多酸有刺激性，我想到用氯化铵。它可以稳定地和氧化铅结合变成氯化铅，然后放出氨气。小量试验看来有希望。好，找来氯化铵，和研磨组协议，在研磨机中加入两块恶心的“肝”和这治病的药，在众人疑心的目光下开始磨。通常很吵的研磨机，被那黏黏的固体胶住，几乎不甘愿地慢慢磨着。剩下的，只有回都灵，等下星期一看结果来宣判吧。

到星期一，研磨机已恢复正常声音，发出连续的磨声。没那有韵律

的声音，机器就是有毛病。我停了机器，小心翼翼地打开栓子，冒出一股臭氨气。然后，我打开盖子。天使保佑！油漆平滑流动且完全正常，如灰烬中复活的火凤凰。我以正确的公司术语写出报告，得到加薪。我那脚踏车还获得两个新轮胎，以示嘉奖。

因仓库中还有一些过于碱性的铬酸盐原料，又不能退货，氯化铵就正式被定为添加剂以防肝化。不久，我就离职了。十年的战后年代也过了，过分碱性的铬酸盐早已从市场消失，我的报告如所有肉身从世界消失。但公式神圣如祈祷文、法令和古文字，一字都不能改。所以我那氯化铵——爱情与解放的双胞胎——虽然如今毫无用处可能还有害，却仍然在那湖岸边很虔诚地被磨入防锈漆中。没人知道为什么。

Sulfur

硫

虽有面具，也许有些漏缝吧，
他立刻闻到那肮脏、恶劣的臭味。
他想到神父也许是对的，
地狱有硫黄味。
每个人都知道，
连狗也不喜欢它。

蓝查把脚踏车停进车架，打了卡，到锅炉间，上好搅拌器，打开马达。汽化石油精轰然点燃，喷出一团逆火。然后它开始低沉连续地运转。蓝查半睡不醒地坐在火炉前，火光跳跃，映出他巨大背影在墙上舞蹈着，好像早期电影院。

半小时后，温度计开始动了，针尖慢慢移到九十五度停住。这是正常的，因温度计误差了五度。蓝查很满意，他对这锅炉、温度计、这世界及自己都满意，因所有该转的都转，因为只有他知道温度计差五度。也许别人就会加火升到工作表要求的一百度。

所以，温度计在九十五度停很久，然后再上升。蓝查仍留在炉边，暖暖地，瞌睡虫又开始爬上来。他让瞌睡虫侵入身体某些部分。但双眼可不允许，一定要清醒地看着温度。

硫化双烯可得小心处理，但此时一切正常，蓝查舒服地休息着，半睡半醒，脑际间飘浮着思绪。房里很热，蓝查想着家乡的妻子、儿子、田园和酒店，以及酒店的热气和牛栏的臭味。暴雨后，水滴进牛栏。也许是从裂缝吧，因为所有的瓦片都是完整的（他复活节时才检查过）。栏里还可以再容一头母牛，但……（思绪渐渐模糊掉了。）他每分钟工作赚十里拉，呼呼的火和搅拌机似乎是他的摇钱树。

蓝查，爬起来！已经到了一百八十度，得打开炉子丢进 B41。但还在叫它 B41 实在是个大笑话，整个工厂都知道它就是硫。战时物资缺乏，很多人偷拿回家，卖到黑市给农夫洒到葡萄园。但老板要这样叫，

就这样叫吧。

他关掉火，停掉搅拌机，打开栓子，戴上防毒面具（感到像半鼠半熊）。B41已称好装三个纸盒里，他小心倒进去。虽有面具，也许有些漏缝吧，他立刻闻到那肮脏、恶劣的臭味。他想到神父也许是对的，地狱有硫黄味。每个人都知道，连狗也不喜欢它。倒完后，他把门关起来，一切再重新开始。

清晨三点，温度到了两百度，要抽真空了。他拉起黑把手，抽气机尖锐的声音就混入锅炉低沉的哼声，原指在零的真空计指针开始向左移。二十、四十，可以了。这时可以点上一根烟再休息一个钟头。

有人天生好命，有人注定歹命。他，蓝查，注定日夜颠倒（他打个哈欠，弄点声音做伴）。好像他们也猜到了，战时，他们就推他半夜站到屋顶去射天上的飞机。

唰地一下，他跳起来，竖起耳朵，全身神经都抽紧。马达声突然慢下来，咳着，像被堵住了。压力计指针已移到零，还一点点向右移动。天呀，锅里的压力正在增加。

“关掉逃命。”“全都关掉，快逃。”但他没跑。他抓住扳手，沿着真空管路一路敲。一定是塞住了，没别的理由。敲，再敲，无效。马达还在转，指针已到了三分之一大气压力。

蓝查觉得全身汗毛竖起，像愤怒的猫尾巴。那蹲在火上的丑八怪，红热的倒毛刺猬，简直混蛋透顶。他气极了，恨不得跳上去把它踢烂。拳头紧握，头皮发胀，蓝查拼了命松开栓子。看，黄泥从缝里冒出，锅里一定在冒泡。蓝查摔上门，感到天杀的欲望，想打电话叫老板，叫救火队，叫老天赶来帮他。

锅子承受不了压力，随时都会炸，至少蓝查是这么想的。如果在白天，或有旁人，也许他不会这么想。但恐惧转为愤怒，当愤怒慢慢消下来，脑袋就冷静点。然后，他想起最显而易见的事：他打开吸气扇活

门，启动它，关掉泵。因为搞对了，他松了口气，他看到针回到零，像迷路羔羊回到羊群，然后再到真空的一边。

他扭头张望，全身发酥想大笑，想找人告诉他们这事。他看到地上的一根香烟已变成一条长灰，它自己烧的。五点二十分，天快亮了，温度计指到二百一十度。他从锅中取点样品，让它冷却，用试剂检验，试管有几秒钟的清澄，然后变成乳白色。蓝查关掉火，停掉搅拌机和风扇，打开真空阀，听到长长的嘶声，逐渐转成沙沙声，最后是低语直到沉默。他锁上虹吸管，打开压缩机，在一阵白色的臭气中，浓稠的树脂液流进采集盒，形成一盒亮黑的镜子。

蓝查走到大门去和卡敏相会，他正要进门。他告诉他说一切正常，交与他工作表，然后给脚踏车打气。

Titanium

钛

玛丽亚想想，再问：

“为什么这么白？”

男人也想了一会儿，

好像这问题很难，

然后用深沉的声音回答：

“因为这是钛。”

致费丽丝·范廷诺

厨房里有个人很高的男人，衣着是玛丽亚从来没见过。他头上戴着一个报纸折的船，抽着烟斗，正在把柜子漆成白色。

真不可思议，那么多白色怎么从这么小的罐子里出来，玛丽亚想过去看看里面。每隔一阵，那人把烟斗放在柜子上，开始吹口哨，接着又唱歌。每隔一阵，他退后两步眯起眼看看，有时他会走开吐口水到垃圾桶，然后用手背擦嘴。总之，他做很多新鲜事，留在那儿看他很有趣。当柜子变白，他提起桶子和地上的许多报纸，移到碗橱旁，把它也漆白。

柜子如此干净，如此洁白，几乎不能不摸它。玛丽亚过去柜子那里，但男人注意到了，说：“不要摸，一定不要。”

玛丽亚惊奇地停住，问：“为什么？”男人回答道：“因为不应该去摸。”玛丽亚想想，再问：“为什么这么白？”男人也想了一会儿，好像这问题很难，然后用深沉的声音回答：“因为这是钛^①。”

玛丽亚感到害怕，打了个寒战，就像在那童话故事里，你走到吃人魔面前时一样。她仔细看看，男人手上和附近都没有刀，但他可能藏起来了。然后她问：“切我什么？”——此时，他大可以说：“切你的舌头。”但他只说：“我什么也不切，这是钛。”

总之，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家伙，但他好像没生气，而且好脾气，

① 玛丽亚把“钛”(titanium)听成意大利文“Ti taglio”，后者意思是“我切你”。

很友善的样子。玛丽亚问他：“先生，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费丽丝。”他没把烟斗拿出嘴巴，他说话时，烟斗上下抖动着，但没掉出来。玛丽亚安静地站在那里，一会儿看看男人，一会儿看看柜子。她不满意那回答，想要问他为什么叫费丽丝，但她不敢问，她记得小孩子不可以乱问。她的朋友爱丽丝是个小孩，所以真奇怪，一个大男人竟叫费丽丝。但慢慢地，她觉得那男人叫费丽丝很自然，事实上她想他不可能叫其他任何名字。

柜子漆得这么白，所以厨房其他地方看起来又黄又脏。玛丽亚认定走过去仔细看看没什么错，只是看看，不碰的。但当她踮起脚尖时，突然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男人转过身，只两步就到她身边；他从口袋拿出一支粉笔，在玛丽亚四周画了一个圆圈。然后他说：“你一定得留在里面。”之后，他划根火柴点燃烟斗，歪扭嘴巴做了好几个鬼脸，重新去漆橱子。

玛丽亚蹲下来仔细看那个圈圈好久，终于相信绝对没有出路。她试着用指头擦掉一点，粉线真的消失了。但她很清楚那人一定以为这是赖皮。

圈圈显然有魔力。玛丽亚安静地坐在地板上，每隔一阵她试着伸脚尖去碰线，身体向前倾得快失去平衡。但不久她就知道还要一只手的距离才碰得到柜子或墙壁。所以她只能坐在那儿，看着橱子、椅子、桌子全变成美丽的白色。

很久以后，男人放下刷子和油漆桶，从头上拿下报纸帽，这时你可以看到他也有头发。然后他走出阳台，玛丽亚听到他在隔壁翻东西，到处走来走去。玛丽亚开始叫：“先生！”先是小声，然后大声点，但不是太大声，因为实际上她怕男人听到。

终于，男人回到厨房，玛丽亚问：“先生，我现在可以出来了么？”男人低头看着圈圈里的玛丽亚，大笑，说了一堆她听不懂的

话，但他似乎没生气。最后他说：“是的，你当然可以出来。”玛丽亚没动，困惑地看着他。然后男人拿起一块抹布小心地擦掉圈圈，解除掉魔力。当圈圈消失时，玛丽亚起来跳着走开，她觉得很高兴很满足。

Arsenic

砷

一个化学家没有嗅觉就麻烦了。

至此，不太可能弄错了：就过滤它，酸化它，
从气体发生器让硫化氢通过溶液。

我们得到黄色的硫化砷沉淀。

一句话，这里面有很毒的砷素，

故事中米提达王及包法利夫人的砷素。

这顾客看起来奇怪。我们卑微而活跃的实验室，化验各种不同东西，各色人都来，男女老少都有，但看起来都是工商人士。任何做买卖的都很容易认出来，他们有双锐眼，严肃的脸，他们怕被骗或考虑骗人，像黄昏的猫一般机警。那是一种倾向摧毁灵魂的行业。有哲学家做朝臣，有哲学家磨眼镜片，甚至做工程师；但是据我所知，没有哲学家是店东或大盘商。

爱密罗不在，由我来接待他。他可能是个农夫哲学家：是个健康的老头，一双粗手因工作和关节炎而略弯。虽然眼睛下已有眼袋，但双眼有神。他穿着背心，小口袋垂出表链。他讲皮埃蒙特方言，这马上让我不安：用意大利语回答方言不大礼貌，这马上就会把自己放到篱障的另一边，在贵族的一边，在有地位的一边，在与我同名而有名的莱维所说的“Luigini”一边^①。我的皮埃蒙特话虽然音调正确，却太正式而礼貌，听起来不真实，不像是祖传，而像是从文法字典苦学来的。

于是他用流利的带着机敏的亚斯提腔调的皮埃蒙特话告诉我，他有一些糖想要化验。他要知道那是不是糖，或里面是否有“秽物”？什么秽物？我解释说，如果他能对他的可疑物作更精确的说明，会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但他回答他不想影响我，我尽量去做，以后他会告诉

① 即有地位、听话的中产阶级。“同名而有名”是指作家卡罗·莱维（Carlo Levi），他在他的书《表》（*The Watch*）中有趣地谈论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我怀疑什么。他留下一个纸袋，里面大概有半公斤糖，说第二天再来，再见，走了。他没乘电梯，走下四层楼梯。看来是一个不急不躁的人。

我们没很多顾客，还没做什么化验，也没赚多少钱。所以我们买不起现代快速仪器，我们的方法缓慢。我们连个招牌都没有，恶性循环带来更少的顾客。这些样品对我们的营养可助益不少。爱密罗和我小心地不让顾客知道，一般只要几克就够分析了，我们很愿意收下一公升酒或牛奶，一公斤通心粉或肥皂。

但从客人说的病历，即那老人的怀疑，盲目地吃这糖恐怕不安全。我把一点糖溶在水里，它是混浊的。显然有问题。我称了一克的糖放到白金坩埚里，在火上加热。先是一阵有家庭小孩味的焦糖，但接着火焰变成蓝灰色，气味也不一样，是金属的、无机的气味（事实上，是反有机）——一个化学家没有嗅觉就麻烦了。至此，不太可能弄错了：就过滤它，酸化它，从气体发生器让硫化氢通过溶液。我们得到黄色的硫化砷沉淀。一句话，这里面有很毒的砷素，故事中米提达王及包法利夫人的砷素。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花在蒸馏丙酮酸上，心里思索着老人的糖。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制备丙酮酸；那时，我们是在一搪瓷盘里熔化硫酸和苏打，以得到硫酸氢钠，然后在咖啡磨石机里磨固化的硫酸氢钠，再把它和酒石酸混合共热到二百五十摄氏度，后者脱水成丙酮酸然后蒸馏而出。最初，我们试着用玻璃蒸馏器，爆了无数个。后来从收旧货的那儿买了十个属于盟军剩余物资的汽油罐。在 PE 瓶出现之前的那种汽油罐正合我们所需。顾客似乎满意我们的产品，答应订更多货。我们就砸下一笔钱，找铁匠定做一个圆柱铁筒反应槽，装上一个手摇搅拌器。我们把它四周包上砖块，上下左右安装了四个一千瓦的电阻器。电源非法地从电表外接。如果一个专业同行读到这里，他不应对这种破烂摊式的化学太惊讶。经过六年的大战，我们都不大文明，非绝对必要的设施都免了。我们不是唯一如此折腾的化学家。

从冷凝管末端，黄金色的丙酮酸，如宝石般一滴一滴地流出来。每十滴赚一里拉。同时，我一直想着砷和老人的事。他看来不像会毒害别人，我实在想不透。

老人第二天来了。还没知道结果前，他坚持先付钱。当我报告结果，他脸色一亮，带着皱纹的微笑告诉我：“我很高兴，我总说有这么一天。”显然，他有个故事等着我来问。我没让他失望，下面是他的故事，从皮埃蒙特方言转录下来，可能有点失真。

“我是个鞋匠。如果年轻就开始做这行业也不错。坐着，不必太辛苦，可以遇见很多人。当然发不了财，成天手上拿着别人的鞋，但你会习惯老皮的气味。我的店在乔伯提街，在那儿做了三十年。我是第二区的鞋匠，知道那区所有的毛病脚，我的工作只需要锤子和麻线。之后来了个年轻人，不是本地人，高个儿、英俊、有志气。他在一箭之遥的地方开了家店，都是机器，可以拉长、放大、缝、锤，还有天晓得的什么其他玩意儿——我从不过去看，他们和我说的。他的名片上有地址电话，丢到每家信箱里；是的，先生，还有电话，好像接生婆。

“你一定以为他的生意马上就很好。第一个月是很好——有点出于好奇，有点要让我们彼此竞争，有些客人过去了，而且是因为开始时他把价钱故意压低。但后来他看赔本，就把价钱拉高。我说这些对他并没恶意，他这样子的我见多了，起头冲天，后来摔断脖子，不管是不是鞋匠都是如此。但别人告诉我，他对我有恶意，他们告诉我每样事，你知道是谁？老太婆们。她们脚痛，也不爱走路了，只有一双鞋。她们来我这儿——坐下等，同时让我知道一切详情。

“他对我有恶意，到处向人说我坏话，说我用硬纸板做鞋底，说我每晚喝醉，说我让老婆早死好收保险金。说钉子从客人鞋底穿出去，那人死于破伤风。所以事到如今，有天早上在鞋堆里找到这包东西，我也不太惊讶了。我立刻看穿这把戏，但我要把事情弄清楚，所以拿一点给

猫吃，两小时后它到角落去吐。然后我们放一点到糖碗，昨天女儿和我用来泡咖啡，两人都吐了。现在有你的确认，我很满意。”

“你要去告发吗？要不要证明信？”

“不，不。我告诉过你，他只是个可怜虫，我不想毁了他。这行业的天地很大，每人都有容身之地，他不知道，我可知道。”

“那么？”

“那么明天我将让一个小老太婆把包裹送回去，附封信。事实上，不——我想我要自己带去，这样可以看看他有什么表情，说他两下。”他像参观博物馆似的四下看看，然后接着说，“你这也是个好行业，需要好眼力和耐力。如果缺这些，最好找别的事。”

他说了再会，提起包裹，不搭电梯安详地走下去了。

Nitrogen

氮

事实上，化学和建筑一样，

是“美”的架构——

对称、简单，也是最坚固的。

总之，教堂圆顶与桥梁拱弧的道理，
和化学结构相似。

终于来了我们梦寐以求的顾客，他要我们做顾问。顾问是种理想的工作，那种不需弄脏手、折断腰、烤自己、毒自己，就会有钱有名气的工作。你只要脱下实验衣，打上领带，安详地听问题，然后你将有宛若阿波罗神谕的感觉。接着你必须小心回答，用语模糊复杂，让顾客真以为是神谕，并感到化学家公会定的价钱值得。

这个理想顾客大约四十出头，矮胖结实，他留着克拉克·盖博式的小胡子，全身是黑毛——从耳边、鼻孔、手背、指头背几乎到指甲都是。他擦香水、涂发油，有股流气。他看起来像老鸨，或一个演老鸨的三流演员，或像市郊贫民区来的混混。他解释他是家化妆品工厂的老板，他们某种口红品质出了问题。好，那拿些样品来吧；不，他说，是个特别的问题，得当场检查才行。最好我们之中有一个人过去看看什么问题。明天十点？好吧。

开车子过去会很神气，但当然，若你是个有车的化学家，而不是个可怜的从集中营回来的人，业余作者，还刚结婚，你就不会在这儿流汗追逐那做口红的。我穿上我最好的西装，想着最好是把脚踏车留在一条街之外，让他们以为我坐计程车来的。等到了工厂，我知道这些关于地位的顾虑都没必要。工厂是个装了很多通风机的仓库，乱七八糟加肮脏，有一打又懒又脏但浓妆艳抹的女工晃来晃去。老板介绍了工

厂，显得骄傲神气，他叫口红“rouge”^①，苯胺是“anelline”，苯甲基是“adelaide”^②。工作程序很简单：一个女孩把某种蜡和油溶化在一个普通搪瓷盆里，加点香料和颜色，倒进小模子。另一女孩用流水冷却模子，然后倒出二十根小的猩红口红棒，其他女孩负责组合包装。老板粗鲁地抓了个女工，手放在她脖子后押她靠近我，要我仔细看她嘴唇边缘。你看，才擦了几小时，口红就扩散，它沿着细小皱纹（即使年轻女孩也有皱纹）渗入，成了一团丑陋的红丝，模糊了嘴唇上口红的形状，破坏了整体效果。

我不无困窘地仔细看，嘴唇边缘的确有红丝，但只有右半边有。检查时，她嚼着美国口香糖像块木板一样站在那儿。老板解释说，她和其他所有女孩的左半边嘴唇是涂高级法国口红，也就是他要模仿的牌子。口红只能用这种直接的方法比较。每天早晨，所有女孩都擦口红，右边是他工厂的口红，左边是别家的口红。他每天吻所有女孩子八次，看看口红是否“抗吻”。

我问那混混要他口红的配方，他和别人的样品各一份。一看那配方，我马上就怀疑哪里出了毛病，但觉得还是小心点确定后再说。我要求用两天的时间来“分析”。我找到脚踏车，回去时想，如果这生意搞得不好，我也许可以换台摩托车骑。

回到实验室，拿张滤纸，我点上两个样品，把它放进八十摄氏度的烤箱。十五分钟后，左边的口红还是一个点，但右边口红的点，散开成铜板那么大的粉红晕轮。在那老板的配方里，有个可溶性的颜料，显然女人的体热（及我的烤箱）把油溶化后，颜料就跟着油扩散。而另外的口红一定含一种分散平均但不溶解的颜料，所以不会扩散。为了更加

① 是法文“红”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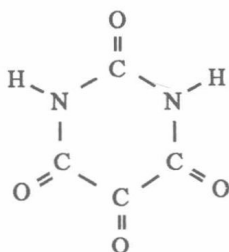
② 都是法文，故作有教养状。

确定，我用苯稀释后，再以离心加速机操作，在试管底端果然有那不溶的红颜料。借助我在湖边工厂的经验，我能指认它，那是一种不容易分散而且昂贵的颜料。那混混没有适当的仪器去分散它。好，那是他的问题，他自己去想办法，他以及他那一群天竺鼠女工大队，还有他那恶心的吻。我已完成我的服务，写好报告，附上账单、发票和那滤纸，回到工厂，交出去，收了钱，准备说再见。

混混留住我。他满意我的工作，想和我做个交易。我能不能帮他弄几公斤阿脉（alloxan）？他会付好价钱，只要我答应供货给他。他在杂志（我不记得什么杂志）上读到阿脉接触到黏膜，会赋予其一层很耐久的红颜色，因为它不像口红是涂上去的，而是像用于棉、毛的真染料。

我吞吞口水，为了谨慎，我说我们要研究一下，阿脉不是一个常见有名的化合物，我以前的化学课本大概不会花超过五行字的篇幅描述它，那时我只模糊地记得它是由尿素做出来的，和尿酸有关。

我立刻飞奔到图书馆，我是指尊贵的都灵大学化学系图书馆，那时它就像麦加，异教徒不准进入，连我这种信徒也很难进去。行政当局遵守的英明原则是贬抑科学艺术：只有那种有绝对需要，有燃烧求知欲的人，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牺牲考验，去读书查书。图书馆开放的时间很短又不定期，光线暗淡，卡片混乱，冬天没有暖气，没有椅子只有凳子！最后，图书馆员是个无能又无礼的丑八怪，坐在门口，用他的臭脸和狂吠吓阻想进去的人。通过考验后，我被放行，我立刻温习了一下阿脉的成分和结构。这儿是它的结构式：



O 是氧, C 是碳, H 是氢, N 是氮。这图很美丽, 是吧? 它让你想到一个稳固的架构。事实上, 化学和建筑一样, 是“美”的架构——对称、简单, 也是最坚固的。总之, 教堂圆顶和桥梁拱弧的道理, 和化学结构相似。很可能它的解释也不冷僻, 不必是玄秘的。“美丽”意指“可欲的”, 自从人类开始建筑以来, 就要建得又稳又便宜又美。当然, 不是一直如此, 曾有一段时间, “美”被看成是“装饰”, 外加的矫饰。但很可能这些是脱轨的年代。真正的美, 每世纪都承认的美, 是在石柱、船壳、斧刃和机翼上找到的。

辨识、欣赏了阿脉的结构美之后, 我这爱离题的化学人该回头办正事了, 就是搞物质赚钱养家糊口。我开始在架上查询 *Zentralblatt*^①, 它是杂志中的杂志, 从有化学学科以来就有了, 它报道每年全世界的化学报告的内容摘要。第一年只有薄薄的三四百页, 现在每年它有十四册, 每册一千三百页。它有完善的化学式索引和公式索引。你可利用它找到那些伟大的经典, 像有名的沃勒第一次有机合成^②的传奇性报告, 或圣克莱·德维尔描述第一次分离金属铝。

我从 *Zentralblatt* 移到 *Beilstein*, 一部同样伟大的百科书, 它始终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这百科书记载所有的新化合物和它合成的方法。阿脉被发现已七十年了, 但一直是个没有用的东西。它制备的方法有学术价值, 但原料太贵(战后的年代), 实在找不到市场。唯一可行的是最古老的方法, 看来不难做, 方法是氧化尿酸, 那是一种和痛风、膀胱结石有关的物质。这可不寻常的原料, 但也许并不贵。

事实上, 通过后来的资料查询, 让我学到, 尿酸在人和哺乳类动物排泄物中很少, 但它占鸟粪的百分之五十, 爬虫类排泄物的百分之

① 指《化学摘要大全》。

② 指 1828 年, 德国科学家弗里德里希·沃勒 (Friedrich Wöhler, 1800—1882) 由无机化合物做出尿素。

九十。好，我打电话给混混告诉他可以搞。只要给我几天的时间，到月底前我会带第一批阿脉的样品给他，告诉他要花多少钱，每月产量多少。一种将要美化女士唇部的物质，居然来自鸡和蛇的粪便，这一点也没让我不舒服。化学这行业（在奥斯维辛的经验更使我相信）教你要克服、忽略某些不必要或天生的禁忌。物质就是物质，既不神圣也不下流，可以无限转化，它的来源不是很重要。氮就是氮，奇迹似的从空气跑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我们。当它在人体内的功能结束后就排出去，但它仍是氮，无菌无害。我们——我指我们哺乳类——通常获得水没问题，而且已学会把氮变成尿素分子，它可以溶在水里然后排出体外。对其他动物（或对其祖宗），水就宝贵得多，于是它们聪明地想出办法把氮变成尿酸——它不能溶于水，然后以固体排出，就不必以水做介质。同样道理，今天我们也把都市垃圾压成块状，然后掩埋或丢弃。

再多谈一点：从粪便弄出化妆品，也就是 *aurum de stercore*（粪便变黄金），这主意一点没让我反感，反而让我感到温暖，感到回到源头，那时炼金术士从尿提炼磷。那是个空前的、愉快而崇高的冒险，因为它化腐朽为神奇。大自然就是这样的，羊齿的高雅来自森林的腐败，牧草来自大粪。“大粪”的拉丁文是 *laetamen*，而 *laetari* 不就是“欢乐”的意思吗？那是他们在中学教我们的。那晚我回家告诉太太尿酸和阿脉的故事，并说第二天我要出差，也就是，骑车去城外农场（那时还有）找鸡粪。她毫不迟疑，她喜欢乡下，而妻子应跟随先生；她将和我一起去度我们因穷和忙没能好好度的蜜月。但她警告我不要期望太高，找纯鸡粪并不容易。

事实上，的确很难。第一，*pollina*——乡下人这么叫，我们本不知道——因为有高氮成分，是很值钱的花圃肥料。所以鸡粪不能白给，它很贵。第二，买的人得自己爬到鸡窝下面去拿。第三，你当场收集来

的东西可以立刻当肥料，但作其他用途都不方便。那是个大杂烩：粪、土、沙、饲料、羽毛和寄生虫。总之，付了一笔不算少的钱，两人在泥粪里弄了半天，太太和我那晚骑车沿着公路带着一公斤的汗水和鸡粪回来。

第二天，我检查那东西，里面有一大堆沙子，但也许能得到一些东西。但同时我有个主意，那时在都灵地下铁展览廊正好在展览蛇。为什么不去看看？蛇是干净的动物，既没毛又没虱子，它们不在泥巴里乱爬，而且一条蟒蛇比鸡大多了。也许，从有百分之九十尿酸的蛇粪中，可以大量而方便地得到纯尿酸。这次是我一个人去，身为夏娃后代的妻不喜欢蛇。

主任和很多工人简直是错愕而不屑地接待我。我的资格是什么？从哪里来的？我是哪号人物，敢上门就要蛇粪？不行，一克都不行。蛇是节俭的动物，它们一个月吃两次，不活动时更少。它们的粪便和黄金一样贵。而且，蛇的主人都和大药厂有永久合同。所以请出去，少浪费我们时间。

我花了一天时间挑鸡粪，又花两天时间试着把粪中的尿酸氧化成阿脉。以前化学家的德行和耐心一定是超人的，或者该说我在有机化学制备上的无能也是超等的。我得到的只有臭气、无聊和一些黑巴巴的液体，什么晶体也得不到（书上说有晶体）。粪便仍是粪便。而，阿脉和它好听的名字仍只是好听。那不是爬出沼泽的法子：我，一本自认写得很好但没人读的书的作者，要从哪条路爬出去？最好回头搞我的无色彩但安全的无机化学。

Tin 锡

这氯化亚锡是活泼的还原剂，
抓到机会就想丢掉它身上的两个电子。
有时有灾难性的效果，
只要滴两滴这玩意的浓缩液到裤管上，
裤子就穿孔了。

没钱真可怜，我边想边拿着一块锡在瓦斯焰上烧着。锡慢慢熔化，滴到水盆里去，在盆底纠结成奇形怪状。

有些金属友善，有些金属凶恶。锡是朋友——不只是因为好几个月以来，爱密罗和我靠它吃饭，把它变成氯化亚锡，卖给做镜子的。还有更深奥的原因：因为它和铁结亲，变成温和的锡器，使铁失掉暴烈的性格；因为腓尼基人曾从事此金属的交易，直到今天它仍在遥远如梦中的好国度（也就是马六甲海峡快乐的苏门答腊群岛）被提炼、加工，再运送过来；因为它可和铜形成青铜合金——可敬的金属，非常耐久；还有因为它像有机化学物容易在低温熔化——几乎像我们一样；最后还因为教科书代代相传的两个名词——哭锡和锡病，虽然人眼从没见过。

先得磨碎锡，这样它和盐酸反应比较容易。这是你自找的。你本来安稳地在湖边工厂的羽翼下活着，虽是被剥削，但总有巨翼保护。好，你翅膀硬了，决定自己飞了，你自找的。好啦，飞吧，你要自由就自由吧，你要做个化学家就做吧。你懂得饥饿的滋味，如果不想饿肚子，那么就在那些毒药、口红、鸡粪里掘吧。磨碎锡，倒盐酸，浓缩，过滤，结晶，还有买锡，卖氯化亚锡。

爱密罗在他爸妈的公寓里隔出个实验室，他的双亲是虔诚、鲁莽而坚忍的老人。当然，当卧房让他占据时，他们全没想到后果，但事情已回不了头。现在，走廊上堆满浓硫酸，厨房炉子（煮饭时间除外）用来

浓缩六升烧瓶的氯化亚锡。整间公寓充斥着我们将制造出来的臭气烟雾。

爱密罗的老爸是个庄严高贵的老好人，有着白色八字胡和洪亮的声音，一辈子干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冒险行业。七十岁了，他还很喜欢从事各种尝试。那时他独占市立屠宰场的牛血生意。白天，他耗在一个肮脏的地窖中，墙上的干血呈褐色，地上是腐烂的污物，巨如兔子的老鼠跑来跑去，甚至连他的账本和发票都沾着血。血用来做血香肠、黏胶、油炸饼、油漆和亮光膏。他只读从开罗订购的报纸、杂志。在那儿他住了多年，生了三个儿子，用枪保卫过暴徒攻击的意大利领事馆。他始终思念那个地方。每天他骑车去巴拉佐市场买药草、高粱粉、花生油和地瓜。用这些材料和牛血，他每天发明他的新菜。他大肆吹嘘，还要我们尝。有一天，他带回一只老鼠，切掉头和脚，骗老婆说是天竺鼠，叫她烤。他脚踏车车链没挡泥板，背也硬，所以早上他就在裤脚上用夹子夹住，整天都不拿下来。他和老婆——可爱而处变不惊的爱斯特女士——接纳了我们在她家里设置的实验室，仿佛厨房放着烈酸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我们用电梯把酸搬到四楼，爱密罗老爹看来如此气派庄严，没有房客敢啰唆。

我们的实验室像个旧货摊，除了东西泛滥到走廊、浴室、厨房外，实验室还包括一间单人房和阳台。阳台上散放着爱密罗买来的 DKW 摩托车零件。他说，哪天要把那部车拼装回去；它深红色的油箱放在栏杆上，引擎被我们的盐酸气腐蚀着。我来之前，还有几桶阿摩尼亚气^①，以前爱密罗曾把阿摩尼亚气溶进自来水来卖，把邻居臭死。到处都是破烂货，旧得几乎不能辨认。只有仔细分辨，才能看出是家用品还是职业用物品。

房间中央有个大的木制抽气柜。盐酸气并不真有毒性，几米外就明

① 即氨气。

明白白地刺鼻，防身不难。只要吸它一口，鼻子就可喷出两口白烟，像爱森斯坦电影里的马，同时牙齿感到像咬到柠檬，酸得不得了，这臭味绝对错不了，一般人早逃之夭夭了。虽然有抽气通风柜，酸雾仍穿堂而过，壁纸变色，门把也锈了。三不五时，墙上钉子折断，一幅画就轰然掉下。爱密罗就再把它钉回去。

我们就这样把锡溶在盐酸，再浓缩、冷却结晶成氯化亚锡。它是小片、漂亮、无色透明的晶体。因为结晶很慢，要用很多容器，而盐酸腐蚀所有金属，容器一定得是玻璃或陶瓷。有时需求量很大，就得动用所有备用容器。他家派上场的可就多了：汤盆、珐琅压力锅、艺术烛台和尿壶。

第二天早上，收产品时就得小心，手别碰到产品，不然你一整天都臭气冲天。氯化亚锡盐本身无味，但和皮肤起反应，也许会还原蛋白质中的双硫键，留下的金属臭味，有好几天可以一直向人宣告你是个化学家。它冲鼻而微妙，像个打球不认输的家伙一直嘀咕着，只有等它自然风干消失。如你稍微热它一下——用吹风机或热水炉，它就失去结晶水，变成不透明的白粉，而那些笨客人就不要了。其实少了水分多了锡，价值更高。但顾客永远是对的，尤其是不懂化学的顾客。做镜子的就是这些人。

锡的宽容本性在它的氯化物内全不存在（顺便一提，氯化物多半是废物，会吸水，只有桌上的食盐氯化钠除外）。这氯化亚锡是活泼的还原剂，抓到机会就想丢掉它身上的两个电子。有时有灾难性的效果，只要滴两滴这玩意的浓缩液到裤管上，裤子就穿孔了。这时刚终战，家里没钱，我穷得只有一条裤子……

要不是爱密罗老是鼓吹自由职业的好处，我绝不会离开湖边工厂，会留在那儿一辈子解决油漆的问题。离职时带着荒谬的自信，还给上司同事分发了一封四行诗写成的愉快宣言。我相当了解我所冒的险，但也

知道人越老，冒险的资格就越少。想冒险的人得趁早。但另一方面，也得及早了解错了就是错了。我们每月底结账，我逐渐看清了人不能靠氯化亚锡活，至少我不能。我刚结婚，家里没祖产。

我们并没立刻投降。那整个月我们绞尽脑汁，把丁香酚变成香草油来过活。没有成功。我们又像奴隶般制造了几百公斤的丙酮酸。那以后，我竖起白旗。得再找个工作，即使爬回去做油漆。

爱密罗像个男子汉，虽然悲伤，却接受我的脱逃。对他而言，可不一样。他骨血里有乃父之风，海盗之种，贸易商之气，永远追寻新奇。他不怕犯错、改行、迁地、变换生活，也不怕变穷、变身份地位，更不怕骑三轮车到处去送货。他接受了，第二天心中就有了新的点子，要跟比我更有经验的人打交道。我们立刻着手拆实验室。他甚至不是那么伤心，我却像只对月悲号哭泣的狗。我们在他双亲帮助（或者说是帮倒忙）下，开始了悲情的拆卸工作。家中好多年找不到的东西出现了，还有埋在某处的一些稀奇玩意：点三八机枪的卡匣（爱密罗打游击时候用的），《可兰经》，一只很长的瓷烟斗，一把镶银把儿的剑，一大堆发黄的纸张。最后还冒出一个奇物——我赶快收了起来。那是一张一七八五年安孔那区宗教法庭庭长F. 汤·罗伦佐·麦特西所发布的命令，语意模糊，针对身家不白之人：“命令，禁止，严令，任何犹太人不得向基督徒学习任何技艺，尤其不可学跳舞。”我们把最痛苦的拆除抽气柜的事留到第二天。

虽然爱密罗以为没问题，但我们很快就明白努力得不够。我们辛辛苦苦地找来几个木匠，叫他们想办法把抽气柜整个完整地从基座抬起。这么说吧，这柜子是这行的象征，是个艺术品，应完整地保留在后院，以备他日之用。

我们搭了个鹰架，架起绞轮滑车。爱密罗和我站在后院观看葬礼。柜子从窗子庄重地送出，麦森那街的灰色天空衬托出它清晰的轮廓。它

被绑上链子，链子呻吟一下，断了。柜子从四楼轰然而下掉到我们脚边，摔成一堆碎木与玻璃，我们企业的意志和勇气也跟着碎了。

出于自卫本能，我们向后跳开。爱密罗说：“我还以为声音会更响亮一点。”

Uranium

铀

我羡慕波尼诺无限发明的自由，
他已突破障碍，
可自在地打造自己喜欢的过去，
为自己缝制英雄的衣服，
像超人般翱翔于时空之间。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客户服务（CS [Customers' Service]）部门的工作。这工作微妙复杂，和外交官差不多。若要成功，一定要对客户灌输信心，所以自己一定要有信心，对产品要有信心。这是个有益的工作，会认识自己、培养性格。这可能是化学工厂里最卫生的专长，训练你说话和应变能力，况且你可以到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旅行，认识很多人。我必须提到它的另一个好处：你假装喜欢并尊敬别人，从事这行几年后，你就真的喜欢并尊敬别人了。就像有人长期装疯真的就疯了。

在大多数状况下，你得先争到居高点，但要很安静优雅地争，不要吓到客户，不要倚老卖老。他要觉得你高明——只高一点——但可以沟通。绝对不要和非化学家谈化学，这是本行的入门守则。但反面的危险更严重：客户爬到你头上。这很容易发生，因为是在他地盘上玩；也就是说，他用你的产品，所以像妻子对丈夫一样了解优点和缺点，而你通常只有不痛不痒、乐观的、来自实验室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你以一个施惠者的身份告诉他，你的产品解决他早就有（也许忽视了）的需求，到年底结算，你的产品要比竞争者便宜，而你知道对手的东西起初是不错，可是，我不想多说了。你也可以用许多方式帮助他（这里可显示你 CS 的功力），譬如解决一个和你本身无关的技术问题，介绍他人，请他上餐馆，带他逛街买礼物送女友或妻子，或帮他临时买当地球赛的门票（对，我们也干这种事）。我在博洛尼亚的同行还收集黄色笑话，在出发推销前努力复习一番。他记忆力不好，所以弄个记事本，记下和

谁讲了什么笑话，因为重复笑话是严重的错误。

所有这些都是从经验学来的，但有人天生就是技术推销员，像雅典娜就是天生的CS。我不是这样，这点我很难过也很清楚。当我必须做CS时，不管是在公司或出差，我总迟疑、推脱，做得没有生气。更糟的是，对无礼、无耐心的客户我就无礼、无耐心。对温和而心软的供货商（此时他是CS），我就温和而心软。总之，我不是做CS的料，恐怕现在要成为一个CS也太晚了。

塔巴索对我说：“去×××找波尼诺，他是那部门的主管。他人不错，知道我们的产品，一切都很好，他不是天才，我们有三个月没去看他了。你不会有技术性问题。如果他开始谈价钱，你就告诉他你会回来报告，那不是你的事……”

我出门去了，他们要我填表格，给我一个名牌别在翻领上，表明我是外客，以免被警卫赶走。他们让我在接待室等，不到五分钟波尼诺出现，带我进办公室。这是好预兆：有人为了贬抑别人，抬高自己身价，会故意让CS坐等半小时。和动物园里的猩猩用的伎俩差不多。但CS的策略技巧有个更好的比拟：异性追求。两者都是一对一的关系，三人间的追逐是不行的。开始时，都有一番舞蹈动作，而只有卖者严格遵守传统礼节，此时，买者才接受卖者，加入舞蹈，如互相满意就结成连理，也就是购买。单方的暴力很少见到，若有也颇像性暴力。

波尼诺矮胖，不修边幅，笑不露齿。我介绍自己，然后开始求偶舞蹈，但他立刻说：“啊，你就是那写书的人。”我必须承认我的弱点，这不寻常的开场白虽对公司没有用，但它并没有让我不高兴。事实上，此时谈话可能离题，浪费公司的时间。

“那真是本好小说，”他继续说，“我度假时读的，我也要太太读，但小孩不行，可能吓着他们。”这种意见通常让我懊恼，但当角色是CS

时，不能太挑剔。我文雅地谢了他，并试着把话题拉回到访问的目的：我们的洋漆。波尼诺继续抵抗。

“你看我，我也差一点和你下场一样，在厄尔巴珊诺大街，他们已把我关在军营院里。突然，我看到他进去——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后来，当没人看到我，我便爬上五米高墙，跳到另一边逃走。然后，我到苏萨去参加巴多里奥部队^①。”

我从没听过一个巴多里奥党羽叫他巴多里奥，我准备好，深吸一口气，打算长期抗战。显然波尼诺的故事不会短。但我记得不知有多少次，我自己也把故事强加到别人头上，不管别人想听还是不想听。我记得《圣经》上（《旧约·申命记》第十章十九节）写着：“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我就舒适地靠到椅背上，准备好好听。

波尼诺不会说故事，他重复，没有目标，离题又离题。此外，他有个坏习惯，省略句子的主词，用代名词取代，故事就更莫名其妙。当他讲时，我张望他的办公室，显然他用了多年，因为看来和他一样乱。窗子脏得可以，墙上都是黑灰，空中一股臭烟草味。墙上有生锈的钉子，有些没用，有些挂了纸。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到用过的刮胡刀、球赛票、医药保险表、明信片。

“……所以他告诉我，我应跟他走，不，事实上走在他前面，他在后面用枪顶着我。然后另一个家伙来了，他的同伴，在街角等他。两人就押我到阿斯提街，你知道我的意思，去找史密特。他会一直不断找我，说招吧招吧，你的朋友都招了，再玩英雄把戏没意思了。”

在波尼诺桌上有个丑陋的比萨斜塔复制品，还有个贝壳做的烟灰

① 1943年9月，墨索里尼垮台后，巴多里奥将军（Pietro Badoglio）支持国王所成立的军队。

缸，装满了香烟屁股和樱桃核，还有个石膏笔筒。这是张不到零点六平方公尺的小得可怜的桌子。没有一个CS不知道这悲哀的“办公桌学”，也许不是有意识，而是属反射思考。一张小桌子宣告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桌主。至于那上任已十天的办事员，若还没弄到张桌子，他就完蛋了：他就像没壳的螃蟹，活不了多久。另一方面说，我知道有人退休时要丢一张七八平方公尺的大桌子，显然过分大，但充分表现他的权力。桌上放什么并不重要。有人以乱七八糟堆满东西的杂乱桌面表现其权威，也有人巧妙地以空白干净表现其阶位——据说，墨索里尼就是这样。

“但这些人不知道我腰里有把手枪。当他们开始对我用刑时，我掏出枪，令他们都面对墙站着。我逃走，但他……”

他，谁？我很困惑，故事越来越纠缠不清。时间流逝，虽然说顾客永远是对的，但出卖自己的灵魂总有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自己就是在当笨蛋。

“……跑得越远越好，半小时后，我到了里弗里区。我沿着路走，我看到田里降落了一架德国飞机，斯图卡^①机，那种可以用五十公尺跑道降落的飞机。两个人出来，很有礼貌地问我去瑞士要怎么去。我刚好知道这区域，马上回答：一直往前，先到米兰再左转。他们说‘谢谢’，回到机上。然后其中一人另有想法，在座位下摸索了一会儿，然后出来朝我走来，手上拿着个像石头的东西。他拿给我说：‘这是谢你的，好好照顾，这是铀^②。’你知道，那时已是战争尾声，他们也知道要输了，他们没时间做炸弹，不再需要铀。他们只想保命，逃到瑞士。”

我控制脸部肌肉的能力也有极限。波尼诺一定注意到我脸上怀疑的

① 一种俯冲轰炸机。

② 铀是制原子弹的原料。

表情，因为他略带恼怒地停下，问我：“你不相信我？”

“当然相信，”我勇敢地回答，“但真的是铀？”

“绝对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它奇重无比，你碰它时是热的。我还放在家里，藏在后院，免得小孩碰它。偶尔我给朋友看看，它现在还是热的。”他迟疑了一下，又说，“你知道我有什么打算？明天我要寄给你一小块让你相信。既然你是个作家，也许有天你可以写这个。”

我谢谢他，负责地唱了我的戏，解释我们的新产品，拿到一份大订单，说声再见，以为案子已经了结。但第二天，在我那一点二平方米的桌上，有一个寄给我的小包裹。我带着好奇打开它，里面有一小块金属，约半包香烟大，很重，看来奇特。表面是银白的，带点黄色。不觉得热，但它也不是我熟悉的金属——铜、锌或铝。也许是个合金？也许真的是铀？我们从没见过铀，书上说它是银白色，这么一小块不会永久发热。也许像房子那么大一块才热得起来。

我一找到适当的时间，立刻冲进实验室里，对一个CS来说，这很不寻常，还有点不应该。实验室是年轻人的地方。回到那里觉得在变年轻，同样又渴望冒险和发现，那是新鲜的十七岁的感觉。当然，十七岁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长久做个“准化学家”，让你僵化、屈辱，忘了仪器、药品放哪里，除了基本化学反应，都忘了。但也因此，实验室是个快乐、新奇的源泉，怀着各种可能性，属于未来的地方。

但宝刀仍然未老，我还记得一些化学家的老招式：用指甲刮、刀削、闻它、掐它，试试看是否能刮玻璃？看是否反光？在手上称称看。没有天平很难估计比重，不过铀的比重是十九，比铅重很多，是铜的两倍。那纳粹飞行员给波尼诺的礼物不可能是铀。我开始想象苏萨出现幽浮的传说，想象飞碟，中世纪的彗星使者等等。

但这既然不是铀，是什么？我用锯子锯下一块，放在本生灯的火焰里。不平常的事发生了，一条褐色火焰升起，盘成螺旋状。长期因停

滞而萎缩的分析化学家反应这时苏醒了，一种怀旧的心情升起。我找到一个陶杯，加满水，把它拿在冒烟的火焰上，杯底我看到熟悉的褐色沉积物。加一滴硝酸银到沉积物上形成蓝黑色，使我确定这金属是镉（Cadmium），希腊神话中斩龙的卡得木（Cadmus）之子孙。

波尼诺在哪里找到镉不重要，也许是在他们的电镀部门。比较有意思但令人搞不懂的是他的故事从哪里来：显然是他创造的，因后来别人告诉我，他和别人说这故事很多次，从没有任何证明，细节则越来越荒诞无稽。显然没法追根究底，但我仍在 CS 网络中为社会服务打滚，应付公司的各种问题。我羡慕他无限发明的自由，他已突破障碍，可自在地打造自己喜欢的过去，为自己缝制英雄的衣服，然后像超人般翱翔于时空之间。

Silver

银

一个人生下来就脸色明朗，
眼光笃定，值得信赖，
一辈子就如此。
生下时别扭，一辈子别扭。

通常，看到油印传单就会丢到垃圾桶，也不读它。但这次我马上就注意到，这是张庆祝大学毕业二十五年同学会的邀请函。函上用语使我陷入回忆。它用较亲密的“你”而不是“您”，遣词用字都是学生惯用的，仿佛二十五年前的日子就在眼前。带点滑稽味的信尾是：“……在重温旧梦气氛下，我们将庆祝我们跟化学的银婚，互相叙述化学事件。”什么化学事件？五十岁动脉里的胆固醇？我们细胞膜的平衡^①？

谁发起的？心中闪过我尚存着的二三十个同学。我不是指还活在世间，而是指还留在化学岗位上的。第一，先把所有女生划掉，她们都成了“退伍”的家庭主妇，没有“化学事件”好说。把那些升官做爵的、被提拔的或不被提拔的人划掉，他们不喜欢比较。划掉那些受挫的，他们也不喜欢比较。失败的人也许会来同学会，他是来求救或博取同情的，不大可能是发起人。从剩下的人当中，我想到席拉多，老实、拙朴、热心的席拉多。生命回报他不多，他也没贡献多少。战后，我偶尔碰到他，他是个安分的人，不是失败的人；失败的人是个出发然后倒掉的人，他立下目标，没达到，因而痛苦。席拉多从没立什么，没达到什么，一直安分地留在避风港，而且想必他仍紧守着做学生时的“黄金”年代，因为他其他的时光是铅。

对那顿饭，我有两种反应，都不是中性的，同时带着吸引和排斥，

^① 化学用语，指细胞死亡。

像靠近磁铁的指针，要去又不要去。但仔细想想，两种动机都不高贵。想要去是因为比别人活得更自在，经济上更自立，较没磨损，这些都会自鸣得意。不想去，是因不想和他们同年龄，即自己的年龄，不想看到皱纹、白发。不想去算有几个人，缺几个人，或计算本身。

但席拉多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学生时代，他很认真，不自怜自溺，学习时缺乏激励和兴趣（他好像不知何谓乐趣），逐章啃书，就像矿工挖洞。他没被法西斯污染，没被种族法这个反应剂侵蚀。他是个愚钝但值得信赖的人。经验教导我们，这是那种不会随时光消失的德性。一个人生下来就脸色明朗，眼光笃定，值得信赖，一辈子就如此。生下时别扭，一辈子别扭。六岁骗人，十六岁、六十岁都这样。这现象准确惊人，所以为什么虽然出于习惯、无聊、乏味，有些友谊和婚姻仍维持了一辈子。我有兴趣找席拉多印证一下。我付了钱，告诉那匿名委员会我要参加。

他的样子没怎么变，个子高大，肤色橄榄，头发仍密，脸刮得很干净，额、鼻、颌都有棱角，像新铸的。走路仍然唐突莽撞，是当年实验室中有名的玻璃毁灭者。

照惯例，头几分钟是互道近况。我知道他结了婚，没孩子，不想谈这些，也知道他一直在搞摄影化学，十年意大利，四年德国，又回意大利。是的，他是发起人，起草那邀请函。他毫不害羞地承认，他学生时代是彩色片，后来全是黑白片。至于“事件”（我没指出其用词之笨拙），他显然爱谈。他工作里事件不少，虽然都是黑白的。我的也如此吗？当然，不管是化学的或不是，但近年来以化学的为主。它们让你有无力感，不长进的感觉，不是吗？觉得是在和一个迟钝、缓慢，但在数量和体积上都吓人的敌人做永无休止的战争，年复一年，一个接一个。只在敌人偶尔有空当时，你才能狠狠一击获得短暂胜利，得到一点

安慰。

席拉多也知道这无止境的战争，也感觉到学之不足，只有靠运气、直觉、策略及耐心来补足。我告诉他我正在收集“事件”，我的或别人的，写进书里，看看能否让世人了解我们这行的痛苦滋味，也是生活滋味的反映。我告诉他世人清楚医生、妓女、水手、杀手、古罗马人、阴谋者和波利尼西亚人怎么活，但全不知我们这些物质转换者的生活，这看来不公平，但我告诉他，我要故意忽略那些大化学家，巨大工厂的化学及其量产，因为那是集体产物，因而是无名的。我有兴趣的是个体户化学的故事，无装甲步兵的化学，我个人的化学。但这也是开山先贤的化学，他们在茫然的环境中独立工作，通常没有利益，也没有工具，只靠自己的手、脑、理性和想象。

我问他是否愿为此书提供材料。如愿意，他可和我说个故事，我们这行的故事；如果我可以做点建议的话——故事里，你在黑暗中摸爬几星期、几个月，都快要放弃了，最后在混沌里看到一丝光线，循着光线往前摸索，你终于找到最后的光明。席拉多认真地说有时事情就是那样，他会努力寻找，但通常是一路黑到底。你看不到任何光线，头一直撞到越来越低的顶，最后用爬的从隧道退出来，比进去时老了些。他还在回忆时，目光盯着天花板，我看了看他，他老得还不错，没太多的扭曲，反而看来更成熟。他仍然壮实，不会笑和作怪，但现在这已不让人讨厌了，这在五十岁时比在二十岁时较能让人接受。他告诉我一个关于银的故事。

“我告诉你大纲，你可以添油加醋——例如，一个意大利人在德国怎么过，反正你也去过。我主管一个做 X 光底片的部门。你知道那玩意儿吗？没关系。那玩意儿不敏感，不会为你带来麻烦（敏感与麻烦成正比），所以那部门蛮安静的。你知道，给业余大众用的底片如果出了毛

病，十次有九次顾客以为自己有错，或者他最多寄封信骂你，但因地址错误，你也看不到。但是如果X光底片有毛病，在经过钽处理后，第二次又出毛病，麻烦就一直往上爬，越爬越大，最后砸到你头上来。我的前任以他典型的德国人教训人的天分向我解释，为的是要合理化整个工作过程，在我看来极度洁净狂热的仪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打断他：细微的小心，狂热的清洁，八个零的纯度，是那种让我头疼的东西。我很清楚有时它是必要的，但我也知道通常是癫狂战胜常识，五个有意义的禁令，总伴随着十个无聊的规定。通常由于懒惰、迷信或害怕复杂，没人敢去改它。军队的规定则有更强的压制性。席拉多为我倒杯酒，他的大手迟疑地移向瓶颈，好像瓶子会躲，倒酒时碰撞杯子好多次。他同意事情常常如此。譬如，他的部门不准女人用散粉，但有次一个女孩的散粉盒从口袋掉到地上，一大堆粉飞起来，那天产品就被特别仔细检验过，都很好。但散粉的禁令仍在。

“但我得告诉你一个细节，不然你会不懂这故事。有些事情是必须一丝不苟的（这是合理的，我告诉你）。本部门总是有空调，打进来的空气都需过滤。身上要套上全身的工作衣，头上要戴帽子。衣帽每天都要仔细洗，把线头和发丝除掉。进门要脱鞋换无尘的拖鞋。

“五六年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偶尔有医院来抱怨一两次，但总是因为产品过期。你是知道的，麻烦不会像匈奴人大张旗鼓地来，它总像瘟疫安静地降临。起初是从一家维也纳检验中心来的一封挂号信，写得很有礼貌。不是告发而像警告，随信附上X光底片，感光 and 颗粒都好，但上面有许多豆般大的白点。我们写了一封道歉信，十分对不起等等。但第一个 Landsknecht^① 死于瘟疫后，最好不要再心存幻念。瘟疫就是

① 指意大利作家曼佐尼（Manzoni，1785—1873）的历史小说中死于瘟疫的德国士兵。

瘟疫，不应再玩鸵鸟游戏。下周，又来了两封信，一封来自列日，提到赔偿；另一封从苏联来，我不记得那机关复杂的名字，翻译出来后，令每个人都毛发直竖。问题当然都一样，白点都像豆子，信写得非常非常凶。它提到三次开刀延期，损失的医疗费，成吨有问题的感光纸，专家检查，天知道何处的法庭论战等等。他们要我们立刻派专家去。

“这时至少要亡羊补牢，虽然不一定都能成功。已知这些纸都通过了出货检验，所以问题是在我们库房或路上，或是到他们库房里才发生的。经理把我叫进去，很有礼貌地讨论了两小时，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慢慢地、有条不紊地生剥我的皮，而且剥得蛮有快感。

“我们接受实验室的检验结果，检查仓库里所有的感光纸。最近两个月的还没问题。其他的有几百批，约六分之一有毛病。我一个笨笨的助理发现每五批好的就有一批坏的，很规则。我追究到底，发现几乎所有有瑕疵的感光纸都是星期三出品。

“你也知道老毛病最难对付。在找原因时，我们同时还得生产。你怎么能确定毛病是不是还在继续？我们是不是在制造未来的灾难？当然，你可以把它们留在仓库两个月再检查。但你怎么和全世界的仓库说他们两个月收不到货？还有利息的问题，还有信誉的问题。还有个困难，任何你在原料或技术上做的修改，都要等两个月才知道效果。

“自然，我觉得很无辜，我已遵守所有规定，从不松弛。我上面和下面的人也都觉得自己无辜，那些检查原料的、制备检验溴化银乳液的、包装的，都觉得无辜。我觉得自己无辜，其实不然；照定义，我有罪，因为作为部门主管，我得负责。有损就有罪，有罪就有罪人。这完全像原罪，你什么也没做，但你有罪，而且得罚。不是罚钱，但更糟：你失眠，吃不下，得胃病，简直要发疯。

“抱怨信和电话不断涌进来，我还在解星期三之谜，那一定有意义。星期二晚上的守卫我讨厌，他脸上有道疤，看来像纳粹。这事我不知该

不该向经理提，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总是不大对。然后我调来人事资料，发现那纳粹才来三个月，而纸上的豆子问题已有十个月了。十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

“经严格检查，约十个月以前，增加了一家包底片黑纸的供应商，但瑕疵品是用两种供应商的纸乱包的。十个月以前新用了一群土耳其女工，我一个一个地问她们，把她们吓坏了。我要知道星期二晚或星期三她们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有没有洗澡？用特别化妆品？跳舞去了因而流汗较多？我没敢问星期二晚上是否做爱，反正一点结果也没有。

“显然，此事不久全工厂都知道。每个人都奇怪地看着我。我是唯一的意大利人主管，可以想象背后的闲言闲语。决定性的助力来自一个守卫，他因曾在意大利打仗，被游击队俘虏，会说点意大利话。他没有记恨，爱讲话，每样事都乱扯，没有结论。也就是他那胡言乱语带来线索。有天，他告诉我他爱钓鱼，但差不多有一年在附近小河里钓不到鱼——自从上游六公里处开了家皮革厂。然后他说在有些日子，河水变成褐色。那时我没注意到这点，但几天后从宿舍窗口看到卡车载洗好的工作服进厂时，我想到了。我询问了一下，知道皮革厂于十个月前开张，事实上工作服就是用那钓不到鱼的河水洗的。但他们用的水是过滤和离子交换处理过的。工作服是白天洗的，晚上烘干，第二天工厂开工前送回。

“我就去皮革厂。我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哪天，在哪里放水。他们把我轰走，但两天后我和卫生局的医生再一起回来。他们每星期把大缸的鞣皮水倒掉一次，在星期一晚上。他们拒绝说大缸里的内容，但我们都知道有机鞣成分是聚酚，没有任何离子交换树脂可以把它留下，就连不在此领域的你都知道聚酚会对溴化银有多少灾害。我弄到一些鞣液，回去稀释一万倍，喷在洗X光纸的暗房里，几天后看到纸的敏感度全消失了。经理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他说从没见过如此强的抑制

剂。我们逐步稀释，用一百万倍的稀释液，我们在两个月以后可得到豆形的白点。我们复制了豆子效应，结果真相大白：显然有几千个聚酚分子在洗衣时吸附到工作服的纤维里，然后落到底片上，那就足够产生斑点。”

附近其他的客人都在大声谈小孩、假期、薪水。我们最后来到吧台，逐渐有醉意，互允重建本就不存在的友谊。我们要保持联络，并互道类似这样的故事，呆头呆脑的物质变成狡猾的魔鬼，破坏人所最珍贵的秩序，像鲁莽的流氓，破坏他人的兴趣多于自己获得胜利，像小说里地球末日反击英雄的成就。

Vanadium

钒

怎么办？这米勒角色跳出来了，
从他的茧蛹冒出来，轮廓清晰。
既非无耻亦非英雄，
除掉那些辞藻和诚意或不诚意的谎言，
剩下的是个典型的灰色人，
盲人中的半盲人。

按定义，油漆就不该是种稳定的物质。事实上，在它旅途中的某一点，是要从液体变成固体的。但这一定要在恰当的时地发生。如不然，会有极不愉快的后果……油漆可能在仓库时硬化（我们残忍地称为“中毒”），那就得丢掉。或在十几二十吨的反应槽中，树脂硬化，那是悲剧。或者油漆从来不干，那你就成了笑柄，不干的油漆像不能发弹的枪，不能下种的公牛。

通常，空气中的氧在硬化过程中担任一定角色。氧可救命也可破坏，但我们制漆业对氧最有兴趣的一点，是它可以和某种油的小分子产生反应，将它们联系起来，变成坚实的固体。譬如，亚麻子油就是这样风干变硬的。

我们有了麻烦。我们进口了一些做油漆的树脂，它暴露在室温的空气下应会变硬。我们试验了，它也灵验。但当把它和一种（无可取代的）油烟混合以后，它就是不硬。我们这样做了几吨黑漆，漆上以后，就一直黏得像苍蝇纸。

遇上这种状况，你一定得小心，不能先去乱告。供货厂是 W，一个德国大公司，声誉卓著。它是盟军在大战后将原来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①拆分出来的一部分。这些人通常会在认错前凭着他们的名望来唬

① 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二战后被盟军勒令解散，拆分为拜耳等十家公司。

你、磨你。但这回麻烦是免不了的，其他的树脂和同样的油烟混合都没事，那出事的树脂是 W 公司的特产，而我们又得照合约供应这种黑漆，不得延误。

我写了封客气的抗议信，说明问题。几天后，回信来了：冗长而卖弄，说了一些我们已试过而无效的方法，还有一段树脂氧化的废话，却忽略我们当下的要求，只简单地针对关键问题说正在进行相关试验。我们没别的法子，只有立刻再订一批货，要 W 仔细注意它与油烟混合的性质。

确认订货的同时，来了另一封一样长的信，由同一个米勒博士署名。它比第一封信认真些，至少（带些保留）承认我们的抱怨有理。它还说出一件以前没说的事，“ganz unerwarteterweise”，即完全出乎意料的，他们实验室的几个老头儿发现这些问题货品中，加了千分之一的萘化钒——直到那时，从没听说油漆行业有用到这种添加剂。那不认识的米勒博士要我们立刻查核这事。如果是真的，他们的看法也许可以使双方避免一次国际商务纠纷。

米勒，我前世中曾有个米勒。但在德国这是个很寻常的名字，像意大利的莫林那里、英国的密勒，都是米勒的对等名字，也很普通。为何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但，重读那两封信，沉重笨拙的用词，夹带着一些术语，像白蚁在我内心中啃着，我不能不怀疑。啊！算了罢，在德国至少有二十万个姓米勒的，别胡思乱想，开始认真解决油漆的问题吧。

……然后，突然眼里升起信上的一个细节，那不是打字上的错误，它重现了两次。写萘时，他把“naphthenate”拼成“naptenate”。在我那病态的精准记忆深处，那如今已属遥远世界的米勒，在那难忘、冰冷、恐怖的实验室中总把“beta-Naphthylamin”说成“beta-Naptylamin”。

苏联人就近在眼前了，盟军一天轰炸橡胶工厂两三次。没水、没

电、没热气。窗上没一片完整的玻璃。但命令是生产人造橡胶，而德国人唯命是从。

就像被有钱的罗马人使唤的有教养的希腊奴隶，我和另外两个熟练助手在实验室中工作，从事徒然而不可能的工作。每次警报一响，我们就忙着拆仪器，警报解除，我们又忙着装回去，时间全耗在这些虚功上。但，我说过，他们唯命是从。每隔一段时间，检察官从碎石和积雪中爬过来，确认我们有按命令工作。有时，是一个铁着脸的纳粹黑衫队员，或是一个当地民兵团的老兵过来，或是一个平民。最常来的那个平民叫米勒博士。

他一定是个有权位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先向他敬礼。个子高胖，四十岁左右，外表略显粗犷。他只和我说过三次话，每次都露出不寻常的怯懦模样，好像因什么事情感到羞耻。第一次只是和工作有关（就是关于“Naptylamin”的剂量）。第二次他问我为什么留这么长的胡子，我答道我们都没有剃须刀，连手帕也没有，每星期一有人来帮我们刮胡子。第三次，他给我一张打字工整的条子，特准我星期四也刮胡子，同时供应处发放一双皮鞋。他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怎么看来那么不安？”那时，以德文思考的我，告诉自己“Der Mann hat keine Ahnung”（这家伙被蒙在鼓里）。

工作要紧。我赶快设法从熟悉的供货商那里弄来一些萘化钒。这可不简单：它不是常用的产品，只按订单少量生产。我连忙下了订单。

这个“阴魂”的重返颇让我激动。自从离开集中营，我最强烈的欲望是有一天面对面地和其中一个“他们”算账。我收到一些德国读者的来函，但这些我不认识、也许也不该负责的人（心理上的责任除外），所宣称的罪恶感实在不能满足我。我所期望甚至梦想着（用德文）重逢的人，是在那里迫害我们、从不直视我们双眼一下（似乎我们没眼睛）

的人。不是要复仇，我不是基督山伯爵。只是要重建平等关系，说声：“怎么样？”如果这米勒就是我的米勒，他并非完美对手，因为在某一程度上，他会显示一点怜悯，或只是粗略的职业上同理心。或是更少：只是不满那既是同事又是工具（也是个化学家）的奇怪混合体，没礼貌，没半点正常实验室的规矩。但他周围的其他人连这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不是个完美的对手，但我们都知道，完美属于传说，不是我们这些活人的。

我和W公司的代表联络上。我还和他蛮熟的，托他暗中打听这米勒博士。他年纪多大？长得什么样子？战时在哪儿？很快回复就来了，年纪和外貌都吻合。这人先是在施格堡接受橡胶技术训练，然后在奥斯维辛附近的橡胶厂工作。我拿到他的地址，以私人之间的关系写了一封信，并寄了一本我的书《如果这就是人类》，德文版的。信中问他是否真是奥斯维辛的米勒博士，是否记得“实验室中的那三个人”。希望他能原谅我无礼的闯入，从太虚的返回。但我不但是那位为干不了的漆烦恼的客户，也是那三人之一。

我开始等待回音。在公事方面，一切就像缓慢的钟摆，来往着有关德国钒优于意大利钒的官样化学文章。请速以空运寄达五十公斤规格的产物，并扣除费用。在技术事务方面，事情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瑕疵货的出路还没决定，是要打折收下？还是退货？还是寻求仲裁？同时，我们照惯例互相用官司恐吓对方，“*gerichtlich vorzugehen*”（庭上见）。

“私人”的回答还是没来，就像公司方面的争执让我恼怒、不安。我对此人了解多少？一无所知——很可能他早已把那一切有意无意地忘却了。我的信和书对他是一种讨厌的侵犯，无端搅起好不容易平静的一摊水。对正人君子的攻击。他绝不会回信的。可惜，他不是个完美的德国人，但真有完美的德国人？或完美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抽象的，从

普通到特殊的路上，总会有些惊奇的怪事，审问者没声没息地出现，然后突然变成同路人、同伙，奇奇怪怪无道理的事都可能发生。到现在几乎两个月了，回信还不来。算了吧。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信终于到了，写在漂亮哥特体笺头的纸上。是封简短客套的试探信。是的，他就是橡胶厂的米勒。他读了我的书，感慨地认出一些人和地。他很高兴我活了过来，他问及实验室的另两人。到此为止都没啥奇特的，因为我的书里提到了他们。但他也问了书上没提到的戈德鲍姆。他又说，他重读了当时的笔记，愿意将来和我碰面谈谈，“对你我都有益，对克服那可怕的过去是必需的”（“im Sinne der Bewältigung der so furchtbaren Vergangenheit”）。最后，他还说在奥斯维辛他所遇到的囚犯中，对我印象最深。但这可能是奉承，从信的语气，尤其是“克服”那句话来看，似乎这人有求于我。

现在变成我是否要回信了，我感到为难。你看，我已成功地诱捕到对手，他就在面前，几乎是个同行，用和我类似的信纸，他还记得戈德鲍姆。虽然他还是蛮模糊的，但显然他有求于我，像赦免之类的，因他有个需要克服的过去而我则没有。我只要他在瑕疵货上打个折扣。情况有点意思，但不太寻常，有点像被拉到法官面前的无赖汉。

首先，我要用哪国文字回答呢？当然不能用德文，我会犯可笑的错误，那是绝不能发生的。要在我的地盘打，我以意大利文回信。实验室另外两人已死，我并不知道他们死在哪里，怎么死的。戈德鲍姆在最后撤退行军时，死于饥寒。至于我，他已从我的书和有关的通信知道大概了。

我有好多问题要问：太多了，太沉重了。为什么有奥斯维辛？为什么有潘维兹博士？为什么把小孩送进煤气室？但我觉得还不是时候，不能超出某些限度，我只问他是否接受我书中或明或暗的裁判？是否觉得法本化学工业公司主动使用集中营奴工？在离集中营只有七公里的橡胶

厂，他是否知道奥斯维辛每天吞没万条生命的特别设施？最后，既然他提到当时的笔记，是否可给我一份拷贝？

至于那“将来的碰面”，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有点怕。不必说什么害羞、谨慎、恶心那些委婉的言词。“怕”就是正确的字眼，我不觉得自己是基督山伯爵，但也不是什么圣者贺雷修斯^①。我不觉得自己能代表奥斯维辛的死者，也无法把米勒当屠夫代表。我知道自己，我没争辩的本领，对手让我分心，我更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而非这对手。我会认真倾听，冒着相信他的危险。只有在归途上，我才会义愤填膺，加以裁判，但那已没用。所以，最好就只是用写信的方式。

以公司之名，米勒来信通知已寄了五十公斤新货，W公司会有友善的调停等等。几乎同时，我家里来了我所期待的信，但并非真的是我所期望的。那不是一封典范式的信。如果这故事是虚构的，我只能在此提出两种信：一封是卑微的、温暖的、基督徒式的信，是求赎的德国人写来的。另一封是傲慢、无礼、冰冷的信，是顽固的纳粹写来的。但这故事不是虚构的，实情总比虚构来得复杂，没那么干净利落。不止有一个层次。

信有八页厚，还有张吓我一跳的相片。就是那张脸，老了一些，照得不错。我几乎听到高高在上的他，发出那难忘的一句话：“你怎么看来那么不安？”

是篇笨拙的作文，矫饰的、打了折扣的诚恳，充满枝节及不着边际的赞美，冗长而啰唆。没法用句简单的话下判语。

他不加区分地把奥斯维辛归罪于人类的邪恶天性。他谴责在那里发展的那些事件，而在我书中的人物身上找到安慰——“使暗夜凶器变钝”的阿拔图、罗伦佐。那句是我书中的，但他的引用让我感到不快与伪善。他谈他的故事，先是“跟随着初期希特勒政权的大众热情”，加

① 罗马传说中的英雄。

入了国社党学生联盟，后来被合并到纳粹特勤队。他想办法退出了，说“这也还办得到”。当战争来临，他被动员到防空部队，直到那时看到被毁的城市，才感到战争的“可耻与义愤”。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化学家的身份被认可（就像我），而被分配到法本化学工业公司位于施格堡的工厂。奥斯维辛附近的工厂就是这同型工厂的放大版。在施格堡，他训练了一批乌克兰女孩做实验室工作。事实上，我在奥斯维辛看过那些女孩，那时还搞不懂女孩们为什么和他那么亲近。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这个人才和那些女孩一起调到奥斯维辛。那时，奥斯维辛对他及他的朋友而言，没什么特别意义。到达时，他的技术主管简单地介绍了该地（应是浮士德工程师），警告他“橡胶厂的犹太人只能给最低贱的工作，不能容许任何怜悯”。

他在潘维兹博士手下工作，就是这个人让我经过那独特的“测试”，以确认我的化学能力。米勒讲得很清楚，他对他上司评价很低，并告诉我这人在一九四六年死于脑瘤。是米勒他自己负责建起橡胶实验室。他说一点也不知道那场考试，是他亲手挑了我们三个专家，特别是我。似乎不大可能但也并非全无可能，我的存活因此受惠于他。他说那时他与我的关系几乎是平等的友谊，他会与我谈论科学问题，并同时思考何种“珍贵的人类价值，被其他一些凶残的人毁了”。我不但无法想起任何这种对话（我已说过，我对那时期的记忆奇佳），且以当时败坏、互疑及疲惫的环境，连想象这种对话都完全不可能。只能以事后的一厢情愿来解释。也许这是一个他告诉很多人的故事，但他并不知道世界上只有我不能相信。也许，出于诚意，他为自己炮制出一个说得通的过去。他不记得刮胡子和鞋子的事，但他记得其他类似而可信的小事。他听说我得了猩红热，关心过我的性命，尤其是当他听说俘虏要徒步撤退时。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六日，黑衫队调他到民兵队——正式队刷下来的老弱残兵——去抵挡苏联军队的前进。幸运地，技术主管命令他到后方

去，救了他一命。

对于我的法本化学工业的问题，他简短地答复了。是的，他们使用俘虏，但目的是保护他们。事实上，他提出（荒谬的）意见认为，整个八平方公里的橡胶厂，建起来的目的就是要“保护犹太人，挽救他们的性命”，而不得怜悯的指令是一种伪装。“*Nihil de principe*”（忘掉原则），不可指责法本化学工业，这人还是W公司——即前者后裔——的职员，你不可吐在自己盘子里。在奥斯维辛的短暂时刻，他“从未听说宰犹太人的事”。虽然离奇而气人，但并不例外：那时德国沉默的大多数，一般的对策是别问问题，什么都不知道。他显然也没向任何人要求解释，自己也不寻求理解。虽然在晴天，从工厂看尸体焚化炉的火焰非常清楚。

在战争结束之前，他被美国人俘虏，关在战俘营几天。讽刺的是，他说战俘营“设备简陋，毫无头绪”。就如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写这信时，他仍让我觉得他毫不知情。一九四五年六月末，他回家了。这大致是我所要求的笔记的内容。

在我的书中，他感觉我超越了犹太教而达到基督爱敌人的精神，是对人的信心的见证。最后，他坚持我们一定要在意大利或德国相见，只要我愿意，最好在地中海岸。两天后，从公司管道，W公司来信，其邮戳日期和那封私函是同一天，同样签名，显然不是碰巧。是封求和的信，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接受任何提议。他们暗示好来好去；此事件弄清楚焚化钒的好处，以后都要加在所有树脂中。

怎么办？这米勒角色跳出来了，从他的茧蛹冒出来，轮廓清晰。既非无耻亦非英雄，除掉那些辞藻和诚意或不诚意的谎言，剩下的是个典型的灰色人，盲人中的半盲人。他夸我不该得的荣誉，爱我的敌人。不，虽然他并非严格定义的敌人，我不觉得爱他，不想见他，但感觉一丝敬意，做半盲人还不容易。他并非懦夫、聋子或犬儒，他并不盲从，他只是想安顿过往但弄不合，试着合，就欺骗一点。你能对一个特勤队

员要求什么？和我过去遇到的其他诚实德国人比较，他还算好的，他对纳粹的谴责虽然软弱闪烁，但他不找借口辩护。他想对话，有良心，挣扎着想抚平内心。在他第一封信，他谈到“克服过去”(Bewä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我后来发现这是个惯用语，今日德国的修辞，意指“从纳粹赎回”。但 wält 这字根，同时也出现在“压制”、“暴力”和“强奸”这些字眼里，所以我也相信，翻译成“扭曲过去”和“对过去的暴行”也没离它的深层意义太远。但他求助于陈腔滥调，总比其他一些德国人的愚钝要强。他“克服”的努力是笨拙的，有点可笑、讨厌和可悲，却是正确的。毕竟他为我弄了双鞋子，不是吗？

那第一个空闲的周末，我尽量试着写封诚恳、公正而自重的回信。我打了个草稿，谢谢他收我进实验室。我宣称愿意原谅我的敌人，甚至爱他们，但只有当他们表现忏悔之心，也即当他们不再为敌之时。反之，敌人仍然为敌，仍然存心打击，那一定不能原谅。我们可以试着拯救他，可以（一定要）和他讨论，但我们的责任是判断他，不是原谅他。至于米勒所隐隐企求的判决，我机巧地提到两位德国同事比他更英勇的行为。我承认我们都非生来勇敢。一个世界充满像他那样诚实而不防御的人，可以令人忍受，但这不是真的世界。在真正的世界里，存在着手执武器的人，他们建造奥斯维辛，而那些诚实而不防御的人为他们铺路。所以每一个德国人，每一个人都必须思考奥斯维辛的事。自奥斯维辛之后，不防御是不行的。至于地中海岸，我一字也没提。

当晚，米勒从德国打电话过来。线路状况不大好，这时我的德文也不大好了，不易听懂，他的声音吃力沙哑，语调紧张而激动。他说在六周后的逾越节，他将会来意大利，我们可以碰面吗？冷不防，我说好的。我要他把到达的细节预先通知我，并把那多余的草稿丢开。

八天以后，我接到米勒太太的通知，米勒博士遽然去世，享年六十岁。

Carbon

碳

我们的主角和三个氧原子
及一个钙原子结合成石灰岩形式，
已在地下躺了几亿年。
在之前，它已有很长的宇宙漫游史，
但我们且不管它。
对它，时间不存在，
或只是以温度缓慢变化的形式存在。

现在，读者应该已经明白这不是一本讨论化学的书：我还不那么想——“*ma voix est faible, et même un peu profane*”（我的声音微弱，甚至有点无知）。这也不算是本自传，除了在象征意义上，每本书也许都有点自传性。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历史。

它是一本微观历史，是行业志，记载它的胜利、失败和痛苦。是一个事业快走到终点的人所想讲的故事。走到这个阶段，一个化学家面对周期表，或宏伟的贝尔斯坦数据库^①百科，或 *Landolt* 手册^②，怎能不感伤那过往的成败？他只要去翻翻，便会升起一连串的记忆。有些朋友的命运和溴结上缘，有些则是和丙烯，或是胜肽，或是谷氨酸。所有化学学生面对任何化学巨著时，都应该想到其中一页，也许一行、一个公式或一个字，他不可知的未来就以密语写在那里。只有“事后”，即成功、错误、悔恨、胜利或失败之后，才能明白。每个青春不再的化学家，翻到那要命的一页时，不都爱憎交织？

所以，每一个元素都会对某人有特殊意义，就像年轻时爬过的某座山，去过的某个海滩。也许只有碳是个例外，因它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也就是它不专属，就像亚当不只是部分人类的祖先——除非今日有

① 贝尔斯坦数据库（*Cross Fire Beilstein*），世界上最大的关于有机化学事实的数据库。

② 德国著名科技出版社施普林格于 1883 年出版，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而成的工具书。

人（有何不可？）以毕生之力钻研石墨或金刚石。也就是对这碳，我有个陈年旧账，是在那决定命运的时代欠下的。在我这条命不值一文时，碳这生命元素引发了我第一个文学之梦，我日夜地梦着它。是的，我要说个碳原子的故事。

可以去谈某一个碳原子吗？对化学家而言，确有困难。直到一九七〇年，我们还没有足以往观察或分离单一原子的技术。但对这说故事的人，它是存在的，所以我就说了。

我们的主角和三个氧原子及一个钙原子结合成石灰岩形式，已在地下躺了几亿年。在之前，它已有很长的宇宙漫游史，但我们且不管它。对它，时间不存在，或只是以温度缓慢变化的形式存在，因为故事中的碳原子正好离地表不远。说来也有点可怕，它单调的日子是在永恒的冷热交替中度过，像在天主教的地狱中坐牢。对它，直到目前，用描述的现在式比较恰当，而非叙事的过去式。它处于永恒的现在式，热变化对它动不了什么皮毛。

但就当是这说书人的好运吧，不然故事早就终止了：石灰岩的边缘暴露在外。接着来了个带尖锄的人（向锄子致敬，它仍是千年以来人与元素对话的最佳中介），在某个时刻——就让我们选在一八四〇年——一锄子把它敲下来，送到石灰窑里改变它的命运。它被一直烤到和钙分离。钙仍与大地为伍，其后命运不大光彩，我们就不去谈了。碳原子仍和它之前三个氧伴侣中的两个连接着，从烟囱飘到空中。原来宁静的日子变成风暴。

它随风飘浮，上天下地。曾有只老鹰把它吸入肺中，但没进到血液又被排了出来。它溶入海水三次，又逸散到空中。就这样上上下下，一会儿海上，一会儿云端，在森林、沙漠、冰原之上飘浮了八年。然后，它被俘，进入有机世界。

碳，很特别的元素，它是唯一一个元素，可以和自己结合形成长链子分子而稳定。地球上的生命就是需要这些长链。因此，碳是生命的基本元素。但它进入生命世界要走曲折的路，并不容易，直到近来人们才理出个头绪。要不是碳的这项工作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只要有绿叶就行，每天约需要上亿吨的碳），这碳的生命之舞真的会被看成奇迹。

所以在一八四八年，我们这碳原子带着它两个氧伴侣经过一排葡萄藤。它有幸撞上一片叶子，穿透进去，然后被一束阳光钉住。如果这时我的故事开始模糊起来，并不只是我学问不够：这三方面瞬间的决定性事件——二氧化碳、阳光和叶绿素——还没能弄得很清楚，也许要很久以后才会真相大白。它和其余的那些“有机”化学很不一样。实验室里的有机化学是人为的，是笨重、缓慢而迟钝的工作；但这精巧、细致而灵慧的化学是二三十亿年前，我们的植物朋友发明的。它们并不做实验，不讨论，也不加热。如果眼见为信，那么这尺度只有亿分之一米，时间只有百万分之一秒，而且主角都看不到，如此就很难了解，难以用语言形容。怎么说也难，就让我们试着这样讲下去吧。

我们的碳原子进入叶子，和一些氧、氮原子做了无数次无效的碰撞。它附上一巨大复杂的分子而被活化了，同时那大分子从天上收到一束阳光。刹那间如虫被蛛网捕捉，它和氧同伴分家，和氢及磷结合，最后嵌进一个长短不拘的生命之链。这一切都在常温常压之下迅速、安静、不费力地进行。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学会在实验室中也能这么做，我们将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成为神的化身。

但还不止这样，还有更让我们汗颜的。碳以气体形式存在的二氧化碳，这生命的原料、滋养之库、血肉之最终归宿，它根本不是空气的主要成分，只是一少得可笑的“杂质”，比人们都注意不到的氩还少三十倍。它在空气中只占万分之三。如果意大利是空气，只有墨西哥米拉佐小镇的一万五千居民，才有资格去建构生命。以人类尺度来说，这真

是特技表演、杂耍艺术、目中无人的表演。从这不断更新的空气杂质，孕育出我们，我们的动物、植物，我们四十亿种纷扰的意见，我们千年的历史，我们的战争与耻辱，尊贵与骄傲。在几何尺度上，我们在地球之存在看来小得可怜。如所有人类全部重量的二亿五千万吨，平均散布在所有陆地上，“万物之灵”以肉眼根本看不到，它的厚度大约只有十六万分之一厘米。

现在我们的原子嵌进结构的一部分，它成为另外五个相同碳原子的伙伴，都长得一模一样，只有以小说的虚构方式才得以分辨。它是一种美丽的环状构造，几乎是正六边形，但可溶在水里，或更准确地说在葡萄汁里。溶解是所有要反应物质的特质和责任。如果有人真想知道为何是环状，是六边形，为何可溶在水中，他不必担心。这些问题是我们化学理论可以解释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资料，但在此就离题了。

直说吧，它已成为葡萄糖分子的一部分。一个非鱼非肉亦非鸡的归宿。它只是中途之家：准备与动物世界接触，但还未有资格完成更高层的任务——成为蛋白质结构的一部分。所以，树的汁液缓慢地流着，从叶到梗，从根到杆，然后到将熟的葡萄，接着就进入了制酒业的王国。不过我们在此只要指出它躲开了发酵，而以原来形式跑到酒里，还是葡萄糖。

酒的归宿就是肠，葡萄糖的命运就是氧化。但不是立刻氧化，饮酒者留它在肝里一星期，储存能量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时之需在下星期天他去捉马时来到。六边环再见，血液奔流，几分钟葡萄糖就被带到股际的肌肉现场，在此它被肢解成两个乳酸分子——这是疲乏的预兆：只有在几分钟后，急喘的肺才提供进来足够的氧，将后者安静地氧化。结果，一个新的二氧化碳分子回到大气，而太阳能量经过藤根，由化学能成为机械能，然后散逸成热能，温暖了跑者的血管和空气。“这就是生命”，虽然很少人这样讲。能量从太阳能逐步退化到热能，并借此使原

子嵌入。“能”往下流，直到平衡与死亡，生命转至归宿。

我们的原子又回到了二氧化碳，真对不起！这也是一趟必要的旅途，你可以想象发明其他旅途，但在地球上就是这样子。这次又是风吹着，将它带过亚平宁山脉、亚得里亚海、希腊、爱琴海、塞浦路斯岛，到了黎巴嫩，再重复植物之舞。这次它嵌进了杉树老干，可要待好久一阵子。它重复了前面说的过程变成葡萄糖，嵌进纤维长链的一部分，就像念珠链中的一粒。这不再是身陷石中的百万年大梦，但我们也大可说是百年孤寂，因为杉树长寿。但就让我们说二十年以后（一八六八年），一只树虫对它有兴趣。它在树干和树皮间顽强地挖隧道，边挖边长大，隧道也跟着深入。它吞了它，然后变成蛹。春天到时，一只灰色丑陋的毛毛虫，爬出到炫目的阳光下。我们的原子在虫的千眼之一中，对它的微弱视野做点贡献。虫受孕，下了蛋然后死亡，它的尸体躺在树下，体内汁液干了，但甲壳留了下来，几乎不朽。雪和太阳的来临，都没伤到它。它埋在枯叶、沃土下，变成脱壳，一个“东西”。但原子的“死亡”不像人的，它并不是一去不返。地上到处都是永不休息、看不见的掘墓者——泥中的微生物——不停地工作。瞎了眼的尸体逐渐腐烂，最后终于再度飞翔。

我们让它环球飞三圈直到一九六〇年。虽然人类觉得这时间很长，但我们得说它在空中的时间不长，因为平均来说二氧化碳在空气中停留两百年。每隔两百年，那些不是陷在稳定物质（如石灰岩、煤、钻石或塑胶）中的碳原子经由光合作用的窄门进出生命一次。还有其他的门吗？是的，有人工的合成，对人很珍贵，但到目前为止，这部分量很少，可以忽略。这个门比植物开启的门窄很多。不论是故意或无知，人到目前还没去和植物竞争二氧化碳资源，从中取得现代衣食住行必需的碳原子。因为人们还没这需要，还有很多已呈有机状态的碳（但不知还能有几年？）存量。除动植物界以外，这些存量是在煤矿中，但这也是

遥远过去的光合作用的遗产。碳变为生命体，太阳能变为化学能，都靠光合作用。

我任意编的这个故事可以被证明是真的。我也可以编出千千万万其他真实的故事，它们的转变次序和时间都是真的。原子的数目极为大量，我们总能找到个原子符合任何一个编造的故事。我可以编出千千万万个碳的故事——从花的颜色气味，到微小的海藻，到小虾，到鱼，再回到海水中的二氧化碳，永恒不断地循环，捕食者被捕食，生命不停地轮回。有的留在古文件发黄的纸上而几乎“不朽”，有的到了大画家的画布上，有的成为花粉化石留给后人鉴赏，有的成了人类遗传基因，不停地进行分裂、复制，繁衍子孙。但我只再说一个故事，一个最神秘的故事。我知道生命的无常，语言之无力，所以我以谦卑自抑之情来述说。

它再回到我们之间，进到一杯牛奶，在一长链的分子之中。它被喝到肚子里。既然所有生命体对外来生命结构都存有蛮横的不信任，链索将细细拆解，碎片一一检查，被接受或丢弃。我们关心的这原子通过肠壁进到血液，奔跑，敲开一个神经细胞大门，进门，提供了所需的碳。这细胞是在大脑，我的大脑，正在写这本书的脑子。这原子所属的细胞，所属的脑子，正进行着巨大、不为人知的活动。此刻，这活动错综复杂地发出指令“是”或“不”，让我的手在纸上规则地移动，勾画出涡形符号，一笔一画，上上下下，引导我这只手在纸上圈出这最后的句点。

翻译莱维

牟中原

《元素周期表》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跟了我有六年了，真久！如今终于交稿，即将问世，如释重负。

一九九二年夏，大学联考，我入闸场工作。等考题定稿，校阅完毕后，有七天无事而失去行动自由的时间。当时带了莱维的《元素周期表》英文版作为读物，顺手也就开始翻译，纯为好玩，打发时间，也没想到要出版。多年来，研究工作是越来越忙，越起劲，翻译的事也就断断续续，算是自娱吧！但每次重新开动，整个稿子又重改一次，前后也三易其稿了。直到去年底，让老友林和知道手头上有这本书的八成译稿，他好心帮忙联络出版，这才终于下了决心收拾这没完没了的私密译作。

译完了，该说些什么？实在不多，因我理想中的译者应该只留下译文，不做其他文章来指导读者，提供意见。但这好像不是西洋文学中译的传统。

傅雷虽然说“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伦的序文是件褻渎的行为”，但他通常还是写了“译序”。杨绛译《堂吉珂德》写了二十三页的译者序。韩少功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有十一页的序。意见都不少。

其实译者大约都知道翻译文学本身就是件“讯息转折”的工作，没法完全跨越语言的鸿沟，最多只能说神似罢了。《元素周期表》原著是意大利文，我不懂意文，根据的是 Raymond Rosenthal 的英译本。作为

一个化学家，我知道我可以不读德文原著，而从英文译本完全了解化学专著，因为大家有共通的化学术语及基本原理。但《元素周期表》不是关于化学知识的传述，莱维的语言是文学的、回忆的、沉思的，我终究是没法确定译文和原文的差异，而我很好奇这点。这其实是写这短文的目的，希望有人有兴趣根据意大利文再译一次，到时这译本也就可放一边了。

作者莱维本人其实是相当在意翻译文字的，他在纳粹集中营的回忆录《如果这就是人类》第一次译成德文时，非常紧张。“我害怕我的文字会丧失原色，失掉涵义……看到一个人的思想被扭曲、打折，他挖空心思的用词被误解、转换。”就因此，他的著作的英译本都是非常小心进行的，Rosenthal 成为莱维后来大部分著作的英译者，并因此而得翻译奖。

有意思的是，莱维本人也从事翻译工作，他是卡夫卡《审判》的意大利文版译者。我也很好奇，他的译文能否保留卡夫卡文字特殊的棱角？

看样子，这些翻译“忠实”的问题真是没解，尤其小国家（如捷克）文学的翻译多只能从英文或法文转译，这更没法说了。

但我想翻译真正要做的是居中担负起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沟通工作。我们读《元素周期表》这样的书是向往一种整体文化，在那儿，“科学”和“文学”并不割裂，而语言可以穿透国度。化学家这行业的故事是可以欣赏、了解的。“集中营”的极端残忍，虽无法以文字描述，但我们仍然要反复听残存者的声音。这些文化的整体感是可以透过翻译传达的。

《元素周期表》一书不止是莱维的自传、他这行业的记录，更是他那一代的故事。透过化学元素的隐喻、科学式的文笔，他写下自己和他周围一群人的遭遇，及他的冥想和反思。《元素周期表》是一本很难分类的书，很难用简单几句话描述它。莱维的吸引力在于他所传递的整体感，在他的世界里，每样事都奇妙地联结在一起。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意大利最重要的反思二战（奥斯维辛）的作家
对个人经历与历史创伤、人道道德的深刻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通过非生

《元素周期表》是普里莫·莱维风格最强烈的关于二战经历的小说。作家同时具备化学家和作家两个灵魂，用二十一种元素截然不同的特性，在化学世界、生活世界和词源学之间建立了微妙的隐喻和类比。

《元素周期表》和莱维其他直接反思奥斯维辛罪恶的作品截然不同——莱维用惰性气体“氦”来隐喻他成长的犹太社区和皮埃蒙特地区其他族裔之间的隔膜；用“汞”这种不稳定、易挥发的的气体来指代当时服膺于希特勒的意大利知识分子；而用元素“锌”必须需要杂质才能进行化学反应的特性来有力讽刺了当时希特勒鼓吹的“犹太人是一种必须要祛除的杂质”的荒谬言论。

击败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史以来最好的科学著作。

——《卫报》

化学对于莱维来说，也是一所“政治的学校”。

——《纽约时报》

ISBN 978-7-5500-1417-6



9 787550 014176 >

定价：30.00 元